

北京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7.08-10)

# 文研通讯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2017年第4期

2017年第4期  
总第五期



总第五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刊期：总第五期（2017年8月—2017年10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笑  
编辑：周诗雨  
编务：陈天传  
特邀编审：王珊  
特邀摄影：刘学红等  
装帧设计：杨宇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

# 目录

## 01 文研周年

### (一) 周年致辞 02

- “以学术魅力聚人”——王博副校长致辞 02
- “凝聚议题，引领方向，促进‘共享’”——邓小南院长致辞 04
- “强劲的学术旋风”——许宏研究员致辞 07
- “作理想守护者的家园”——咎涛副教授致辞 08

### (二) 周年主题演讲 11

- 林毅夫：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与北大立校 120 年——反思与前瞻 11
- 科大卫：寻找正统——乡村里的儒与道 13

### (三) 周年学术论坛 16

- 文明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方法与反思 16

### (四) 周年报道 23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举办文研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23

## 26 文研学术

### (一) 北大文研讲座 28

- [49] 詹启敏：健康中国——发展中的科技创新与医学人文 28
- [50] 欧丽娟：宝黛钗关系新解 31

[51] 林毅夫：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与北大立校 120 年——反思与前瞻 34

[52] 科大卫：寻找正统——乡村里的儒与道 34

[53] 赵鼎新：历史和时间性——中国社会科学视野与话语 35

[54] 王缉思：当前国际秩序与世界政治趋势 38

[55] 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的东亚——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例 41

葛兆光：朝贡与认同——以 1790 年安南使团赴热河为乾隆祝寿说起 48

[56] 戴燕：中古文学史的再脉络化——以五篇文献为例 48

戴燕：洛神赋再研究——在文学、图像与历史之间 56

[57] 吕植：三江源与游牧民的的未来 58

[58] 罗兰：非洲与中国的文明 61

[59] 孙歌：思想史中的中国与日本 65

[60] 王斯福：欧洲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形塑与文化计划 69

[61] 张邦炜：浅谈宋史研究中的片面性问题——从钱大昕考论宋史说起 72

### (二) 未名学者讲座 72

[21] 车浩：理解当代中国刑法知识转型 72

[22] 陈侃理：时间的历史——《史记》与太初改历 76

[23] 田耕：“金铁主义”与现代国家——马克思·韦伯支配学说的再考察 79

### (三) 北大文研论坛 83

[48] 李零等：《子弹库帛书》出版学术座谈会 83

[49] 范迪安、陈嘉映等：天心：徐龙森的山水世界 96

[50] 布鲁斯·卡明斯等：反思美国区域研究 100

[51] 文明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方法与反思 100

[52] 段晴、林梅村等：两汉魏晋时代丝路南道的多元文明 104

[53] 葛兆光、陆建德等：今天我们为什么讨论“何为中国？” 109

[54] 王斯福、迈克尔·罗兰等：时间性与文明 115

### (四) 文研汇讲 115

[01] 李楠：为何中国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国家——基于地理因素与政治整合的考察 117

[02] 陈志远：从佛诞年代推算看中古佛教经院主义学术 119

[03] 张邦炜：钱穆论著中的一些疑问——从宋代“平民社会”论说起 121

[04] 邓淑苹：何以“万国玉帛”——探龙山、二里头时期玉文化的形成与意义 123

[05] 肖瑛：家国关系论述的中希之别 126

[06] 唐雯：从新出元载墓志看德宗的太子地位 128

### (五) 文研读书 128

[02] 中西古代统治：制度与观念——马克垚教授著作研讨会 133

[03] 绘画与视觉机制——《知觉的悬置》读书会 138

### (六) 静园雅集 138

[13] 李长声：茶道和日本的美意识 142

### (七) 菊生学术论坛 142

[07] 科际合作——藏学与人类学领域间关系 152

## 150 静园学术

▪ 关于中国的艺术史研究——西方与中国的视角 156

▪ 上海犹太人的内在精神——解读历史创伤时期难民的生存韧性 158

▪ 光影之间——启蒙运动的局限性与历史意义 162

## 162 文研回望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举办第三期邀访学者欢迎会 166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举办文研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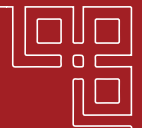
▪ 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访问北大文研院 170

## 170 文研纪事





文研周年



## 【编者按】

文以载道，研精致思。

2016年秋，文研院揭牌成立。365天来，200余场高密度学术活动给予了学者们充分交流的机会，并提供了潜心学问的清新家园。2017年秋，文研院举办文研周年系列活动，新老朋友共聚一堂，一起总结过往，期许未来。

今日特辟本版，深度报道系列活动之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 （一）周年致辞

### 以学术魅力聚人——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致辞

尊敬的韩启德主席，尊敬的樊锦诗院长，尊敬的邓小南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嘉宾和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特别高兴来参加文研周年活动。林校长特别委托我代表他和郝平书记，来祝贺文研院成立一周年。现在正是北京最好的时节，好像有一种空气并不存在的感觉，我想这也是文研院会希望带给我们的感觉，那就是纯

粹、纯净。

参加今天这个活动，一方面我要向文研院院长和她的团队表示祝贺，也要向文研院学术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以及我们所有的行政团队成员表示祝贺。当然，没有各个团队卓越的想法和卓越的工作，就没有今天纪念文研院一周年的机会，也就没有我们取得的一切。

坦率地说，刚刚听到杨弘博院长介绍

文研院过去一年的活动时，我还是有些震撼。三百六十五天，二百多场活动，那么多的学者参与，那么多的听众参与。这种参与感可能就是我想要她成为的那个文研院。

要成立文研院的想法从2009年就开始有了，去年9月20号才成立，这说明了

什么？我觉得这说明，有时候做事慢一点是对的。有人说，在北大有一个毛病，叫“醒得早，起得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要慢一点——作学问要慢一点，切磋学术、讨论学术也要慢一点。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我们要有慢的心态，我们要做慢学问。但我并不是说不喜欢快的学者，我是希望我们成为心态比较慢的这么一个学者。

昨天晚上，北大国发院举办了一个活动，在座的林毅夫先生也作了精彩的讲演。林校长在最后讲话时特别提到“最好的学问从哪来”的问题。他提了两个观点，一是我们可以把人聚起来，二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学术环境与学术氛围。我完全认同。

按照我们去年揭牌仪式上所提到的这个宗旨或者定位，不管是林校长还是邓院长都认为，文研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把更多的人聚起来，成为有人气的地方。

没错，其实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把人聚起来。北大是一个特别能聚人的场所，但具体



王博副校长

到某一机构，能不能把很多优秀的人聚起来，这不容易。我们知道，有时候需要靠权利聚人，有时候需要靠财富聚人。文研院靠什么？我觉得靠的是学术自身的魅力。

刚才在看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邓小南院长真是长了很纯粹的一张面孔。再看看我们那么多学者，那么多纯粹又纯净的面孔，我想这就是能够让我们聚在一起的力量。任何一种其他的力量都只能让我们短暂地相聚，可只有学术的力量才是永恒的。它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有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学校要做什么？其实学校要做学者想做的事情。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说法，也是最省力的一个说法。当然，前提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来了解我们的学者到底在想什么，想做什么。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地重要。

林校长常常强调学术氛围与学术环境。各位知道，做文科对学术环境是比较敏感的——不管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自蔡元培

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思想以来，北大一直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过去几十年，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改变了，而这种改变也难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影响。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北大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时刻坚守着这样一个宽松而安静的氛围。

其实把文研院安放在静园并不是偶然的。静园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静下来的地方，而这也是作学问最需要的环境。林校长经常说一句话，那就是让我们的校园静下来，也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静下来，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北大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将外在的指标或数字同学术评价捆绑在一起的学校。林校

长常说我们要感谢高松——在高的地方要宽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用为了生计或很多其他的东西而焦虑。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只有放弃执念，我们才能真正地安静下来。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文研院，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宽松又安静的环境。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代表学校表个态。学校会尽可能地为文研院提供多形式的支持，费用、学者、力量等，这种支持可以是无限的。学校也将同文研院一起，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更好的学术氛围。

最后，再次祝文研周年活动一切顺利，祝大家开心，祝福文研院！

## 凝聚议题，引领方向，促进“共享”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致辞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上午好！

非常感谢大家拨冗来参加我们的“文研周年”活动。不知不觉中，我们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一周年。一年前在英杰中心揭牌的情境都还历历在目，忐忑的心情还没平息，居然已经一年了！各位老师刚刚看到了视频，翻阅了周

周年纪念册，跟我们一起回顾了这一年来，在学校和老师们多方支持下，在文研院活动的“人”，在文研院做过的“事”。

文研院的基本宗旨是“涵育学术，激活思想”。在我们心中，“学术”和“思想”是融为一体的。学术需要内在的思想力量，大学需要探寻精神的高度，批判性思维的能力需要激发和培育。在建设世界一流的过程



邓小南院长

中，北大需要的，学者需要的，就是我们该做的。

一年时间里，院系老师们的倾力支持，同学们的热情参与，帮我们撑起了众多的活动。每次讲座、论坛之前，看到二体、二院门前路边成排的小黄车，看到讲堂、会场内外聚满的人群，看到座位上、过道中专注凝神的听众，看到举手提问者的热烈神情……这一切让我们由衷地感动，也让我们感受到精神的历练。

这一切，都还只是起步。文研院的“开篇”，并非完成于2016年9月20日那一天。这一年里，我们都是为文研院的今后、为她在北大的持久生命力“开篇”。

文研讲座的开篇者，是“敦煌女儿”樊锦诗老师。她带给北大的，不仅是一股敦煌旋风，更是一种强韧的精神力量。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正如讲座主持人荣新江教授所说，樊锦诗老师是北大的骄

傲，是北大精神的楷模。

“科技与人文”系列的开篇者，是韩启德院士。“医学是什么”，韩老师从历史讲到未来，从科学属性讲到人文属性、社会属性，让我们感受到科学家的广阔视域及求善求真的人文精神。

深度对话，是激活思维的有效方式。北大有琳琅满目的高端讲座。我们希望文研讲座和文研论坛，既能有厚实的学术底蕴，也能有活跃的思想交锋。论坛交锋的开篇，从揭牌当天的四组圆桌对谈已经开始；讲演者交锋的开篇，始自社科院考古所许宏、何努研究员有关“最中国”的观点对垒；其后考古界疑古派、信古派有关“早期中国叙事与想象”的阐释与辩论，直面认识的异同，呈现不同的研究范式，有效深化了核心议题。

青年教师的“未名学术讲座”系列，或许称得上是北大类似学术活动的开篇。有的青年教师说，在北大这么多年，第一次站在

校级讲台上，第一次感觉自己如此受到重视。

李零老师组织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导读》，是师生们在二院阅读讨论的开篇。读书班不仅指导了博士生硕士生，吸引了文研院的邀访学者，也吸引了多位海外著名汉学家。来访的牛津大学教授 Jessica Rawson 说，如果早些知道有这样的读书班，她应该来北大两个月，而不是访问两周。

多学科组合的田野调研，是文研院尝试性的“考察”开篇。秋季开学前，我们组织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文献学、社会学的学术团队，远赴内蒙居延，边考察，边讨论，学者收获丰厚，也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历史遗迹保护开发提供了智力支持。

“近者悦，远者来”，这是学者心中的愿望，也是文研院筹办之初，学校对我们的嘱托。一年来，文研讲座、文研论坛、未名讲座、静园雅集，形成了学术热点，凝聚了学界人气。

文研院能有今天，是因为我们身处北大。北大师生，从来不缺好的想法；老师们帮我们策划学术活动，帮我们把握学术标准。有老师说，我们都是文研之友；也有老师说，如果需要帮忙，我们时刻听候调遣。文研院的 51 位邀访学者，有资深教授，也有学界新锐；有的来自大陆高校、科研单位，也有来自台湾、香港，来自比利时、荷兰、美国、土耳其、新加坡。大家汇聚在一起，把文研院视为共同的精神家园。

生机盎然的静园，有“动”也有“静”。二院有活跃的瞬间，有从容的恳谈，也有安静沉潜的读书写作。曾经有朋友拍过二院的夜景，静谧的院落中，月光映着一间间研究室透出一排灯光，灯光下看得出一位位邀

访学者伏案的身影。

有邀访学者说，文研院“将学者从量化测评、资源争夺、人际关系的纷扰中短暂地抽离出来，回归思想者单纯自主的工作状态”。他们说，“相信‘结构迢递’、‘旷望高深’的北大文研院，必将吸纳学术界更多的远朋近宾，成为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准的重要推手。”

文研院生长在北大的沃土中，植根深厚的学术传统，共享前沿的学术理念。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平台，我们的责任是凝聚议题，引领方向，促进“共享”。共享也是分享，不仅共享知识，也共享思绪激荡的过程，共享思想碰撞的火花；不仅校内共享，也与国内、国际学界共享。

我们秉持的工作信念，是“清新风气，一流标准”；我们心中的追求，是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感谢学校给予我们尝试的机会；感谢各位老师、各位学界同仁，鼎力支持文研院历时一年的“开篇”。我们知道，今后的道路还很漫长，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我们相信，有同道，同人，同德，同心，大家共同的努力必将延续，理念必有发展，希望正在于未来。

谢谢大家！

## “强劲的学术旋风”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致辞

我是文研院的第二期邀访学者，今年春天在美丽的燕园度过了美好的一个学期的光阴。

我恐怕代表不了全体邀访学者，但相信我们有共同的感受和收获。我们把这段时光戏称为“驻（住）院生活”，而大家共同的感受就是：入院时是兴奋的，驻院中是享受的，出院时是不舍的。

兴奋之处在于，大多数人在求学时代都怀有的北大梦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而更感到新鲜的是，这个文研院居然很不“中国”。

大家知道我们的课题和项目，使得国内学者像高速旋转的陀螺，静不下心来。而文研院不逼你做这些，她让你静下来做自己的事，在静园二院这个静好的小院、优渥的环境下读书、写作、思考。这就是她的第一个宗旨——“涵育学术”的具体体现。

我们每位邀访学者在这段时间里都有极大的静下心来之后的收获。我自己的一部书稿就是在这里最后杀青的；作为邀访学者的规定动作，我做的一次公开讲座，讲的就是这本书的研究成果。

我个人理解，如果“涵育学术”对应于“静”，那么文研院的第二个宗旨“激活思



许宏研究员

想”就是让学界“动”起来。

我们的学术越来越碎片化，学者的研究越来越螺蛳壳里做道场，是大家共同的隐忧。而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学术界笼罩着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氛围；我们的学术会议往往形式大于内容，而缺少思想的碰撞，缺少真正的学术交锋和学术批评。但在文研院，不乏这个氛围。

作为邀访学者的第二个规定动作，我自己就在 6 月份组织了一场文研论坛，邀请北大教授和其他学者，以“对早期中国的叙事与想象”为议题坐而论道，交锋争鸣，尝试扭转学界风气，并通过网络直播影响到公众。有学者评价说，这样的平台，只有北大能搭建。

文研院的第三个规定动作是每周一次的

邀访学者报告会。在往往陷于庸忙的情况下，能够定期听到其他领域学者的精彩研究，相互讨论切磋，启迪研究思路，这对一个当代学者来说，是太奢侈的事。

说到这些，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些邀访学者在“出院”时是那么地依依不舍。

大家对文研院极富特色的海报一定印象

深刻，海报背后那些精彩大气上档次的学术活动在燕园乃至整个学界和社会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学术旋风。文研院问世仅一年就有如此成就，有理由相信它会结下更多的硕果。作为受惠于这个项目的学者，让我们向它致以深深的祝福！

谢谢文研院，谢谢北大，谢谢大家！

## 作理想守护者的家园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致辞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嘉宾：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很荣幸能作为校内“未名讲座学者”（也是实际上的“无名”学者）的代表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发言。面对这么多的学界泰斗、前辈、老师，我真的诚惶诚恐！当然，“未名”也好，“无名”也罢，圣人曾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为的是隆重纪念北京大学文研院成立一周年。我自己真的没有资格去做什么总结，这也不是我被期待在今天要做的事儿。作为一个本单位的、在基层工作的普通老师，我仅谈一些个人化的体会。

我感觉，文研院开局气势如虹，后续也

是越来越好。一年时间，倏忽过得很快。还依稀记得一年前是文研院的揭牌仪式，那个时候暑假刚刚结束，我也收到了邓小南老师的邀请。实际上，那时的我对作为学校顶层设计重要部分的文研院一无所知。很惭愧地说，当时我既不了解，也不够重视，当天还稍微迟到了。到了现场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那个场面给“震”住了。那时，王博老师主持，林校长正开始致辞。一般情况下，学校的虚体中心成立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多高级别、高规格的领导以及校内外的学术大家和名流出来助阵。所以，那个“架势”和“气势”当然是令我吃惊的。这是初识，以震惊开始。

之后，文研院的活动，并没有被“开张”时的恢弘气势衬托下去，而是在那个起点上



咎涛副教授

开创了新的局面。我的电子邮箱被列入文研院各项公开活动通知的邮件列表上，所以，对她做了什么比较了解。应接不暇的各种高层次学术活动，专业、领域既多元又交叉，让我觉得也只有北大，尤其是在有了文研院这样的平台之后，才能一一顺利落地。或许可以说，文研院可能重塑了北大高水平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形象。

但我对文研院的了解，主要不是通过概念和各类通知，而更多地是参与和实践。在文研院，我主持过讲座、评议过、对谈过、“圆桌”过，当然也做过“未名学者讲座”的主讲人。但更为零距离的接触，是今年的5-6月份，有大约40天的时间，我每周来文研院不少于四次。来这里主要是跟邀访学者和研究生一起学习、研读奥斯曼文。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次有高校实实在在地为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做基础性的工作，在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的外国历史和区域研究上都有意义和价

值。虽然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而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的中东和中亚研究日益被需要的今天）自不待言。

不少人会质疑（有时是善意的）：既然连基础都还没有，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言下之意是，这在短期内拿不出产品和成果。在这里，我很感谢文研院的支持，也为你们的（当然也是我们的）见识、视野和眼光感到骄傲。奥斯曼文对于研究从巴尔干到中东、北非，乃至中亚-高加索、新疆地区这样一个广大区域的自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基于一手资料的奥斯曼土耳其史的研究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既然这么重要又这么匮乏，那么，像北大这样文科发达的高等学府的师生是不是应该有某种使命感去开拓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在今天的中国，或许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实，做外国研究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文科

的外国研究，不管是历史学的还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区域研究，在满足了规范性的普遍要求的同时，我想还是可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视角与意识的，也就是领导们常说的“扎根中国大地”。有些问题，哪怕看起来只是外国的事，也没有人比我们更为关注！所以，外国的东西需要为我所用，这样做，其学术与现实意义皆不言而喻。

宏观上，我关注区域与文明研究，文研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相关的讲座、报告，我都想参加。很遗憾，这几年，我个人的时间被行政等各种杂务碎片化，当然也还有发表和晋升的压力，所以，并无额外精力参加那么多活动。对我来说，最快乐就是阅读事后的纪要，文研院有一本通讯，是很少的被我保存下来的非正式出版物。它使我聊以弥补错过的太多遗憾。

文研院不只有气势，更有灵魂和傲骨。邓小南院长、渠敬东常务副院长多次跟我谈到文研院的学术理想、追求和境界，尤其是不评估、不评审、充分尊重学者的选择。这确实打动了我。其实，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经在北大校园里“混迹”了二十余年的人来说，多少还是了解这一份北大特有的精神和傲骨的——其来有自也。但考虑到这个日益专业化、科层化的时代，这个日益强调创新的时代，这个对学术成果的统计越来越重视的时代，那两个“不”，听起来、说起来都还是有些奢侈的。

我未曾谋面的师爷——罗荣渠教授——今年就是周年冥寿。最近，朋友圈传着罗家后人的回忆文章，读完我深受感动，流下了眼泪。我也很有感触，仅就两点而言让自己体会很深：一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傲骨、傲

气都不可缺（当然我们一般也说傲气最好不要有），但不管傲骨还是傲气，都会让人经受额外的伤害与折磨，要么是时代的，要么是人事的，等等。总之，不随波逐流，很难。二是对学者的尊重源于对不同学科的学术规律的充分认知和尊重，源于对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真正尊重。很多前辈先生都提到：以罗先生的勤奋和悟性，如果在今天，定会有更大的成就，而不必待到知天命之际终于可以有了选择研究课题的相对自由。不管在什么时代，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不易。遗忘既是生理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它部分地也源于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那些被时代伤害的人，更是我们需要刻意记住的。

今天，做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文科的基础性研究），相比于不久以前，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使得教师们尤其是引进人才的待遇大大提高了。现在，申请开会的经费也越来越多，请校外人来北大学术交流也越来越方便了，请高规格的人也不难了，更是很少再听到人抱怨科研经费不足的话。难能可贵的是，文研院做到了既“不唯海外”、也“不唯校外”，兼容并蓄，尽力去做到“远者来，近者悦”，这种精神实属可嘉！历史的经验是，在一个底蕴深厚的单位，后者更难呀。文研院在尽力发掘和盘活北大文科既有的力量方面亮点很多，这是尊重科学的精神。这种努力是无比可贵的，必须“点赞”！

最后，还是要再次表达对文研院的感谢和祝福，祝愿她越办越好！愿这里永远是纯净的学术乐园，是理想守护者的家园！谢谢！



## （二）周年主题演讲

### 林毅夫：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与北大立校 120 年——反思与前瞻



2017年9月20日上午，文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北大立校120年——反思与前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

林毅夫教授首先引用历史经济学家的研究数据，分析了中国在关键历史节点中的经济规模：在18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的国际地位江河日下；戊戌变法时，中国的经济规模降到了大约11%；194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进一步下滑到4.2%。虽然在建国之后，中国迎来了和平建设的时期，但是到改革开放之前，依旧原地踏步——1978年的经济规模只占4.9%。

随后，林毅夫教授又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的数据。从1978到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平均每年9.6%，对外贸易增长速度为平均每年14.8%。这样的高速增长可谓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2010年，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贸易超过美国，变成



林毅夫教授

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6年，人均收入达到8600美元，经济规模则达到了世界的18.6%。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并不是在任何学术思想的引领下取得的成绩，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如果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一次性取消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对市场的各种干预，同时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中国所实施的渐进、双轨制将会是最糟糕的方式。为此，林毅夫教授提出了



三个问题：第一，从当时的主流观点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错误的，但为什么取得了连续 38 年的高速增长？第二，中国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一直抛头颅、洒热血，追求民族复兴，但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却并不理想？第三，为什么和中国同期转型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遭遇了经济失败？

首先，林毅夫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他指出，在人类经济史上，快速发展是一个近代的现象。在 18 世纪以前，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翻倍大约需要 1400 年的时间；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这个数字降到了 70 年；自 19 世纪中叶到现在，更是降低到了 30 年。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促进了发达国家经济的加速发展，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而发展中国家若要发展经济，也必须通过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来实现。以经济学上的后发优势来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产业差距作为自己升级的来源。只有这样，风险和成本才得以降低——中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实现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相对于中国而言，后发优势自工业革命后便一直存在，但何以在 1978 年之前，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愈发拉大呢？林毅夫教授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认识的问题。中国在建国后的发展思路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发展与国防安全相关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体系。但是，相关技术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中国不得不放弃后发优势的好处，转而寻求自主发明。

此外，当时的中国资本短缺，而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所需成本更高——这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而政府的价格干预、市场垄断等措施则最终导致了资源的错误配置。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由此获得了竞争优势，促进了出口的不断增长。在此过程中，既积累了资本，也实现了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因而得以利用后发优势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至于第三个问题，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是，中国之外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失败，主要是由转型方式的不同导致。当时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相似，大多都优先发展重工业，放弃了后发优势，经济发展缓慢。八、九十年代，这些国家也同中国一样在寻求经济的转型。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太多，要转型便要同时取消种种干预。然而，政府的干预原本是为了保护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一旦取消，便会导致大规模的破产、失业，进而引起社会动荡。中国则选择了不被主流思想所看好的、渐进的转型方式——给予这些产业以转型期的保护补贴的同时，开放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进入；积极因势利导，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为原本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了改革的条件，从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林毅夫教授继而总结道，目前来说，真正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正是在五、六十年代被认为遵循了“错误战略”的经济体，而照搬发达国家主流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取得成功。

主流理论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是总结其经验而得出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前提条件和发达国家不同，因此，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发展，解决挑战，不能简单照搬其经验。

此外，林毅夫教授还回顾了北京大学的建校理念和发展历史。他指出，北大在 1898 年成立之始，便是为了引进先进的思想与学术，实现民族复兴。明年是北大建校 120 周年，回溯历史，可以说，北大师生一直秉持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北大的知识分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民族复兴，此心相通——二者实际上都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发达

国家的理论和经验虽有启蒙价值，但并不能完全照搬。

最后，林毅夫教授提出两点倡议。一，北大的知识分子应该引领中国的知识分子，超越“西天取经”阶段，回归本土的理论创新。这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是要意识到，西方主流理论是以自己的历史背景作为前提的。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地区性的，时代性的。二，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只有总结自身经验的理论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撰稿：杨晓清）

## 科大卫：寻找正统——乡村里的儒与道



2017 年 9 月 20 日上午，文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二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寻找正统——乡村里的儒与道”。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科大卫（David Faure）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

所谓的“儒”，指的是祠堂和宗族的体系，而所谓的“道”，则是在神、鬼体系之下的打醮仪式，前者由家训礼仪规训，后者则由道士科仪主持。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的华南，特别是科大卫教授主要的田野地点：香港新界，正可以看到这二者交汇之下的乡村生活图景。提到华南地区的宗族，我们很容易想到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叙述：村落以祠堂为中心，聚族成村，一切的土地、经济、政治和仪式都与祠堂和宗族紧密相关。某种意义上，其对华南宗族的研究与分析，构成了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形态的理解。科大卫教授同样受到弗里德曼的影响，以宗族、祠堂、祭祀、



科大卫教授

家谱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并在讲座中展示了相关的照片资料，但是与弗里德曼不同，他通过两个主要案例，试图说明祠堂以及以其为核心的宗族体系，并非“来自于乡村生活”，也并非一种乡村传统，而是地方社会和国家整合的产物。

科大卫教授指出，宗族的普及，得力于两种制度，即白纸黑字的族谱和被称作“家庙”的祠堂，而大部分百姓开始接受宗族的“正宗”形态时，对这两种东西其实都是闻所未闻的。今日在华南地区随处可见的祠堂，其实在民间的真正普及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之后才开始的。正是在这场宫廷斗争之后，在“大礼议”中支持皇帝的官员（包括礼部尚书霍韬），以嘉靖皇帝所坚持的“孝”为原则，模仿官方的“家庙”形制在自己的家乡修建祠堂。官员的政治表态，配合上官方律例的

支持，祠堂因此蔚然成风。在此之前，无论是霍韬在家训中绘制的祠堂图样亦或是今日仍旧保留下来且十分壮观的分胙肉仪式，都只属于官方，平民百姓是不得模仿的。实际上，直到嘉靖八年（1529），明朝才修改礼制允许所有品官模仿家庙形制建立祠堂，嘉靖十四年（1535）才允许所有品官在冬至祭祖。因此，作为宗族核心并被认为是安定族人团结社会的祠堂，实际上是16世纪宫廷斗争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之结果。

而如果祠堂要建立，必然要有清晰的祖先谱系，这就与族谱有关了。记录族谱的历史比之修建祠堂要长久得多，但是科大卫教授认为，这同样并非一种乡村社会的传统，亦与官方的制度变迁有关。首位以表格方式绘制族谱的欧阳修，是《新唐书》的主修者，他绘制族谱的方式，模仿的是《新

唐书》中记录宰相世系的方法。在此之前，人们记录祖先和家族谱系的方式是记述式的，这种记录方式的特点在于并不需要完整的记录家族中的每一代每一位。但是使用表格来记录的时候，就需要对每一代都有记载而不能有所缺漏，原本模糊的记录，不甚清晰的世系都不再满足需要，严格的、白纸黑字的记录成为了主流。科大卫教授并没有指明是官方的制度影响了民间的传统，但通过欧阳修的案例，他确实认为这是一种官方治理和意识形态向下的渗透。

祠堂和其背后的儒家意识形态是宗族体系下的乡村安放祖先的方式，倘若科大卫教授视其甚至宗族本身都是一种地方社会和国家统治相接触的产物，那么又是何者在关照社会中的亡者呢？科大卫教授通过引述武雅士（Arthur P. Wolf）的《神、鬼和祖先》（*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一文的标题，指出与基督教世界不同，在中国的乡村社会，这三者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这个转换的过程就需要道士以及道教仪式来支撑。科大卫教授以一个充满幽默意味的例子指出，当家中有人去世，我们需要将其从去世的死者转化为祖先，并将祖先供奉起来，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对其表现尊重，更重要的是，生者只有知道祖先在何处，才不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冒犯到祖先的鬼魂，因此这根本上是要满足生者的需求。作为沟通死者世界与俗世的中间者，道士以及打醮成为了新界的另一个核心。看上去，是道教神祇、道士和村民一起构成了这个仪式的基本结构，道士接受村民的请求，请求神祇降临，将村民的奉献献给神祇。实际上，作为沟通者的道士是以

朝廷官员的形象以及身份出现，其次，神祇也有官僚等级区分，首先拜判官，经由判官将城隍请来村庄，再由城隍请来玉皇大帝。看似充满神、鬼甚至迷信的仪式，实际上背后存在着更完整的自中央而下的秩序。

比较二者，不难发现，在乡村中寻找正统，直观的观察和感受来自儒、道两端所持的两套仪式体系，通过对仪式进行的历史学以及人类学探究，会发现一个不断流变和重新赋予意义的村落社会与乡村结构。科大卫教授并非要从这二者之中寻找何为正统，何为支撑乡村社会的根本，而是从这二者交汇之下的乡村生活本身，尝试揭示其丰富性和多样性，乃至至于可能性。

（撰稿：王文澜）



### (三) 周年学术论坛

#### 文明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方法与反思



2017年9月20日下午，文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一期在北京大学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主题为“文明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方法与反思”。论坛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参与讨论的学者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波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常怀颖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博士。韩启德院士、樊锦诗教授等嘉宾到场聆听。

渠敬东教授首先阐述了文研院支持并鼓励跨学科开展文明研究的初衷。他指出，文明研究的最终关切是研究人，文明与人的关系是研究文明的本质。放眼全球，世界各国、各区域的文明不断产生交融，文明也因技术的进步和区域的扩大不断融合生发，同样地，文明的交流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冲突。未来的世界将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个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深入的思考。文明研究不应局限于专业研究，而需要学者通过跨学科

的研究突破专业研究的学术视野。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间一直局限于中西文明的比较格局，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视角是多文明的，我们要将世界囊括在自己的视野里，构建更加健康和完整的未来。这是中国学术的责任，也是北大的责任。跨学科文明研究，创造的不仅是优秀的学术成果，更是培育优秀学者的土壤。

第一组发言嘉宾分别是赵鼎新教授、李强教授和李猛教授。三位教授从国际视野出发，讨论宏大的文明研究如何形成，反思全球文明研究遇到的困惑。赵鼎新教授首先发言，他指出，文明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接着，他由“民族国家”的概念引申出文明研究在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赵鼎新教授说，我们现在称呼中国为“中华民族”或“民族国家”，这样的概念源于西方，形成至今大约200年，广泛推广则发生在二战之后。赵鼎新教授认为，“民族国家”观念为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第一，这一概念的思维方式与基督教十分相似，特别是犹太教，比如“零和”的观念——只能属于其中一方，而不能共存。这种“零和”观念的特征也表现

在领土问题上。在帝国时代，各国的领土是相互交错的，而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各自的领土是封闭的。争夺更多领土的方式就是屠杀。历史上，美国、欧洲、中东、印度等地区因为争夺领土而遭屠杀的百姓不可计数。中国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规模要小得多。现在，中国强大起来，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构成的是文明共同体，与欧洲、印度、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态完全不同。那么在学术领域，我们是不是还要依靠来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的说法来定义中国呢？

文明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的认同。一种文明对某一个地区的主宰是由疆土的范围定义的，而定义疆土的方式是比较暴力的，如屠杀、驱逐、迁徙等。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几乎全部由西方文明主宰。但是在历史上，中国的文明常常出现由不同民族的统治者相互主宰的情况，如蒙古族文明、满族文明等。几千年文明的交互积累，使得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即使面对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华文明也始终未能被完全同化。这是中国的特殊性，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强化中华文明的认同感。

对于如何培养中国文明研究的人才，赵鼎新教授指出，西方的文明研究进行了许多年，但是走到现在，我们感受到，很少有学者能够进行令人信服的文明研究——许多人往往停留在本专业内，有的甚至连这点都没有做到。赵鼎新教授指出，我们要培养有中国文化出身的、基本功好的专业人才，培养问题意识，鼓励跨学科

研究，这样才会推动中国的文明研究走向世界前列。

李强教授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阐述了文明研究中的秩序与意识问题。他认为，人既不是神，也不是动物。人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存在，而追求无限存在的方法之一就是构建共同体，因为共同体的生命是超越个体的。要构建共同体就要构建秩序，这种秩序既包括制度的秩序，也包括精神的秩序——前者依赖于后者。李强教授反思了近些年西方政治哲学在面对文明冲突时何以停滞的原因，及其依赖跨学科方法的程度。他提出了理解西方政治哲学秩序的三个维度：认同问题、组织问题和政治问题。

第一，在中国，认同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为传统的问题，并且中国的认同是共同体的、是处在网络中的。现代的认同更多地偏向宗教意味，启蒙运动后，人们推动了个性解放，但是认同问题依旧十分重要。然而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却不太关注传统的认同问题，正如福山讨论的“历史的终结”，似乎已经预设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框架。但是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分配人类的福利，这关系到民族认同、种族认同和宗教认同，以及它们对于政治的影响。这需要融合历史学、宗教学等跨学科知识。

第二，人类要组成有秩序的组织，就要形成机构。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机构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机构的类型，二是机构内部怎么组织。以国家问题为例，二战后，西方社会提出民族国家的概念，国家问题在社会学中讨论得比较多，在政



论坛现场

治学中反倒鲜有问津。实际上，整个世界已经在思考人类将要组织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是民族国家，还是帝国？对于构建帝国，欧盟一直有比较强烈的企图心，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复辟帝国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民族国家在未来的走向。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要很好地把握历史知识。

第三，政治问题。李强教授以美国宪法为例，评析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他认为，当前美国的选举制度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而是西方几年前混合制度的转移。李强教授强调，研究政治哲学的三个维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要与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进行互动和交融，将单一的知识层面拓展到跨学科的多维度知识结构。

李猛教授评析了三个经典案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研究、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研究和莫米里亚诺对古

希腊的研究，试图呈现文明研究本身存在的困难。李猛教授说，韦伯的研究从宗教和经济伦理入手，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等内容，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典范性的研究，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力。但是，对于专业化的学者而言，外行终究是外行，也许外行能够看出新的东西，但是外行在研究过程中也会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这一点韦伯在当初著书时便提到了。还有涂尔干的研究传统、莫斯的研究传统，正如王铭铭教授也想将他们的研究范式运用于中国以及周边国家的研究，这背后隐含了一个对西方以及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把握。我们要提问的是，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文明为什么没有被纳入世界文明研究的历史进程？这是文明研究隐含的一个宏大假设。

第二个案例是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研究。轴心时代这个概念在社会学领域的影响很大。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有的汉学

家提出非常俏皮的问题，比如，中国是否发生过超越秩序的断裂？这种断裂是否构成了中国思想传统与政治传统的对立或批判？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看来，并不是一个想当然能够得出的答案。这显示出文明研究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即当我们讨论历史细节的时候，证据却很含糊，这些证据能否支撑这个主张，还需要深入的讨论。

第三个案例是莫米里亚诺的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是希腊文明、犹太文明、罗马文明等世界文明类型，关注的是多种文明间的相互作用。莫米里亚诺虽然也借鉴了雅思贝尔斯的研究，但他运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即从历史的残片中把握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莫米里亚诺所得出的结论是猜测性的，也是有限性的，只看他的研究结论很难将其定位文明研究，只能说是不同的学者对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看法。

透过这三个案例，李猛教授指出，我们现在的文明研究，是以宏大的历史进程为基础。未能放在文明内部的小单位进行研究，使得文明研究很难放在一个或某个专业学科内部去进行。因此，当提出“文明研究是否可以成为一种专业学科？”这个问题时，李猛教授持否定的态度。

李猛教授对当前的文明研究提出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第一，如何理性地评价一项文明研究。文明研究无法形成清晰的批评机制，文明研究的成果也很难评价，很难区分哪些是原创性的观点、哪些是错误的观点。第二，通过文明研究，能否重建专业学科与传统学术之间的联系。学者有必要回头检讨专业学科最初的概念，在

用理论构建基本的世界图景时是否出现错失？古老的学科能否为新的研究提供更多可能性？

对于中国的文明研究，李猛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应关心中国人自己的命运，我们研究希腊文明、研究美国政治，都隐含了中国人对历史、对未来的理解。我们将西方文明同中国文明摆在一起平行比较，会造成各说各话的局面。中国的学术传统一直处于西方文明研究之外，因此中国的学者需要将中西文明联系起来，使其发生关联，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产生新的对话。

第二组发言嘉宾分别是魏斌教授、陈波副教授、叶少勇副教授、常怀颖副研究员和程苏东博士。五位学者分别从自己的学科领域出发，讨论中国文明研究的方法、反思中国文明研究遇到的问题。

魏斌教授从历史学研究的经验出发，谈到了自己在历史研究中的方法经验，以及跨学科研究时产生的困惑。关于研究方法，魏斌教授指出，文明是时间的积累，历史学的研究核心是时间过程，是历史的生成和变化。每一位历史学者，拥有一种直觉的自觉，那便是关心历史的变化和延续。基于这一点，历史学天然地具备了跨学科的性质。魏斌教授以山林研究为例，指出他所研究的山林，既包含历史学的内容，也包含社会学、地理学的内容。关于跨学科研究的困惑，魏斌教授主要提到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互斥。他提到，近些年，历史学研究常常遭到社会学者的批评，认为历史学研究缺乏对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梳理；而社会学研究也会遭到历史学者的质疑，认为社会学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

的把握不够精准。对于两个学科间的互相批评，魏斌教授的观点是，这是二者站在本学科立场之上的讨论，历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建立在历史材料基础上的分析，至于如何一边呈现历史材料、一边合理地使用理论，仍需要历史学者进一步的努力。

陈波副教授从人类学的学科角度讨论中国文明共同体的特征。他首先以一个有趣的例子——活佛讲经，生动地展现了中国领域内的不同类型的文明形式在同一时空中产生的冲突。在研究方法上，陈波副教授认为，面对不同的材料，站在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结论会有所不同。研究中国文明，首先要树立“中国观照”，这是林毅夫教授在上午的演讲中提到的概念。研究中国的问题，其理论观照与问题预设不同，研究视野也会产生区别。例如，如果将中国理解为一个帝国，研究方向便是帝国的形成与帝国文明；如果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民族国家，视角又会不同。

接着，陈波副教授以莫斯的著作《礼物》为例，解释借用西方的研究范式理解中国文明体系的可能性。他指出，作者莫斯在一战背景下完成这部著作，最初版本删减了很多。与莫斯本人及作品相关的学者、流派皆参与过一战，伤亡惨重；以涂尔干和莫斯为代表的学术流派也因战争受到重创。莫斯在此背景下，反思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研究，强调了两点。第一，个体研究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个体性，而文明研究是强调跨越某一个社会、民族国家的社会现象，这种文明与之前讨论的文明在定义上不尽相同。在《礼物》中，莫斯

将中国放在“总体呈现”的体系中看，他认为应将这种跨区域的漫长时间的群体与群体的交换视为一种呈现体系，而不能把一次的礼物交换看作总体的呈现体系。第二，炫耀与消耗。陈波副教授认为，炫耀与消耗这一组概念透射出不同文明体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同地位。将中国放在这组概念体系中的做法，不由得使中国学者产生疑问——莫斯是否真正了解中国的文明体系？中国的文明体系是炫耀还是消耗？涂尔干在对社会事实的概念进行梳理时，认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可能性是帝国，帝国内部会产生不同的民族接触。不过，帝国只是西方的经验。谈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与研究中国文明的关系，陈波副教授认为，欧洲的知识体系没办法处理中国的文明进程。他使用“共主”的概念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结构。“共主”是多群体共同推举的一个领袖，当群体或区域出现矛盾和纠纷时，“共主”便出来主持正义、维护秩序。中国在历史上与边疆地区便形成了互补的关系，既不要求中原与边疆实现同质化，也不用彼此的长处对比不足。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北京大学马戎教授也曾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地区之间便产生互相依存、相互支援的关系。”莫斯的观点是超越性的，中国的这种“共主”体系没有边界，可以与世界共享我们的成就。如果存在边界的话，我们的文明就无法对边界之外的群体做出贡献。

叶少勇副教授以佛教研究为例，表达了对当前中国佛教研究缺乏跨学科意识的担忧。他指出，由于缺乏藏语和梵语的基

本训练，国内许多佛教研究者对于佛教的根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国内佛教研究中“去印度化”的口号更加弱化了佛教研究者对于藏语和梵语学习的重视程度。叶少勇副教授认为，要做好佛教研究，必须要实现佛教与外语（梵语和藏语）的跨学科研习，外语是佛教的细分领域，我们不应人为地割裂佛教作为一个跨专业性质的学科的完整性，更不应因为藏语和梵语难学而找理由忽视她、贬低她，而应通过这些语言明晰佛教的要义。此外，叶少勇副教授还提到，研究佛教不仅要重视外语学习，还需要掌握文献学的知识，培养分析能力和问题意识，从字词差异的背后牵引出重大的学术问题，以获得真正的学术发现。

常怀颖副研究员表示，虽然考古学科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属于小型学科，但具有多学科交融的特征，因此是天然的跨学科专业，研究它也需要各种学科的各种方法。他从两个层面讨论今天的议题。第一，文明是什么。我们今天将文明视为国家形成以来的形态。从不同的学科的角度看待文明，其定义有所不同；从不同的地缘角度看待，文明的定义也不一样。如果站在中原的立场，文明的本质就是国家起源的问题；如果讨论上古时期的边疆地区，那便是异文明的问题。第二，怎样理解人群共同体中国化的过程。我们研究文明的起源，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开拓新的史料。这是考古学与历史学和社会学不一样的地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常常会挖掘新的遗迹、获得新的研究材料，面对新的研究素材，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展开研究。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评议环节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常怀颖副研究员认为，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中国考古学者思考。

其一，中国的疆域存在不同的新石器时期人群的共同体，他们是不是以比较相近的方式进入国家形态？是不是经历了与其他国家起源相似的形式？这便引出一个政治学的问题：西方社会总结的文明起源的方式是不是适用于中国？中国能不能套用西方的概念？会不会引起“水土不服”？

其二，文明可以定性研究吗？物质变迁是西方文明研究的标准之一，如两河流域的文明探索，以当地的物质遗迹为主要证据。西方的这种研究方法是不是适合中华文明？中国文明的存在形态多大程度上可以与文献相契合？文明研究是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我们试图从发掘出的遗迹中直接看出历史的进程与社会的发展。这些问题，在获取新的研究材料的基础上仍需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其三，考古学迫切地希望获得理论指导，比如，考古学借鉴人类学的方法获取材料，借鉴史学的方法解读材料。我们需要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比照中华大地曾经存在多的人与物。

常怀颖副研究员指出了中国考古研究

的两个倾向：第一，直接借用西方的概念（如社会分层、城邦等）总结中国的文明发展过程。第二，于具体的材料进行过程化的描述，不是轻易用某种概念和理论与套用。常怀颖副研究员认为，西方的理论对于中国的文明研究不完全适用，未来急需跨学科的专家进行帮助研究。比如，早期的文字、社会阶层，经济发展情况在早期国家中的发挥了哪些支撑作用？早期的贡赋关系、贵重资源的控制分配和流动过程，直接关系到文明的发展程度。人群的流动、婚姻关系、不动地区的社会分层、区域中心与周边群落的关系的控制……常怀颖副研究员表示，虽然各种自然科学技术充分地应用在考古学研究之中，但考古学和史学都面临碎片化的现象，怎么解读才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程苏东博士通过概述中国传统学术格局的改变阐释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国便进行了早期文化的知识分类和积累——无论是整体架构变迁还是局部划分。到了汉代，两位大儒针对是否推行学术的融通展开了跨时空的讨论。贾谊认为，科学需进行全面综合的培养，研习诗、书、礼、易与春秋，便可达致“中和”的境界；董仲舒认为，“六学皆大”“万物皆在春秋”，他并不强调跨学科的重要性，而着重讨论春秋学——他的春秋学研究的确改变了当时的学科形态。程苏东博士认为，学科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研究方法，他对中国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表达了担忧，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不同的时代对于文学的批评标准是不同的，学科方法也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

他讲到，文学学科的研究应当形成标准化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将不同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学材料的运用，这是未来跨学科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八位学者发言结束后，韩启德院士、樊锦诗教授等嘉宾参与了论坛的讨论。在被问及敦煌学研究中具有哪些跨学科特征时，樊锦诗教授指出，敦煌石窟作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要掌握艺术学的相关知识，还离不开佛教研究、经学研究和民族研究等多种学科的学术支持。如果不能掌握跨学科的知识，就无法进行完整的敦煌学研究。

韩启德院士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愈发朝向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关于文明这一终极问题，不论怎如何进行学科交叉都存在其合理性。好的研究就是好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好的故事，好的故事能够为大家所接受。

论坛最后，渠敬东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表示，做文明研究的学者，并不是一开始就立此志向，而是凭着多年研究的惯性，自然而然走进了文明研究。进行专业研究的学者，实际上更加关心人本身，而一个人在某一时代的遭遇，使得其必然会关注文明问题。学者关注小的问题，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关心自己的未来或人类的未来，则一定会关心文明问题。文明问题并不是当下即刻能够解决的，学者需要有勇气回到完整的过去，这是一项对文明有承担的人从事的事业。文明研究的本真，便是观察自己，观察世界。

（撰稿：张旖旎）

## （四）周年报道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文研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2017年9月20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成立一周年。作为学校层面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平台，文研院在过去的一年里，秉承“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凝聚了大批优秀学术人才，举办了有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活动。9月20日当天，文研院特别举办“文研周年”系列学术活动，邀请新老朋友，校内外师生重聚，回首难忘的一年，并奉上精彩的主题演讲与学术论坛。

当天上午九点，系列活动在二体地下报告厅拉开帷幕。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院士，文研院首位特邀教授、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科大卫，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赵鼎新，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张国有，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文研院学术委员、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等二百余位嘉宾出席了文研周年仪式。文研院工作委员，三期邀请学者、北大相关院系、职能部门、北大图书馆、出版社的领导也参加了活动。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担任主持。现场座

无虚席，旧友新朋，济济一堂。

“文研周年”活动开始，到场嘉宾共同观看了文研院特别制作的回顾视频。短短六分钟的视频，采撷文研院一年来200余场学术活动的精彩片段，汇集名家新秀讲学、对话、交锋的瞬间，展现了文研院一年来所收获的累累硕果。

随后，四位嘉宾相继发言致辞。王博副校长在致辞中，转达了学校对文研院的祝贺，并引用林校长的观点，凝聚学人与营造环境，是一流学问得以产生之源。而文研院的定位，与上述两种因素不谋而合。文研院凭借学术的魅力汇聚了海内外优秀学者，并为之营造宽松安静的环境，使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在浮躁的社会寻求“慢”学问。王博副校长表示，学校将继续大力支持文研院的发展，并预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学术和思想始终是融通一体的，学术需要内在的思想力量，大学需要探讨精神的高度，需要激发和培育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北大所需要的，学者所需要的，正是文研院的使命。她随后回顾了文研讲座、文研论坛、“未名学者讲座”、读书班、静园雅集、田野调研等代表性的学术活动。琳琅满目的高端讲座，



全体嘉宾合影

思想活跃的论坛交锋，在静园二院形成了学术热点，凝聚了学界人气；北大师生、邀访学者把文研院视作共同的精神家园，协力耕耘这一片园地。文研院将继续秉持“清新风气，一流标准”，与广大同仁同道砥砺前行，力求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写下新篇。

文研院二期邀访学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幽默地将2017年春季学期的驻访经历比作“驻院生活”——“入”院时兴奋、“驻”院时享受、“出”院时不舍。驻访期间，许宏对文研院每周一次、以真诚的学术批评为特征的内部报告会感受颇深，同时也参与组织了“早期中国的叙事与想象”论坛，取得了广泛的学界影响，他的一部书稿也在二院杀青。作为受惠于文研院理念、也受惠于这一机构实体的学人，他向文研院致以深深的祝福。

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则表示，仅仅一年时间，文研院已经重塑了北大高水平人文社科研究的新形象。他个人深度参与了文研院的学术活动，也与文研院邀访教授凯末尔共同在二院带领

学生学习奥斯曼土耳其语。文研院对学者不做量化评估，凭借着对学术规律的认知，对独立思想精神的尊重，不惟资历，用心挖掘和盘活北大的既有学术资源，令人心生敬意。他祝愿文研院永远是纯净的乐园，是美好理想的守护者。

在接下来的主题学术演讲环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科大卫分别担任报告人。林毅夫教授演讲主题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北大立校120年：反思与前瞻”，他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勾连起北京大学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发展，并提出了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实现连续的高速发展？为什么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前抛头颅洒热血而未能实现民族的复兴？为什么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遭遇了失败？借由对三个问题的回答，林毅夫系统阐释了其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演讲尾声，他倡导北大的知识分子应该引领中国学界的风气，超越单纯吸收发达国家理论模式的“西天取经”阶段，回归本土的理论创新，以来自于自己国家和时代的经验解决问题。

随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科大卫作了题为“寻找正统——乡村里的儒与道”的学术报告。科大卫教授首先阐释了“历史人类学者需要走向田野调查”的原因，继而以其在广东农村地区收集的有关宗祠、祭祀以及婚嫁等文献，结合实地考察所得，分析了如何在传统习俗中发现儒家思想和道家观念的表现。

20日下午，文研周年系列活动之文研论坛“文明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方法及反思”在北大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主持讨论。参与讨论的学者有：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博士。韩启德院士、樊锦诗教授等嘉宾到场聆听。

论坛嘉宾主要就如何研究文明、如何在研究中解决单个学科无法完成的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李猛教授指出，文明研究试图处理各个学科最基础的问题，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史提供了根源性的概念。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性的视野和图景，各个学科就会各自孤立，成为完全片段性的研究，停留在自己技术能够处理的部分，长此以往会带来学术想象力和思考能力的枯竭。尽管如此，文明研究也存在难以专业化的困难，因为文明研究缺乏一个非常清晰的、通过专业学者相互批评建立起来的机制，其成果难以评价。我们今天重提文明研究，是希望借此重建各个专业学科和其根源性、奠基性的

学术传统之间的联系，寻找新的可能性。叶少勇认为，跨学科的研究首先要从专业内部去剖析问题，然后进行其他学科的材料、手段的结合。他以佛学研究为例，指出研究汉传佛教的学者如果不懂梵语，不懂源头的语言，不能从语言的角度去参考更多的资料，或者即使懂了语言，缺乏文献学的意识，这样的研究是受很大局限的。如果要做出优秀的文明研究，就要强化基础学科，结合语言学以及西方文献学的成果。常怀颖从考古学的视野出发，讨论文明这一概念的中西对比，指出因为双方的角度不同、实际情况不同，所以西方的文明演进模式也不适用于中国，考古学者要立足于中国的早期文明出现、演变过程，开拓新材料的研究、融合多种学科的思想去解决问题。在讨论阶段，韩启德院士提议请樊锦诗先生为大家谈谈跨学科研究的典型案例——敦煌学研究。樊锦诗先生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自己在敦煌学的使用跨学科知识研究的历程，她是考古学训练出身，但在研究敦煌壁画时，不得不再学习佛教、道教、祆教、景教等的宗教领域和民间信仰的知识，并且也要结合传统历史文献学、民族学、艺术审美等诸多学科的知识来研究敦煌学涉及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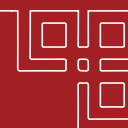
目前，文研院2017年秋季学期学术活动已经陆续展开，本期驻访学者也已在二院开始他们的研究和工作。文研周年的举办，既是总结文研院一年成绩的一个句点，相信也将是全新的起点。

（本文于2017年9月23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文研学术





## （一）北大文研讲座

49

### 詹启敏： 健康中国——发展中的科技创新与医学人文

2017年9月1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四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健康中国——发展中的科技创新与医学人文”。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担任主讲，文研院长邓小南教授担任主持。本次讲座也拉开了文研院新学期学术活动的序幕。

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于生命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单一学科。邓小南教授首先对讲座主题进行阐释：人文精神是医学的翅膀之一，医学科技的创新需要学科之间的相互融通。科技固然会改变世界，但科技背后的人却是可以改变甚至主导科学的因素。正是博学与博爱的医者成就了人类守护健康的梦想，使我们对于健康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

詹启敏院士在讲座伊始即指出，科技创新和人文事业是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在建设健康中国的进程中更是如此。詹院士首先论述了健康中国的历史机遇与其必要性。当前是中国健康事业发展的最佳历史时期，我们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关注健康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苏镇江基层医疗机构考察时曾提到——“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福祉”的提出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发布，更彰显了人民健康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健康中国的建设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之一，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拥有健康的体质、健康的心智、健康的素养和健康的环境。与此同时，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开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这一建设也将循着科技创新的道路前行。

大健康概念随着健康中国建设应运而生。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看不看医生、吃不吃药当作评判健康与否的标准。对此，詹院士指出，今天所提倡的“大健康”，其时间跨度应从生命形成的第一天直到生命的终结——即全人群全周期的健康管理和服务。推动大健康不仅限于院中管理，在院前与院后的时空范围内，更需要靠医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来助力。

但健康中国的实现仍然任重道远，詹启敏院士提供了一组资料予以佐证。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癌症新发病例每

年430万，死亡280万……乙肝感染者达8000万，结核病感染者达550万……重大疾病是造成我国人员资源丧失和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并已成为我国社会 and 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严重障碍。

与此同时，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不高，在195个国家中，中国的医疗质量指数排名第82。由于基层医疗条件差，科学技术水平低，人们蜂拥至

大医院看病求医。詹启敏院士用“战时状态”来形容中国各大医院的就诊情况，病人们昼夜不舍地排队。尽管医者仁心，但限于治疗环境与时间精力，医患之间的人文关系几乎无从谈起。此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较为普遍，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不高是症结之一。

鉴于我国医疗情况的现实背景，詹启敏院士着重分析了医学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医学发展，从一个听诊器、几把手术刀的时代，到X光的出现、第一例微创手术的完成，直到今日的精准医学、靶向治疗、大数据、分子影像、分子病理……诸如核磁、超声等医疗设备的进步帮助临床专家对疾病看得清、看得准、看得早；诸如青霉素和抗生素等药物的研发，使感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对人们的危害降低到可控程度；诸如放射与微创手术等技术的推进使治疗效果更好、患者痛苦减轻。医学实践表明，任何一种重大传染性疾病最终控制，以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临床诊疗的突破都有赖于医学科



詹启敏院士

学技术的发展；而任何一项新技术、新装备、新药品应用都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随着医学科技创新，我国的健康状况普遍有所改善，新生儿、婴幼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降到2016年的7.5%，人均预期寿命由解放初期的36岁提高到了76岁。同时，全球医学科技创新的地位在迅速提高：一是医学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标志；二是发展医学科技成为各国重要战略部署；三是医学成为各国政府科研经费投入最多的领域。

医学科技创新的前沿学科成就瞩目，詹启敏院士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简要介绍：生命组学技术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疫苗和抗体、生物治疗及个体化诊疗技术、数字化诊疗装备以及大数据与智能医学。然而，尽管医学科技已发展到如此发达高效的阶段，詹启敏院士仍用“冰山一角”形容目前临床诊断治疗的现状与局限性。在认清这样的现实后，医学人文的作用就显得举足轻重、不可或缺。

詹启敏院士将医学人文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学伦理，即医学科技发展的度量衡；二是医学史，即医学人文发展的历史沿革；三是医学传播，这不仅是医学知识的科普，更是诊断过程中对患者给予的关心、关注和关怀；四是医患沟通，培养服务于基层社区和农村的全科医生是人才建设的重点之一，医生就在公众身边，对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进行即时了解和关照。在这里，詹启敏院士特别提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在今年联合成立了北京大学健康传播专业（Health Communication），对健康医学进行宣传，就是要用正确的人讲正确的故事。

由此，詹启敏院士进一步分析了医学人文的必要性。人们对生命深层次奥秘的理解和疾病发生的机理尚未清晰，而面对生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医学解决疾病的能力有限。此时，医患之间的沟通、理解与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医者要给予病人的不仅是医疗救治，还有更多的心理帮助和精神安慰。“偶尔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詹院士的三句话道出了具有人文精神的医者情怀。让每个生命能够不仅得到救治，还享有生命的尊严，予病人以人文关怀，馈病人以友善温暖，是医者仁心，亦是大爱无疆。医学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和人文紧密相连，其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让医学更加厚重和温暖。

针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未来代替医生的论调，詹启敏院士明确指出，医疗的基本模式永远是“医生—病人”，这种模式是有亲密的、有温度的。科技固然能够

提供支撑作用，但绝不可能代替医患关系。詹院士富有创见地提出，医疗室里应有两个“专家”——医疗专家和病人自身（病人是了解自己的“专家”）。这区别于传统的“指挥—服从”关系，在平等的沟通交流中，基于患者对自身的充分了解、医生对技术的精湛把握，达到良好的医从性和治疗效果。这种新型医患关系的提出也是医学人文的应有之义。

关于医学科技创新与医学人文的关系，詹启敏院士精辟地指出，“医疗服务 = 医疗技术服务 + 医学人文”。医学科技创新不仅是人类追求健康的客观需求所致，更在于医学人文精神的持续推动。医者本着“坚守底线，不忘初心，健康所系，性命所托”的人文精神，孜孜不倦地探求着更先进的手段和方法，以期对疾病有更加准确的判断、对病人有更加完善的治疗。“科学与艺术在巅峰握手”，一个拥有丰富的人文情怀和素养、知识宽、爱好广、擅长沟通的医者在医疗实践活动中将会更受病人的欢迎和配合。医学人文情怀是永恒的，是永远不能被丢掉的。最后，现场观众与詹启敏院士间的问答互动将讲座引向了更宽广的学术视域，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撰稿：陆敏秋）

## 50

### 欧丽娟：宝黛钗关系新解

2017年9月1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宝黛钗关系新解”。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欧丽娟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王博担任评议并主持本场讲座。

“开谈不读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种红楼解说，而围绕其关键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也历来争议不断。早期致力于研究唐诗的欧丽娟教授，此次则从人性与成长的角度出发，深刻剖析、解读《红楼梦》中的宝黛钗关系，并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视野。

欧丽娟教授首先指出当下红楼研究中的一些“偏见”：在绝大部分读者心中，黛玉和宝玉的浪漫爱情与木石前盟的前世今生已成为至情的代表而被神圣化，而宝钗则往往以介入者的形象出现，是一个以大我为先、自我为二，不够率性且破坏了宝黛爱情的角色；宝玉和宝钗是世俗的结合，宝玉和黛玉才是心灵的契合；三者间存在亲疏、正反的对比……

然而，这一切也许并不是《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在欧丽娟教授看来，恰如清张竹坡所言：“作书者固难，而看书者为尤难，岂不信哉？”红楼梦与现代读者之间不仅有两百年的时间断层，更有两千年的文化断层。要做到真正理解《红楼梦》，

仅凭热爱是不够的，将自己所熟悉的反封建、反礼教这类价值观投射到园中人身上也是不可取的。我们需要凭借理性和学识积累才能接近经典。

《红楼梦》让人为之悲、为之喜。我们若要追求作品中的真理，还需要让原本被忽略的东西得到发现。欧教授从黛玉与晴雯、袭人的亲疏切入，再细剖“二宝”、“二玉”的关系，最后以钗黛的和解与合一，阐述了她所理解的宝黛钗关系。

#### 一、黛玉与晴雯、袭人

人们常说晴雯、袭人是两大女主的分身。因“晴有林风”，就认为晴雯必定和黛玉同属一个阵营，甚至是宝黛的传情使者，并与袭人、宝钗对立。然而，宝玉差遣晴雯给黛玉送旧手帕时晴雯完全搞不清状况，晴雯哭泣时见林黛玉进来便尴尬离去……在欧丽娟教授看来，以上种种都说明晴雯绝不是宝黛关系的促进者，黛玉和晴雯的关系也并不亲密。相反，黛玉却对袭人有嬉闹拍肩之举，甚至到怡红院寻宝玉时也是以袭人为由——在那个贵贱等级分明的时代，这足以证明黛玉对袭人的亲近喜爱、平等相待。从第78回宝玉在蘅芜苑的悲感来看，能够帮助他抗拒曲终人散、人间无常的，也正是黛玉、袭人二人。宝玉并没有对袭人、晴雯进行二分对立。看

不到这些细节，往往是因为读者对人事物存有先入为主的成见。

## 二、“二宝”关系抉微

对于宝钗和宝玉的关系，欧丽娟教授也指出，并非如传统所说的那样对立。贾宝玉并不讨厌薛宝钗，甚至在许多地方她都是和林黛玉相提并论的。第5回的《终身误》中，宝钗是“山中高士晶莹雪”；第20回阐释宝玉的少女崇拜心理时，宝钗是原因之一；宝玉的出世哲学启蒙者，亦是宝钗。在宝玉心中，宝钗是“山川日月之精秀”，只不过，爱并非因为对方好就能予以等比例的付出。对宝钗的赞美，终究美中不足，乃是因为宝玉心中还有一份对“世外仙姝寂寞林”的钟情与执着。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些，读者的“红楼拼图”就会有严重的欠缺，对宝黛钗三角关系的认识也随之产生严重扭曲。

“宝玉与宝钗，亦有缠绵一时间。”欧教授甚至认为，比起黛玉，宝钗才是宝玉真正的同道之人。黛玉从不鼓励宝玉去走仕途。她既没有劝，也没有积极地站在宝玉的立场考虑。真正和宝玉一样把全天下做官男人贬为“禄蠹”的，其实是薛宝钗。《红楼梦》第42回，宝钗就明确表示：“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第38回的《螃蟹咏》更是见她辛辣异常地讽刺。

此外，欧丽娟教授还特别指出，读者常常将人际关系简单化，认为亲近者就可以对他发脾气——但真情的最高境界，当



欧丽娟教授

是设身处地的尊重彼此、爱惜彼此。恰如第21回脂批所写到的：“奇文！写得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何也？宝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岂于宝钗前反生远心哉？盖宝钗之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时有渎，故不敢狎犯也。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何反于兄弟前有远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反成远离之端也。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庚辰本第21回双行夹批）二宝之间的客气尊重，正是为了维护在对方心中留下的完好印象。所谓“亲狎生侮慢”，正是这个道理。过分接近可能导致毁灭；保持些距离反而能够拥有。总之，二宝并不像大多数误解的那样亲疏生分，相反，他们在心灵上也存有某种默契，在生活中相互尊重、彼此赞赏。

## 三、二玉关系发展

同样，在欧丽娟教授看来，黛玉和宝玉也并不总是那样亲密无间、心心相印。第45回，黛玉在雨夜独处时就感受到与宝

玉“虽素习和睦，终有嫌疑”；第57回，紫娟对宝玉说黛玉常常吩咐丫头们不与他说话；第79回，黛玉听了《芙蓉女儿诔》后忡然变色，却不肯流露出心中无限的狐疑，连忙含笑点头称妙，劝说宝玉快去干正经事。让宝玉只得闷闷转步的描写，更是表现出林黛玉的价值观已经开始趋近于薛宝钗所代表的女德。宝玉写诔文已经不再被黛玉当作正经事，她的处世也不再那么直率，自觉与宝玉疏远不少。想必作者这些含蓄蕴藉的表达，很多读者都错过了。

## 四、钗、黛的和解与合一

欧丽娟教授表示，林黛玉作为贾母的宠儿，虽天性率真，但也终会成长，于是她和宝钗之间终究迎来了和解。从第42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到第45回，二人“金兰契互剖金兰语”，林黛玉越来越靠近薛宝钗的大家闺秀之路。她对宝钗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几个竟字，可以看出林黛玉感受到了来自宝钗真正的爱。她因感动而自省，绝非出于无知被收服。黛玉的可贵之处在于善于受教，理解宝钗的真心；而宝钗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帮助黛玉长大，由此二人才能结成金兰契。

黛玉不断成长，而宝玉则是抗拒长大的古代“彼得潘”，他们之间不同的成长速度造成彼此的嫌隙。欧教授发现，45回以后的林黛玉不必再用眼泪控诉哀怨，于

是眼泪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成熟。而读者的眼泪却越来越多，想必是将心中那个还没长大的小女孩投射到林黛玉身上的缘故——她们同样地渴望被爱、渴望同情、渴望找到迷茫中的追寻。

最后，欧丽娟教授强调，透过《红楼梦》，我们要看到曹雪芹复杂的精神，即人性的复杂、世事的复杂——而宝钗黛正是这种复杂性的具体体现。小说要追求永恒的真理，读者也要好好地做学问，这样才能看到其背后隐含的真相与哲理。正如第56回中宝钗与探春探讨的那样：“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了。”每一个人都要成长，只有摆脱不成熟，严正地面对世界，离开那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小我世界，才能形成一个大我世界。

王博教授在点评中高度赞赏了欧丽娟教授这种“不笑不哭也不痛骂”的解读态度，并认为这才是阅读《红楼梦》的至高境界。尽管按照庄子的哲学，没有谁敢说理解了一个人、一个作品，但人们总是试着去理解。欧丽娟教授通过特殊的女性视角来阅读红楼，让人感受到成熟女性对于红楼的理解；又从优秀人文学者的视角，通过严肃的研究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一些东西，带给我们关于宝钗黛关系的新解。最后他提出，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大观园中的女性，尤其是代表十二种不同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女性能以自己的方式成长，而不要让林黛玉变成薛宝钗？现代的世界是否能给予红楼女性们不同的命运以及更大的可能性？

欧丽娟教授表示，这个时代的确有更宽广的环境条件让这十二个女孩子活出她们既有的样貌（即曹雪芹目前展现出来的样貌），但她们还是要发展的。以林黛玉为例，她的率性是因为贾母的宠爱、众人的包容，是一种孩子气的形态。但人要懂得超越自我，并学会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这是任何一种人格特质都需要的能力。她会慢慢变成薛宝钗，这对传统女性来说是必然的。在作者生活的盛清时代，对世家大族的才媛们来说，婚前常常被比作谢道韞那般纯真、可爱又有才华。但如果她们能不早夭而顺利进入婚姻的话，则会蜕变成有助于家族的“班昭”。从谢道韞到班昭，就是从林黛玉到薛宝钗。

在师生间热烈的讨论氛围中，欧丽娟

教授也将自己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对于宝钗黛的理解，向更深层延展开去。假如人们在林黛玉身上看到的单线成长是纯真失落、人格毁灭，那么是否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即这种纯真只是因为不了解世界的复杂而已，而这世间还存在另一种纯真——陶渊明的“豪华落尽见真淳”。这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可以追寻的方向。“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苏东坡不仅没有被世间罪恶打击，沉沦，反而因此拥有了君子的大境界并在世事沉浮中依旧看到光明。人不应该只有从林黛玉到薛宝钗这样的单一人格成长路径，而是可以超越它，寻找到更多可能性。

（撰稿：熊晓晓）

## 51

### 林毅夫：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与北大立校 120 年——反思与前瞻

具体内容参见“文研周年”周年主题演讲。

## 52

### 科大卫： 寻找正统——乡村里的儒与道

具体内容参见“文研周年”周年主题演讲。

## 53

### 赵鼎新： 历史和时间性——中国社会科学视野与话语

2017年9月21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历史和时间性——中国社会科学视野与话语”。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赵鼎新担任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担任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本场讲座。

历史叙事与结构叙事是人类两种基本的叙事方式。历史叙事关注时间维度中特定事件对社会进程的意义，结构叙事则从一个时间截面社会中人群的阶层、收入等社会结构特征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现象。从事社会学的学者往往从结构的角度关注社会，而历史学家则从时间的维度看待历史。赵鼎新老师从事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一直致力于超越传统社会学的结构视角，将时间叙事的维度与之结合起来，找到历史叙事和结构叙事之间的关联。

讲座伊始，赵鼎新教授凭借自己在人生不同阶段对时间的不同感受提出这样的论断——通常人们所说的时间其实是一个社会化的时间，它往往被赋予了不同的理念和意义。时间观念的差异，潜在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看待社会的角度。已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暗含了多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以及对时间和时间性的不同处理手法。赵

鼎新教授认为，拥有异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具有穿透力的时间观，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掌握学术话语权的契机。

赵鼎新教授将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时间观念概括为四种典型的态度。在对其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四种更可靠、更具有穿透力的时间观，并逐一展开论述与点评。

#### 一、西方社会科学中对时间的四种态度

第一种时间观是没有时间的横向历史比较，体现在那些受到科学控制变量实验影响的研究当中。这些研究的特点在于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历史积累，而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对多个研究对象进行横向比较，代表人物有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彭慕兰等人。日本与中国为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路径分歧？为何在英国而非中国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在讨论上述历史差异的原因时，他们对某一特定时期两个国家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并将该时期的某些相异的要素作为后续发展差异化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论的逻辑基础其实来自于英国逻辑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发明的“穆勒五法”。这类研究饱受诟病的原因有二：首先，社

会学比较没有办法做到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精确控制变量，存在着大量作者不愿看到却又无法控制的差别，故其所提出的差异因素未必就是产生不同结果的根本原因；其次，这类研究关注某个截面上的结构因素，忽视了其他与时间相关的因素对案例的影响，如行动者策略、误判以及重大转折点等。



赵鼎新教授

第二种时间观是固定时间的纵向历史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指出某些在今天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上的文化因素。对历史中的某些固定特征来说，时间是“凝固的”。这类视角常见于政治文化研究当中，如白鲁恂（Lucian Pye）对中国政治发展中权威心理的文化心理分析、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对安源革命中传统文化作用的分析、国内的封建文化论等等。赵鼎新教授认为这类研究的问题有三：首先，传承或者保留下来的文化因素很多，但研究者为何只进行选择性地选取；其次，人类今古之间的相似性，有多少是因为传承因素而非面对相似问题时进行的必然选择（如官僚制）；再次，如果这种相似性来自于文化传统，它是如何传承下来的——毕竟文化不是基因，通常需要借助某些制度或者权力作为载体才能维系下来——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基督教教会与儒家的松散团体相比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传承作用。赵鼎新教授总结道，做研究不能抱有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态度，否则会扭曲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

第三种时间观是进步时间下的历史研

究，包括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此类学者隐约抱有一种进步主义的道德假设，认为历史进程会引向一个美好的未来或者验证一个美好的世界理论。

第四种时间观是多元史观下的历史研究。这种观点认为历史不存在进步也没有目的，每一个历史都是它自身的历史。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进步标准或者历史发展的目的，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是按照自己逻辑在发展没有一个统一的进步标准或者历史发展的目的——当前这种历史观占据了西方的主流。持有这种史观的学者往往会强调意外事件、分水岭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转折点等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元史观在结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指导学者研究了各地域、各类型的历史。但这种历史观同样面临着研究碎片化所导致的盲人摸象式研究，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此外，它还难以提供在没有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历史研究的意义。

赵鼎新教授在此总结道，历史虽然没有终极目标，但还是有迹可循。他随后介

绍了几种比较可靠的时间观。

## 二、四种较为可靠的时间观

首先是积累性发展时间。这种时间观认为历史是积累发展的，积累的方向就是历史的方向。在积累的过程中，经济竞争、军事竞争被视为两大驱动因素——它们不仅输赢准则清晰并且都能够促进社会的积累发展。经济竞争与军事竞争决定了历史积累发展的速度，形塑了历史的方向，促进了工具理性的发展。

其次是意识形态造就的多样性时间。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成就多样的时间理解与其特点密切相关：首先，理性状态中的意识形态竞争与效率驱动的生产没有关系，无法促进历史的积累性发展；其次，理想状态下意识形态竞争是不同价值观的竞争，因此并没有清楚的输赢规则；再次，意识形态本身没有强制性。因此，人们对意识形态的选择总是基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既不能强制统一，也无法决出高下，所以多元的意识形态必然可以造就一种多元的时间观念。

再次是中国本体的道家时间观和历史智慧。道家时间观的关键之处在于不断的转化和否定，历史有规律地处于不断转化之中；并没有螺旋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因此不存在一种终极目标与意义。赵鼎新教授认为，道家时间本体论很容易与社会机制研究结合发展为社会科学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涵盖法则：任何性质的组织和思想越强大，削弱它的社会机制就会越重要，它体现了道家贵柔、谦下、知足、见微的准则。在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

大量的案例：国家的持续强盛引发老龄化、利益集团固化、民众好逸恶劳等负面效应；一个成为社会主流的观念通常会因为过度实践与过度宣传走向谬误；一个占据学术市场的观念会因为追随者不遗余力地极致研究导致学术与经验偏离，反而为其他学术理论的出现铺平道路。上述这些案例揭示了一种正反馈的社会机制，将某种正确的观念放大后招致谬误。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社会观念当中，也存在于学术理论内，而且学术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合流，更可能因为这种机制的存在带来严重的灾难。

上述三种时间观是能动的、灵活的，可以在研究中以不同方式进行组合并加以应用——组合的结果则是这三种观念所叠加的复合时间观——也就是第四种时间观。

赵鼎新教授在结语部分谈到，西方缺乏强大的史学传统，所以少有关于时间的哲学——即便是黑格尔也更多地强调基督教对时间观的影响。这种时间观的缺陷，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有的毫无时间观念，即使有也是缺乏智慧的僵化观念。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时间观也深入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各种线性进步史观长期占据着主宰的地位，落后时鞭挞中国文化，发展时庆祝倡导传统。他最后强调，除了学术意义，道家的时间观还有更多的智慧意义，它能促使我们以更加平和的、非零和的心态看待世界。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赵鼎新教授也进一步深入地阐发了道家时间观和复合时间观。他认为，复合时间中的每种时间观念都在发挥作用，但并不存在特定的组合模

式，若认为存在某种特定组合反而落入西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窠臼之中。他还提到，人类是地域动物、经济动物、政治动物、意识形态动物的组合，人类的历史则是这四方面所对应的机制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果。西方社会科学界将这些机制进行简单化处理是没有智慧的表现。

时间是社会化的时间，没有人类就不

会有时间。客观的时间虽然存在，但是人类所指的时间会赋予其不同的意义。错误的时间观扭曲了真实，障碍了智慧，掌握可靠的时间观则能够对社会、对历史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撰稿：包培含)

## 54

### 王缉思： 当前国际秩序与世界政治趋势

2017年9月2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当前国际秩序与世界政治趋势”。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担任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本次讲座。

王缉思教授从“如何看待当今世界”这一问题展开。他认为，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内容：有的能维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的却并没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但最基本的世界政治的发展轨迹、规律和主题是稳定的，这就就体现并要求了问题研究中动态与静态、学

术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首先，王缉思教授对“国际秩序”的定义和演变过程进行了总结和回顾。基辛格曾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就欧洲、中东、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秩序规则进行探讨，且不限制于主权国家。国际秩序包括了力量格局和国际规则两个要点。其中，前者关注当今世界的力量组成部分，与实力对比、国际关系紧密相连（如联盟或反联盟的形成）；后者则相当于国际社会活动中需要被遵从的游戏规则。

由这些基本概念延伸，王缉思教授进一步阐述了现代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二战前，国际形势逐渐由多极格局向着同盟国、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转变。这

一时期虽同样强调主权与和平，但国际规则的实质仍旧在于以战争手段争夺领土、殖民地、势力范围和战略资源。二战后，联合国成立，国际秩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历史证明，人们不能只依靠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但冷战时期仍然存在着与联合国规则相悖的情况——即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形成与对峙。与此同时，民族解放的潮流打破了殖民地时期的固有局面，并推动了非殖民化的进程。

接下来，王缉思教授总结并分析了当前国际秩序的特征：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六大国际力量呈现出“一、二、三”的梯形权力结构。美国位于第一梯队，目前仍是唯一的、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与欧盟位于第二梯队，后者的经济体量虽大，但军事短板也较为明显；俄、日、印位于第三梯队，俄罗斯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日本则有着较强的经济和科技力量。总体而言，美欧日的“西方集团”仍占据着优势和话语权。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拉美、中东的部分国家）虽处在发展进程之中，但仍未形成核心力量。王缉思教授认为，六国之间存在西方和非西方的分界：西方国家有着共享的价值观，且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结成联盟。

王缉思教授认为，就目前的国际秩序和力量结构来说，西方仍具有一定的优势，但金砖国家的存在也正对这种既有局面形成冲击和挑战。现代的国际规则与以往不同，安全、自由、生态等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人的生命安全也被放在重要位置——这充分体现了普世性的共享价值。国际规则不再局限于国家层面，而与人类



王缉思教授

整体的命运相关。这种转向，与冷战后形成的整套秩序紧密相关。

国际秩序的基础，是世界政治及不同的价值观；国际关系的基础，则是世界政治和国家内部政治的深层变化，并与经济、文化价值等内容相关。王缉思教授援引基辛格《世界秩序》中的理论和实例：世界上的不同区域奉行着各自的秩序规则，这些秩序规未必能被所有人接受，但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奉者。

谈及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王缉思教授揭示了如下事实：战争正在减少，但毁灭力却在增强。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有四：首先，发动核战争的后患过大；其次，在战争成本高于自身建设的今天，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贸易、金融、教育、科技解决以往战争无法解决的问题；再之，发达的通信网络使得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得以就相关问题进行及时交流，并逐步建立决策和危机管控机制，防止冲突发生；此外，还包括核不扩散条约等限制，以及普遍追求和平的愿望等等。

与此同时，生态安全等问题成为新的

关注重点。随着物质财富和人口的大幅度增加，财富分配不均、基尼系数的走高使得社会的不平衡加剧。虽然在政府的努力下，贫困人口有所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财富被平均分配——贫富差距依旧较大。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成就：与上一时期对比，个人自由与尊严、族群和宗教的平等、女性地位的



观众提问

提高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这也证实，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社会的发展。然而“自由度”增加的同时，人们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这种限制并不完全来自于政府和法律，也来自于社会和道德。

在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上，王缉思教授展开了深入陈述：基于种族和文化的民族主义十分强大。在过去的国际秩序中，民族主义一度被压制，但个人自主意志却在逐步上升，民族认同得以产生并持续加强，民族主义的强大甚至逐步超越了意识形态。但民族主义只能提升内部的凝聚力，而不能从外部加强。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如影随形，且不会随教育和科技的发展自然消亡，社会经济发展、安全感、自由、社会平等因素与信教人数的多寡没有明显关系。宗教的发展历史甚至长于国家和民族，且不会轻易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然而相对乐观的是，全球政治体系正向着有序的局面迈进，整体来说，国际秩序是稳定的。王缉思教授认为，随着时代潮流的变迁，

信仰和公正将成为更大的问题——正如中东问题的棘手之处不完全在于资源，也在于社会的不平等。

王缉思教授随后对国际热点进行分析。首先，他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没有修昔德陷阱。他对中美关系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二者虽不时有矛盾发生，但不至于打仗。第二点是朝核问题，他认为不能爆发核战争，且此举破坏了核不扩散的国际规则。推动事态发展的两种力量还停留在前现代意识和旧方法——用这样的方法解决问题也是不可行的，应当尽量采用谈判等现代方式。第三点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如印度），对此，他保持了类似的态度和意见：考虑到战争爆发后局势将难以控制和解决，不能轻易采用战争手段。第四点是中东问题，这比朝核问题更为复杂、难解。该地区的乱局不仅是主权国家的问题，且仍会持续存在，甚至可能影响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此外，王缉思教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发展问题与贫困问题也表现了较热切的关注，他表示，

这些问题若未得到妥善处理更有可能发生冲突——尽管不一定以战争的形式呈现。其他的极端手段，如政变、革命与镇压等也是不可行的。一言以蔽之，国际社会应当通过政治手段妥善解决相关问题。

讲座接近尾声，王缉思教授重申了研究国际政治的几项要点：研究者应力求学术与实际相结合，当下与历史相结合，时刻谨记国际关系问题以政治为基础，并和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联系在一起，实现融会贯通。

交流环节，王缉思教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答。关于“宗教思潮能否建构起成型的世界秩序观”，王缉思教授认为，宗教可以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但其中存在一定差别。伊斯兰教国家和团体试图利用话语权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这一过程虽以宗教形式

表现，实际代表的却是宗教集团的利益。当民族、国家、宗教等不同层面的问题掺杂在一起时，局势将更为复杂，甚至会超越朝核问题——尽管后者并未涉及种族和宗教纷争。对于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中相对领导地位的变化，王缉思教授则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虽有所下降，但其硬实力并未削弱，经济和军事力量仍然强大，发展速度和水平依旧可观，所谓“衰弱”实则是与中国的上升进行对比而得出的。

最后，邓小南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发言，并希望文研院能够借助北大深厚的研究基础，发挥平台功能和作用，将相关议题进一步深化，面向学界和社会产生长远的辐射效应。

（撰稿：陈洁樱）

## 55

### 葛兆光： 蒙古时代之后的东亚——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例

2017年10月1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五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蒙古时代之后的东亚——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例”。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葛兆光担任主讲，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文研院学术委员袁明担任主持，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本次讲座。

葛兆光教授首先介绍了历史上两个著名的过渡时期：一是内藤湖南所讲的唐宋之间（中古与近世之间的过渡期），二是张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论及的晚清民初时期（帝制时代到共和时代的过渡期）。葛兆光教授继而发问：在蒙古时代之后的1368—1420年，对于东亚而言是否也是一个历史上的关键过渡时期？

他指出，14—15世纪之间，东亚有半个世纪之久的秩序调整时期：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1392年李氏取代高丽王氏建立朝鲜，同一年，日本足利义满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1400年安南黎氏取代陈氏；1405年，帖木儿去世，其帝国陷入汗位争夺，无力转向东亚。正如英国学者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所说，帖木儿之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东、西方形成了各自的历史世界。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调整过程中，朱元璋在外交上采取了妥协的策略，开启韬光养晦的洪武时代；足利义满也曾两次派遣使者入明要求朝贡，积极寻求沟通。这一时期，明朝与周边国家相对处安定局势。但在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东北亚三国的继承者（永乐、足利义持、朝鲜太宗）则试图改变这种相对平衡的东亚秩序，放弃了妥协的外交策略。1419年，朝鲜入侵日本对马岛，即“应永外寇”事件。日本视之如“蒙古袭来”，继而调整外交策略，派遣僧人无涯亮倪到朝鲜解决战争问题，两国关系缓和。1420年，朝鲜派遣宋希璟出使日本，写下了《老松堂日本行录》，

也即现存通信使汉文文献中的第一部。

15世纪20年代后，自蒙古时代初步连成一片的世界，又形成了“东是东，西是西”的分离状态。东亚各国在经济上联系，政治上独立，文化上相互竞赛，呈现出意识独立和文化觉醒的状态，并形成了一个以朝鲜“事大交邻”为轴心的国际秩序。这便是朝鲜通信使文献“长长的背景”。

随后，葛兆光教授介绍了朝鲜通信使文献的基本概况。所谓的“通信使文献”，指的是15—19世纪朝鲜派往日本的官方使团中，一些使臣或随员用汉文写下的各种记录，包括日记、笔谈、文章、诗歌和绘画。目前有关朝鲜通信使文献的总集，主要有成大中所编的《海行总载》（朝鲜古书刊行会）和辛基秀、仲伟宏所编的《（善邻と友好の记录）大系朝鲜通信使》。据《李朝实录》等文献记载，朝鲜时代的赴日通信使团达65次之多，人数大多在400至600之间，规模十分庞大。通信使由朝鲜的京城出发，至釜山开船，经过对马岛、一岐岛、赤间关（下关）、兵庫，到大阪后，弃船走陆路，沿着现今的东海道新干线路线到达江户。这其中，水路约三千余里，陆路一千三百里，大约需要五十天才能抵达。通信使的目的大致有三：一是互致友好，保持睦邻关系；二是刺探情报；三是吊丧、庆贺。

正如前文所述，通信使文献主要涉及日朝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那么中国为什么也要研究它呢？葛兆光教授详细介绍了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的史料价值：朝鲜是14—19世纪唯一与日本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它在中、日之间既起到了沟通作用，

也产生了阻隔。作为历史资料，通信使文献可被视作政治、文化与经济“情报”；作为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资料，它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东亚各国文化之间的认同与竞赛，并看清这背后的传统中国文化。葛兆光教授强调，朝鲜通信使文献并不属于海外汉籍。他认为，最好将“海外汉籍”限定为流落到海外的中国人所写的中国

的古籍，其与中国保留下来的古籍是同质性的；而燕行使文献、通信使文献基本都是以外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并用汉文写就的文献——二者需要区分清楚。

从研究情况来看，日本有关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的研究非常充足，大多集中在三个领域：其一是政治史与外交史领域，包括田中健夫、中村荣孝、三宅英利；其次是文化交流史，包括音乐、绘画等，这一方面研究非常兴盛；其三是贸易史与经济史，从物质交流史方面出发可以看到许多过去未曾注意到的东西。而中国有关通信使汉文文献的研究则相对缺乏：2010年之前，中国期刊网仅收录五篇涉及这方面的文献。

葛兆光教授继而将目光拉远，回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现代转型，并概括为：时间变短、空间放大、史料增多、问题复杂。其中的“史料增多”主要指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的发现。早在1938年，胡适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历史学大会时曾发表《近年来发现有关



葛兆光教授被听众热情包围

中国历史的新资料》一文，在民国史料四大发现之外便提到了日本、朝鲜所存的中国史料，但中国学者始终缺乏关注。除了吴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金毓黻编纂的“渤海丛书”、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和崔溥的《漂海录》以外，其他方面的研究均有所欠缺。

葛兆光教授指出，这种欠缺主要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不在场，历史便没有发生；我们不在场，历史与我们就没有关系。他继而举出两个例子来反驳，其一是壬辰之乱中大明王朝派出了两个使者，在中国史料中不见二人的“表演”，而朝鲜通信使文献则完整记载了二人的行为。其二是1711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完整观赏了宫廷乐舞表演，并保存了唐乐的套曲，而这一套曲在中国的历史资料中从未记载。故而，不在场实际也是一个在场者。

在本场讲座的第四部分，葛兆光教授总结了四种在历史研究中易被遗忘的历史类型：被删除和遗忘的历史、被想象的历史、没有发生过的历史、不在场的历史。那么，





葛兆光教授

通信使文献这种“不在场的历史”是否可以被讨论呢？葛兆光教授从政治对峙与文化较量的角度进行了解答。在政治上，礼仪、名分与制度往往是文献中纠缠最多、篇幅最长、差异最大的地方。以年号的使用为例，朝鲜习惯使用中国年号，而日本认为使用中国年号是把自己纳入了朝贡体系之下；但若使用日本年号，朝鲜则表示反对。此外还有称呼、避讳以及礼仪等问题，虽然这是日韩之间的较量，背后所遵从的仍是中国传统。中国不在场，但它的影响时时都在。另一方面尚有在文化上的较量，比如风俗、学问和衣冠，朝鲜认为自己所穿戴的是大明衣冠，而日本认为自己所用的是周冕、程子冠，比朝鲜更古老——实际上是东亚三国在较量中寻求自尊的表现。

随后，葛兆光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总结：一，不在场的历史亦可以研究，不在场也可能是隐含的在场；二，在 14、15 世纪以后，东亚三国开始出现了自尊独立、文化较量的现象——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

结束了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笼罩一切的局面。

最后，葛兆光教授提出了三点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新材料引出新问题：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如何拓宽史料的边界？比如，从朝鲜文献中可以发现，道光年间的读书人最崇敬的文学家并非龚自珍、魏源，而是湖北人陈沆、广西人陈继昌、四川人王炳瀛、安徽人凌泰封——后者皆是当时的状元、探花。这便引起我们对于文学史的思考：文学史所写的究竟是当时人的文学史还是事后重新评价的文学史？

二、互相观看与不同立场：有关东亚的历史与文化，中国学者应当参与对话吗？中国历史学界一般较少提及东亚、亚洲的概念，而日韩都有较深厚的研究东亚史的习惯。许多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事件可能有着超越国境的背景。以明清易代为例，它不仅是中国的事情，更涉及到当时的蒙古、满洲、朝鲜、日本、大明，要考虑倭寇与壬辰之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三、放宽历史研究的视野：如何把中国史放在东亚、亚洲和全球史背景之中？比如蒙古入侵日本事件，如果观察东南亚各国的反应，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看起来是某国的事情，实际上是个国际事件。因此，研究中国史不止要阅读中国的史料，还要有宽阔的视野。许多史料对中国史研究来讲，不仅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改变。

（撰稿：杨晓清）

## 葛兆光：朝贡与认同 ——以 1790 年安南使团赴热河为乾隆祝寿说起

2017 年 10 月 12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五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朝贡与认同——从 1790 年安南使团赴热河为乾隆祝寿说起”。文研院特邀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教授葛兆光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聪教授、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中文系张鸣教授、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董强教授，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李开元教授出席本次讲座。

葛兆光教授从 1790 年安南使团赴热河（今承德）为乾隆祝寿说起，概要地介绍了此次祝寿事件的始末。清廷庆祝乾隆八十寿辰，蒙古、回部、哈萨克等内属使团，安南、朝鲜、南掌等外藩使团均前来参加庆典。庆典中有一件事格外引人注目，一年前战胜清军、逼迫清廷不得不承认其合法性的安南国王阮光平亲自率团前来，且在隆重的典礼上身穿大清衣冠，表现得殷勤谦卑。此举使得乾隆喜出望外，却引起了朝鲜等使团的不满。

祝寿庆典上安南君臣“易服色”事件，反映的是包括安南、朝鲜在内的东亚范围内（中华朝贡圈）的历史问题。葛兆光教授梳理了此问题的缘起，指出：西方进入东亚之前，北京（或者承德）是东亚各文

化体交汇和表演的最重要平台，所以乾隆祝寿反映的也是一场“各国之间的比赛”。由于东亚各国的政治位置早已排定，进贡物品也早已规定，因而此次比赛的重点不是政治、经济，而是文化。衣冠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用来区分华夷、内外，在中华朝贡圈内是一种建立国际秩序的主要方式。

随后，葛兆光教授通过“朝鲜燕行使者的观察与诧异”、“安南国王来朝”、“黎阮嬪代”、“万寿节庆典上的安南使团”、“冕旒衣冠：政治承认与文化认同”五部分内容，深入分析了乾隆祝寿庆典上安南君臣“易服色”事件的细节及其政治意义。

1790 年阴历七月，朝鲜使团到达承德，与同来贺寿的安南使团相遇。朝鲜使者发现有一些异样：通常，来朝觐的安南使者的服饰与大清不同，而与朝鲜大体相同；但这一次，安南君臣却在最隆重的场合改穿满清服装。朝鲜使团感到诧异，副使徐浩修便找机会故意问道：“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吏部尚书潘辉益尴尬回答，穿大清衣冠服色只是权宜之举。安南工部尚书回应说“衣冠适有从今制”。在徐浩修的追问下，安南使臣“语颇分疏，面有愧色”。

乾隆对此次安南使团来朝格外重视。得知安南新国王阮光平亲自率团祝寿，乾

隆皇帝更是频频指示下臣沿路细心招待，安南君臣也表现相当郑重谦卑。阮光平准备了丰盛的礼物，并让潘辉益事先撰写了《钦祝万寿词曲十调》，再三表示对大清的忠诚，望以乾隆皇帝“为师为父”。对此，乾隆甚为欢喜，表示“王既以父视朕，朕亦何忍不以子视王”。



现场座无虚席

随后，葛兆光教授通过若干图像资料介绍了安南使团祝寿事件的背景。《安南国王黎维祁至避暑山庄图》描述的是，1787年安南前国王黎维祁被崛起的西山阮光平赶出安南都城，无奈之下投奔大清。1788年，应黎维祁反复请求，清廷派兵进入安南，助其收复安南都城，并再度册封其为国王。1789年正月初，阮光平发动反击，打败清军。黎维祁再度逃回大清乞求保护，黎氏政权宣告结束。《阮惠遣侄阮光显入觐赐宴之图》描述了1789年，阮光平派其侄（一说其弟）阮光显到北京“贡表入贡”，谦恭地声明推翻黎氏是“蛮触自争，非敢抗中国”，并表示次年阮光平会亲自到中国朝贡。清帝最终决定采取现实外交策略，同意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葛兆光教授认为，这次册封看似是大清帝国接受藩属国“输诚”，实际却是胜利者西山阮氏出于现实的考量，以期获得政治合法与军事安定。

综合来自清朝、朝鲜、安南多方面的史料，葛兆光教授详细梳理了安南使团祝寿庆典的行踪。七月十一日，安南使团在

承德避暑山庄以臣藩之仪拜见乾隆皇帝，阮光平“班次在和硕亲王之次”；七月十三日，安南使团被特别招至到内殿，“诣四知书屋”；七月十四日，“奉颁国王与陪臣冠服”；七月十六日，安南使团呈上《钦祝大万寿词曲十调》，并请求允许他们穿满清冠服朝见。对此，乾隆十分高兴，写下《安南国王阮光平乞遵从天朝衣冠，嘉允其请并诗赐之》，安南君臣“惕然感怀”，作诗回应。然而，此举却受到来自朝鲜等国使臣的鄙夷。

随后，葛兆光教授介绍了大清、安南、朝鲜之间关于“冕旒衣冠”的细节，以此来解释其所象征的政治承认与文化认同。并介绍一个小插曲：1790年三月，福康安报告乾隆帝，表示阮光平因为“欣慕中华黼黻”，派人在湖北汉口购买蟒袍。乾隆帝知晓后痛斥福康安糊涂。原来，汉口所购蟒袍并非满清衣冠，很有可能是戏台上的汉家衣冠。葛兆光教授分析，一方面，乾隆对于服饰如此注意，表明衣冠在清朝政治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汉

族传统政治观念中“改正朔，易服色”的影响。从明代承认李朝朝鲜以来，李朝朝鲜就实施所谓“事大”策略——这种“事大”的策略带来“尊明”的习惯，历经数百年成为“文明”的象征，甚至到明清易代之后，这种传统惯性仍然支配了朝鲜人的观念，使得“大明衣冠”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正统冠服。基于此，朝鲜使臣鄙视安南人这种为了现实利益而摒弃传统文明的策略，认为“著满洲衣”不仅意味着政治的臣服，还意味着文明的背叛。

在总结阶段，葛兆光教授先从研究的角度阐述了他的所思所想。他认为，目前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发生以下三方面变化：一，注意到朝贡制度与朝贡行为存在差异，即不再把历史文献中的朝贡制度，当作区域内各国的交往现实；二，研究朝贡体系，不能只依靠汉文文献，还应当包括越南、朝鲜等外国文献，并以对方视角作为补充；三，充分意识到朝贡体系的复杂性，改变原有的捆绑式研究方法，并将政治、经济、文化区分开来单独研究。

随后，葛兆光教授从安南君臣“易服色”事件本身，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为何清代内部及外部藩属国对于衣冠辨发如此敏感？东亚诸国对于大清帝国是否存在文化上的鄙夷？大清帝国处理“内部”秩序的手法，为何不能成为处理“外部”问题的方式？第二，安南与大清之间的斗智与角力，体现了“朝贡国”与“宗主国”之间怎样的关系？朝贡国是否一定处于宗主国控制之下？这种朝贡体系内的国际关系与西方“殖民体系”有何不同？对于安南来说，朝贡、册封、贺寿、易服，

意味着什么？第三，十四世纪之后东亚各国对中国的政治承认和文化认同，在十七世纪中叶的清代，有哪些新的变化？明清易代导致的东亚各国对于中国的认同变化，是否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是否会导致各国心目中“传统中国”与“现实中国”、“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分离？

交流环节，与会学者与同学热烈讨论、提问，葛兆光教授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答。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历史，对当今中国与周边之间关系的影响，葛兆光教授抱持不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明清以后，中国与周边各国渐行渐远。关于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出现的近代型外交关系，葛兆光教授补充说，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俄条约不同文字的文本可以发现，中国和俄国事实上已经从自我想象的朝贡关系转为实质上的对等条约关系。至于安南是否认同清朝，葛兆光教授则认为，安南将政治承认和文化认同区分开来——即在文化上可能认同传统中国，但政治上则向现实的清朝妥协。

最后，院长邓小南教授总结发言，她认为葛兆光教授以新思路和多元的史料，分析乾隆祝寿庆典安南“易服色”事件，理解朝贡体系，并揭示了不同国家的历史论述背后所凸显的东亚历史问题。

（撰稿：王梦倩）



## 56

戴燕：  
中古文学史的再脉络化——以五篇文献为例

2017年10月1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六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古文学史的再脉络化——以五篇文献为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担任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担任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参与讨论。

中古文学史即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戴燕教授首先解释了对这一段文学史的脉络进行重构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与古代相比，近代以来的文学研究方法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追慕传统模仿古代诗文而研究文学史，更是在西方现代学术研究体系和当代文学的环境中去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当代学者们沿着作家作品研究的方法几乎穷尽了魏晋南北朝所有作家。若继续沿用“古法”，很难再产生新的见地，因此，我们不得不试着采用新方法来审视中古文学。其二，上个世纪，由刘师培、铃木虎雄奠定的中古文学史“文学独立于经史”“文学的自觉”的大判断已经无法囊括当今丰富的研究成果——近当代诸多学者在乐府诗、佛教与文学、道教与文学、玄学与文学等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学术脉络把这些新发展起来的领域包含进去。

本次讲座，戴燕教授带来了五篇魏晋

南北朝的经典文献，并以此为例向大家展示近年来思考中古文学史研究而得出的新思路。这五篇文献分别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孙绰的《喻道论》、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魏收的《魏书释老志》与唐人编录的《隋书经籍志》。戴燕教授认为，这几篇文献展示了中古文学史再脉络化的多重角度，并逐篇讲解了选取该文献的原因。

《声无哀乐论》讨论的是魏晋时期玄学中十分重要的论题：到底是“声无哀乐”还是“声有哀乐”？这篇文章以二人辩论的形式展开：一人为秦客，主张“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另一人为东野主人，主张“音声犹臭味在天地之间，无关哀乐”。伴随着辩论的深入，嵇康一步步论证声音和人的感情是没有关系的，及“心与声为二物。躁静者，声之功；哀乐者，情之主也，声与心殊途异轨。”除了这篇极富思辨性的音乐美学论著外，嵇康本人也是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文人之一——上承建安，下启曹魏，他的文章绝对可以被视作曹魏时文人的代表作。

《喻道论》的作者是孙绰，《晋书》称其为当时最了不起的作家。此外，作为东晋文人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他交友广泛，不仅与名僧有所往来，在会稽时也整日与谢安、王羲之等人谈文论道，并参加了东

晋最为重要的兰亭集会。因此，孙绰可以被当作东晋文人的一个代表。《喻道论》中，“喻”是比喻，“道”是佛之道，整篇文章便是在讲“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孙绰认为，佛教与儒教同气连枝，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一一调和——这也是他在《喻道论》中进行的工作。首先，儒家和佛家都讲因果报应；其次，佛家讲究不杀生，儒家则讲杀一救百，在这个面向上二者殊途同归；再次，儒释二道，一个人世一个出世，但终究不过是圣人要众人产生觉悟的不同方式罢了，“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两种方法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冲突的；最后，佛家讲出家，而儒家讲究孝道，对此，孙绰指出，其实儒家自身也承认“忠孝两难全”，而佛教讲的实际上也是大忠大孝。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流行冲击了中国文化的根本，面临这样的局面，《喻道论》做出的调和之举是十分重要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辩也贯穿了整个中古时代。

《宋书·谢灵运传论》的作者沈约是横跨宋、齐、梁三朝的枢纽人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享有名望。谢灵运死后五十年，沈约为其作传。作为史官，沈约除了在传记中记叙谢灵运文章之美外，还在“史臣曰”部分写下了有关文学史的心得以及自己的文学理论。沈约认为，心中有感想并通过歌咏抒发出来便成为了文学，也就是最早的诗经；后来经由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王褒、刘向、杨雄、班固、崔骃、蔡邕、张衡、二祖陈王之流不断发展，便是到了潘岳、陆机——也仍是对汉魏文学的一脉相传；之后的孙绰、许询转向玄学，至殷仲文、谢混时则开始扭转这个风气；

最关键的人物谢灵运，从他才开始真正扭转玄学的文风。因此，沈约是将谢灵运纳入文学史脉络中，并从改变时代风气的角度对其做出高度的评价。此外，沈约还谈及自己对于文学的见解——“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符合此标准的作品自然是罕见的，就连他自己也表示“请待来哲”。这也为那个时代的文人赋予了文学史上的历史使命感。

《魏书·释老志》的作者魏收是经历过北魏、北周、北齐三朝的著名人物。他不仅能写诗文，还能写军国文章（比如诏令、檄文等）可谓“国之光彩”，也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魏书》分有序与“文苑撰”两部分。“文之为用，其来已久”，和沈约一样，魏收也谈及自己对于文学史的理解。魏收笔下的文学史与沈约的文学史有所不同：魏收从战国时期齐国稷下的淳于髡和屈原开始算起，沈约则从屈原开始算起。魏收认为，东晋之后，北方写檄文的多，感情诗文的少，没有什么文学意义上的文章了。此外，《魏书·释老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第一部对佛教道教进行记载的正史。《释老志》分佛、道两部分：前一部分介绍了佛教的传入过程、佛本生故事、重要的佛教经典以及著名的僧人，记叙了佛教在北魏东魏的情况，还展现了佛教对社会政治的影响程度之深；后半部介绍了道教的发展历史、传道宗旨、寇谦之的清整及其通过崔浩与佛教分庭抗礼的过程，基本上呈现了北方天师道的状况，可以结合《真诰》来了解南北朝的道教。



戴燕教授

《隋书·经籍志》是一本目录，记录了南北朝到隋的书籍，包含《楚辞》（10部，29卷）、《别集》（437部，4381卷）、《总集》（107部，2213卷）三部分，虽然它记录的很多书都只剩下书名，书都失传了，可是仍然不妨将它看成一个大图书馆式资料库，通过书的名字、分类了解到底有过多少书籍、多少文学史的著作。如果和《汉书·艺文志》对比，还可以通过这部文献看到文类、题材的变化，比如楚辞类的著作就在逐渐减少，而别集则在后代大大增加。

以上五篇文献是否能带来中古文学史研究的新脉络呢？对于这个问题，戴燕教授认为：首先，这里使用的已经不是近代以来研究作家作品的方法了，也没有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现代西方文学史研究思路的介入；其次，文献涉猎的领域很多，也

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过去的研究成果；再次，这五篇文献使用的也不是近代以来人们所习惯的感情的、诗的文学观念，或许可以用来突破来自近代西方文学观的束缚，返回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语境。

随后，戴燕教授又对这五篇文献进行简短总结：《声无哀乐论》中讲的是传统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乐，不了解文学与礼、乐的关系，无法真正理解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喻道论》强调佛教和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没有矛盾，都是士人应有的修养，从这里可以了解南渡后的士人如何安顿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对研究他们的写作十分重要；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对齐永明以前的文学有一个总结，认为从屈原以来一直到汉魏晋文学都是一脉相承的，东晋有所变化，东晋末刘宋初谢灵运他们有带来一个转折，永明以后将要开启一个

新的阶段，这也是沈约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和历史使命感；魏收在《魏书·释老传》中将释老二家收入正史，将其归入了中国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佛道教给北朝的文明带来了巨大影响，而这些影响是不局限在诗文的小框架里的；《隋书·经籍志》是书籍文化史的重要文献，它也是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的总结。

讲座最后，戴燕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五篇文献虽然不算文学经典，却实实在在地提出了一些当时人们真正关心的文学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文献了解在中古时

代的文学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到底在关注、焦虑些什么事情，并以此来体察那个时代的氛围、环境，也可以在通过这些文献所涉及议题的转移体察中古文学的变化和发展。

评议环节，傅刚教授与张鸣教授对戴燕教授提出的新研究脉络表示赞赏，也对当今青年学者在研究中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寄予期望。

（撰稿：孔博琳）

## 戴燕： 洛神赋再研究——在文学、图像与历史之间



2017年10月19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六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洛神赋再研究——在文学、图像与历史之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担任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杜晓勤担任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中文系教授张鸣出席本次讲座。

本场讲座中，戴燕教授从文学、艺术和历史三个维度重新解读文学名篇《洛神赋》。首先，她从文学的角度评析《洛神

赋》的主要内容、篇章结构和写作手法。

《洛神赋》作于三世纪，收编于五世纪《昭明文选》，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描写的是君王曹植与洛神宓妃在洛河的梦境中相遇、相爱又相离的故事。与《洛神赋》共同收编于文选的，还有宋玉的《神女赋》和《闲情赋》，通编为“情赋”。以《昭明文选》为代表的系列文学名篇，成为唐代之后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宋代流传一句俗语，“文选烂，秀才半”，意思是，熟读文选，便可成为半个秀才——

这里的文选指的便是《昭明文选》。《洛神赋》被收编其中，可见其文学价值。对于《洛神赋》的注解和分析，唐代以后形成许多知名的作品，如李善注、五臣注等。除了文学作品，书法和绘画也多有《洛神赋》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佳品，如王献之的书法作品传世有《洛神赋十三行》，还有传为顾恺之的绘画作品《洛神赋图》。到了当代，洛神亦成为舞台和大荧幕上的活跃形象，其传说也成为文艺工作者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

作为文学研究者，除了通晓作品表面的涵义之外，探索背后深层的文学寓意是更为重要的研究任务。戴燕教授总结了我国文学研究史上解读《洛神赋》寓意的两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情爱说：《洛神赋》实际上讲述的是曹植与其嫂嫂、曹丕的夫人甄氏的爱情故事。第二种观点是君臣说：这种观点发端于屈原以来的文学传统，将男性与女性的恋爱关系视为君臣关系，即思君恋主的表征。戴燕教授从上述两种研究脉络出发对《洛神赋》展开新的探索。她很称赞沈达材在《曹植与洛神赋传说》一书中使用的方法，认为沈达材是中国第一个运用现代方法研究文学作品《洛神赋》的学者，他强调学习胡适“历史的研究”法，重新解读文学作品和文学材料，并得出了可靠的结论。他不同意“情爱说”的说法，转而将研究的视角落在“宓妃”这一人物形象上，并回归屈原的《离骚》和汉赋，重新梳理有关宓妃的文学作品发展脉络。沈达材发现，后人之所以常常将《洛神赋》解读为曹植和甄氏的爱情故事，主要受到李善注中无名氏的“记”的影响，



而在此之前，并无这样的解读。这是沈达材为《洛神赋》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沈达材的研究基础上，戴燕教授继续挖掘《洛神赋》更为深远的文学意义，并做出了独特的判断。第一，关于人物形象的来源问题，最早出现其形象的文学作品是《离骚》。一直以来，宓妃都是男性印象中的佳偶，并与众女神一同出现，且她现身地点多变，并非限于洛阳。第二，关于创作背景的问题，戴燕教授提到了蔡邕的《述行赋》。在该文中，蔡邕奉命前往洛阳，半路遇大雨而不得前行，返途中心郁闷，于是便联想到洛河中的宓妃，曹植在创作《洛神赋》时，心境与蔡邕非常相似。第三，写作手法方面，《洛神赋》借鉴了宋玉的《神女赋》和《高唐赋》。

具体来讲，文章结构上，宋玉笔下的男主角楚襄王在梦中与女神相遇，后又跳出梦境由宋玉进行记录和描述。由此，故事一直在梦境与现实中不断切换。曹植的《洛神赋》也采用的这样的手法，将整个故事植入梦境。至于描写手法，曹植在《洛神赋》中运用大量篇幅描绘女神的形象，如美貌、形态、服饰等——这也与宋玉的写法类似。不过，曹植的刻画更加深入了一步，他继续深描洛神的心理、修养等人性化的内容，使人物从平面走向立体，成为真正的主人公。最后，叙述角度来看，宋玉的《神女赋》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叙述，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即楚襄王和神女的故事。曹植的《洛神赋》则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贯穿始终，讲述了“我们的故事”，即我和洛神的故事。这种叙述手法的改变，为读者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仿佛自己也化身为曹植，亲临他的梦境。因此，后人对于宋玉的讨论，多集中于“宋玉是否为真正的作者”；而对于曹植的讨论，则多集中于“《洛神赋》背后的真正寓意是什么”。

接着，戴燕教授从艺术史的研究视角出发，继续剖析。戴燕教授以辽宁博物馆藏的《洛神赋图》为例，分别介绍了俞剑华教授、陈葆真教授和石守谦教授的研究。戴燕教授指出，她从这三位先生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中获益良多。俞剑华教授于上世纪60年代出版《顾恺之研究资料》一书，并对顾氏《洛神赋图》做了详细解说。他认为，该图在本质上来说是《洛神赋》的连环图轴——这既为《洛神赋图》下了定义，也高度概括了二者的关系。《洛神赋图》可以使观者很容易地

辨别哪位人物是君王——与周围人相比，君王的形体较大些。此外，《洛神赋图》中的人物形态非常生动，如曹植的人困马乏、洛神的曼妙婀娜，以及后者离开后前者的失落等等。就构成方式而言，该图一部分内容按赋文的陈述所做，另一部分内容依照当时的绘画程式所做。戴燕教授提到的第二项研究为陈葆真教授于2012年出版的《〈洛神赋图〉与中国故事年画》一书。陈葆真教授运用“数句子”的方法进行研究，她发现，《洛神赋》共176句，其中20句是散文，156句是韵文。韵文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既押韵，又有节奏感——这也是《洛神赋》成为文学经典的原因。戴燕教授借鉴此法，她发现，《洛神赋》中有210字以洛神为主角进行描述，又有318字描述君王与洛神的相遇。从字数上看，二者占据了文章极大的篇幅，同时也彰显出其重要性。陈葆真教授还关注画家如何将文字转变为图像，并为《洛神赋图》下了定义：以山水为背景的人物故事画卷。她以分段落的形还发现，画家在转译文字时运用了直译、隐喻、象征、暗示等手法。在表现“人神道殊”时，画家将君王及八位侍者安排在一边，而洛神一人在另一边；再如，当洛神准备离开时，她一人处于水中，而君王等人则立于岸上，二者以文字相隔，这表达了二者永远无法接近的意涵。

第三项是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石守谦教授关于《洛神赋图》传统形塑与发展的研究。戴燕也接受了他的一些看法，并应用在自己的研究中。以石守谦教授的观点来看，《洛神赋》作为一篇文学名作，呈现出文字、

书法和绘画三种不同的艺术形态，其经典的艺术形象也被这三种不同的媒介形式勾勒出来。石教授在对比了《洛神赋》与《洛神赋图》时发现，前者用大量的篇幅描绘女性的美丽形象，而后者则刻意避开女性美，更多地在神怪上着墨。针对这个现象，石守谦教授认为，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画家愿在文字上与曹植展开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受到当时绘画流行题材的影响，即为图画增加奇幻感。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戴燕教授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为《洛神赋》和《洛神赋图》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第一，在文学作品《洛神赋》中，曹植与洛神的故事随现实与梦境的交替不断推进，故事结局则与写作手法相同，即君王回归现实。而绘画作品《洛神赋图》没有这种切换——图中的人物始终处于同一个空间。第二，赋文的特点是漫长的铺陈描述，情节进展缓慢；转化成图像之后，观者可以迅速抓住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在赋文中，读者读到的是“我们的故事”；在绘画中，观者看到的是“他们的故事”。由此，绘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文的叙说结构，为读者和观者带来全新的感受。第三，赋文中的洛神，是一个虚构的形象，每一个读者都会想象一个属于自己的洛神。而图中的洛神直观而直接，成为一个固定的、实在的人物。洛神是一位美丽的女性，“余”（即曹植）是一位帝王形象的男性，这也是文字转译为绘画后产生的又一个效果。戴燕教授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虚构成分，为读者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绘图在再现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消解了文学的想象性和虚构性。

一直到后来，都有许多人将《洛神赋》解读为曹植和甄氏的爱情故事，可见绘画作品发挥的巨大作用。

接下来，戴燕教授继续从历史的角度解读《洛神赋》。她从李善注出发，剖析了曹植与甄氏的爱情故事的塑造过程。曹植与甄氏的故事最早出于李善注所引用的“记”，不过其来源和真实性一直无从考察。但是，由于《三国志》、《世说新语》等详述了曹植与曹丕的皇位之争，以及曹夫人甄氏冤死的故事。戴燕教授认为，作为政治牺牲品，曹植和甄氏被后来人想象为值得同情的悲剧人物。虽然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尚待商榷，却为后人理解历史提供了一种渠道。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在文学作品中为曹、甄二人制造出一段爱情悲剧，能够满足读者的扶弱锄强心理。同时，鉴于赋是一种较为难读的文学形式，赋予其一个故事，可以增强其可读性。

从顾恺之的绘画，到李善的注释，再到民间艺术形式的表现，这种混合的历史记忆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史实”，使得曹、甄故事的真实性显得确凿无疑。到了近代，学界依然存在争论。1943年，郭沫若发表《论曹植》，将曹植与甄氏的故事确定为真实的历史事件；1948年，逯钦立从史学角度反驳郭沫若的观点，他认为，甄氏嫁入曹家时，曹植只有13岁，不可能发展成为恋爱关系；1955年，吴祖光拍摄由梅兰芳演出的京剧《洛神赋》电影，影片将曹植与甄氏的故事刻画为完整的爱情故事。那么，《洛神赋》背后的寓意到底是什么？在当时，人们无法得出确凿的结论，只得摆出两个选项——要么是男女恋爱，要么

是思君恋主。

戴燕教授在解读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洛神赋》创作寓意的新观点。她认为，在建安时代，“邂逅女神”是文人创作的流行题材。当时，不仅有曹植描写洛神，其他文人也撰文描写他们所遇到的女神。汉代的政治传统关注帝王大一统，许多文人在描写君王与女神时，打造的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形象，此举意在强调帝王的一统形象。东汉后，洛神成为固定的洛河神女，是因为洛阳在当时为都城，洛神的形象隐含了都城庇护神的意涵。在《洛神赋》之前，宓妃的形象并不固定，是曹植将她的形象刻画得真实起来，并赋予她美丽的容貌、极好的修养、恋爱的心理。由此，宓妃的形象固化起来，成为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女主角。

戴燕教授接着讲述了几个以甄氏为主角的民间故事，如《搜神记》《聊斋志异》等。她认为，文学作品中描述男性与神女的相遇，代表了男性原本的欲望。《洛神赋》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不仅因其极高的文字价值，还依托了书法作品、绘画作品、历史传说等不同媒介的不断提升。实际上，民间关于神女的传说存在诸多种类，且故事发生、发展和结局采用的结构基本一致，洛神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洛神赋》高雅化、政治化的表达，将故事的本质重新打回到人和人之间的欲望的层次。

戴燕教授在讲座最后进行总结。第一，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时，常常苦于材料不够丰富，便寄希望于借鉴不同媒介、不同材质的资料（如绘画、石刻等）以拓展研

究材料的宽泛度。在借鉴的同时，必须学习诸如艺术史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丰富文学研究的手段。第二，在最近流行的文学和艺术跨学科研究中，有些人只是满足于以图证史或以文证图。她希望要更多地关注不同学科间在进行碰撞后发生的变化，或是不同材质的媒介进入一个素材后发生的变化，让1+1>1而不是1+1=1。

讨论环节，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高度赞扬了戴燕教授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模式，不仅内容全面、条理清晰，还引入了新的研究介质与研究方法，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突破。张鸣教授还认为，绘画视角是文字文本转换为图像文本的最关键之处。例如《赤壁赋图》，其视角是正前方俯视，而《洛神赋图》的视角略微仰视，基本平行。画家的视角代表了他如何理解文学作品，这是研究文学作品、研究绘画作品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撰稿：张旂旒）



57

## 吕植： 三江源与游牧民的未来



吕植教授

2017年10月1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三江源与游牧民的未来”。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担任主讲，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吴虹担任主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沉简出席并参与讨论。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地，是孕育中华文化和中南半岛历史文化的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三江源不仅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也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担负着重要角色。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等一系列生态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生活在三江源的游牧民放下牧鞭，他们的生活与未来，引发了学者的思考和探索。

吕植教授首先从三江源的地理位置、人口地图切入，介绍了三江源特殊的自然环境。虽然地处高人口密度的亚洲区域，但三江源却因高海拔的地形缘故将许多人拒之门外，其生态系统也因此得到较为完

好的保存。三江源是全球大型食肉动物图谱中非常集中的一片区域，也是独特生物种类繁多的重要区域，食肉动物、食草动物等群体生活其中，形成了完备的营养级。此外，三江源还融入了家畜和人群，与这里的野生自然和谐共生。尽管牧民的最初到达时间难以精确，但三江源的游牧痕迹可以追踪到几千年，甚至万年以前。

吕植教授强调，除了自然系统，三江源的社会系统也极具特色——文化在自然保护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同胞，还保留着对众多神山圣湖的原始崇拜。藏传佛教神的体系非常庞大，对当地牧民来说，释迦摩尼显得相对遥远，但山神、湖神却近在咫尺，且各有特性。牧民对他们充满敬畏。吕植教授认为，老百姓对山神的敬畏，与对资源的利用形态密不可分。游牧民长期靠自然资源生活，所以维护三江源的自然生态系统就成为他们的戒律，甚至说信仰。上世纪九十年代，她第一次到西藏考察时就发现，一个官方的自然保护区下隐藏着55个老百姓自己设

立的保护区，即神山。尽管各地牧民自己圈地保护的神山、神树、风水林等面积较小，但综合起来却不可小觑——四川甘孜州牧民的保护区几乎占了全部地域面积的20%。政府设立的保护区往往也都在当地人的神山之上，牧民会自发地组成环保小组，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及居住在此的野生动物。

关于三江源的生态建设，吕植教授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参与式自然资本空间治理体系。该体系的核心要素是科学保护、全民保护，让生态服务惠益全民。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点：一，以农牧民为主体，进行自然资本监测和管护；二，以自然资本空间治理为内涵，建立制度，责任到人；三，进行网格化管理，实施公益管护员制度，确保本底清晰，趋势明了，绩效明确；四，形成信息和保护的效益，创造“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回馈当地，即通过人兽冲突方案、公益管护就业、自然体验收入等方式惠益全民；五，广泛的社会参与，以咨询、设计、数据分析、培训等形式补充当地力量。吕教授特别提到，三江源的科研工作者数量很少，所以他们往往邀请当地牧民协助收集基本信息，同时，也想办法让游牧民获益。具体方式有培养自然导赏员，再邀请外来有组织且付费的人看动物，为牧民提供额外的收入渠道。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的16000个公益岗位，也正是以生活在那里的16000户牧民为基准的。此举既提供生态补贴，也解决了他们的脱贫问题。总之，三江源的保护模式核心是：老百姓身体力行，并从中受益，而生物保护、生态持续则是最终结果。

对于草地资源的退化问题，吕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草原气候喜怒无常，高原天气更是瞬息万变。基于此，草原也会随着天气快速变化，甚至可能在稳定和不确定之间变化。当地牧民都在反映草地在退化，但对于退化原因，始终缺乏定论。吕植教授认为，气候变化是原因之一。这里所说的气候变化不是降水量变化（观测显示降水总量是稳定的），而是温度的变化——气温升高致使表层变干，草原储水随之变少。此外，政府官员、科学家们常常认为是过度放牧导致了草地退化，对此说法，牧民们并不认可。吕植教授表示，草原的政策变化才是重要原因：1984年牲畜分户，1994年草原分户，2003年退牧还草、定居工程、草场围栏，2005年三江源保护工程、生态移民、草场围栏、减畜禁牧……这些政策对草地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牧民原本四季游牧，逐水草而居，在一处停留时间不超过一个月；机制上，十户一组，人口数量约为现在四分之一。现在，放牧范围与羊的数量大幅减少，有的只在冬季和住所周围放牧；机制上，十户联牧改为单户放牧，又有近一半的牧户进城。牧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可能导致了草原使用格局的变化。数据显示，草地退化的面积并不大，而牧民所反映的草场退化现象，其实只发生在他们定居的地方——同时也是草场最肥沃的地方。

面对三江源人口增加、冬虫夏草经济链形成等近况，吕教授指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游牧民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中的作用，实现从游牧到生态文明的建设；牧民则应该成为生态系统服务者，而非单纯

的福利受惠者。

交流环节，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环境科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积极参与其中、积极探讨。在场师生对三江源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雪豹降级、鼠兔洞增加、围栏政策评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吕教授认为，应该尊重当地牧民的选择，谨慎对动物进行人为定义与干预；同时，实施政策时应慎之又慎，评估政策则应予

以更多的关注与监测。

最后，吴虹教授进行总结发言，她表示为生态危机提供方案，光靠生命科学界的力量是不够，解决人的问题才是核心。她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生态保护的工作中来，无论学术背景为何，我们都共同拥有且只有一个地球。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爱护、关心！

（撰稿：熊晓晓）

## 58

### 罗兰： 非洲与中国的文明

2017年10月19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非洲与中国的文明”。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考古所、古典学系、高研所教授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担任主讲，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杨清媚担任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担任主持。

在讲座中，罗兰教授提出了一种未来导向的关切。他希望说明非洲和中国这两个文明之间的联系，解释它们如何发展出了今天的世界的形态；如果我们把从非洲到南亚、东南亚再到印度尼西亚、大洋洲

的地带称为‘南方’，欧亚大陆地带称为‘北方’，那么南方和北方的历史发展有怎样的差别，在历史过程中体现的道德和伦理的发展又能够为未来的问题提供怎样的答案。

罗兰教授从杰克·古迪（Jack Goody）有关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区别的观点谈起。古迪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这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新石器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具体的科学”（science of the concrete）；到了青铜时代，抽象的理性思维发展起来，特点是形成了大规模的、相互重叠的城市中心。抽象的思维适

应了城市化、官僚制和书写的要求，最终发展成为欧洲的现代性。没有表现出城市化特征的地区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了，比如非洲就“卡在了”新石器时代。

如果我们想要证明这种“卡住”不是一个停滞的状态，或者说，“具体的科学”和抽象的理性不是进化论一样的前后阶段，那么，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

只能把他们看作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念——具体的科学一直在抵抗青铜时代导致的现代性的扩张。但是，这种理解仍然把非洲置于全球史之外，也暗示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区尤其是非洲及与欧洲接触之前的美洲是没有文明的。它们的社会文化发展都要参照青铜时代以来的文明的轨迹。这仍然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前历史到有历史的单一的叙述。

因此，罗兰教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把非洲和中国放在一起比较，意在说明以中国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明和非洲的新石器时代文明代表了不同的时间性，但是它们各自都适用于对古代和当代的不同理解。如果说青铜时代是欧洲的历史特点，那么新石器时代则是一个从非洲到印度洋，再到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的历史特征。这样就修正了世界体系。罗兰教授用莫斯（Marcel Mauss）提出的文明的概念来解释这个世界体系。莫斯认为，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联结



迈克尔·罗兰教授

和交往通过朝贡、外交、血缘、婚姻关系等中介得以维持。这些中介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泛泛地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它是在面对具体的事物和实践时形成的现实模式。属于同一个文明意味着在考古和历史的证据上属于一套共同的意义和实践的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则体现了本体论和宇宙论的问题。

接下来，罗兰教授沿用古迪的方法，在具体的经验层面说明莫斯式对于文明的理解。他从烹饪进入这一问题。这一部分包括非洲、近东（中东）、中国三个相互分离的文明为例子。非洲和中国在陶器中蒸煮软又黏的食物，最早的原料是野生的黍和大麦，后来是大米。这种捣碎和蒸煮野生植物的种子、颗粒或块茎的技术在一万年前已经出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非洲确立了食物系统，与之相关的还有将黍捣成糊状加工湿的食物和酿造啤酒的技术。随着班图人的迁徙，这些技术传播到东非和南



非，直到尼罗河谷的上游为止。而在近东到印度北部和中亚的地区，食物加工以炉子为中心，人们用炉子烘烤肉类向神灵献祭。中国也是蒸煮食物的区域，食物会用于纪念共同的祖先。蒸煮整块谷物要求足够的火候，利用火的高温把食物煮烂。这项技术后来用于冶炼和铸造青铜器。

加工食物的技术体现着更广大的物质宇宙观。例如，在东非和南非，蒸煮食物时用到的竹子和藤条也同样用来建造房屋；在中国，陶器的形制也用于青铜器，制造青铜器的技术又发展成为冶炼钢铁的基础。同时，非洲和中国表现出一些相似性，例如祖先崇拜和宗族组织、蒸煮食物和发酵饮料、制造青铜礼器，与西亚和地中海的烘焙和烧烤传统相对。这些区别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说明了文明的独特性的基础上，罗兰教授又引入莫斯关于文明的讨论，来解释文明之间长时间的流动性。莫斯认为，社会依靠彼此借鉴来生存，又依靠拒绝承认借鉴彼此来定义自身。对此，罗兰教授介绍了公元前三世纪末之前非洲和印度洋之间的交流作为例子。这一时期，在非洲和印度洋之间存在一个大型贸易网络，将波斯湾—阿拉伯湾和红海—亚丁湾两个贸易系统整合起来，其主要的贸易物品是黑曜石、香料，还有一些外来的植物。这个贸易网络远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城市群。商人和海员的食物来自西非，这就使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和蒸煮的烹饪手法传播开。但是贸易传播的更多是黑曜石、香料等仪式用品，并在非洲和印度之间的阿拉伯海上创造了一个走廊。这条走廊受

到对香料的需求的刺激而产生，是中世纪香料贸易之路的前身。随着贸易圈的扩大，贸易的内容也在增加，例如，东南亚的山药和芋头被带到印度、再进入非洲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又如东南亚和新几内亚岛的竹和藤进入美拉尼西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三世纪到二世纪存在的贸易圈是独立于青铜中心的。

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对以盈利为目的的贸易产生足够清晰的认识。那么，是什么刺激当时小规模农业和畜牧社会参与这种长时间的联系和长距离的交换呢？罗兰教授解释说，在这个贸易圈中，既有价值极高的商品交换，也有日常植物的流通，创造了一个持续的生活世界。但是，香料贸易在其中又特别重要，比如乳香和没药。这两种植物产自非洲海角的南部和阿拉伯地区。在中国唐代，香料进入宫廷和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功能是产生香氛和烟雾。在欧洲也有将松香作为献给神灵的祭品的传统。希腊人认为，将油、香氛、香料混合放进烤肉中，香气会吸引神灵降临。在埃及，香料用来给身份尊贵的人在死后进行清洁和防腐。可以看出，青铜时代的人们广泛依赖香料。而香料产自南方，这就使他们必须在一些更容易控制的地方获得香料或者香料的替代品。

最后，罗兰教授谈到香料贸易时期的寺院经济。公元一世纪到十一世纪，从事贸易的商人、手艺人、海员会在印度西海岸到波斯湾一带建造洞窟和佛像，这些宗教活动又随着海员四处传播。因此，航路沿岸形成了一个复合的宗教景观。这样一来，日常食物和香料的传播就与宗教的传

播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中国的泉州也同时存在贸易港口和妈祖庙。寺庙分布在晋江两岸和海边，外国商人停泊商船的港口就靠近这些寺庙。这两种景观都说明了贸易网络中的多样性。在贸易网络里有很多国家，它们早在国家的概念产生之前就参与到这个网络中，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政治。同样，它也和青铜时代以及青铜时代之后的国家和帝国有所区别。这些“卡住”的新石器时代文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的环境——一个“人类世”。非洲的视角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也为解决当下的矛盾提供了方法。

杨清媚教授在对罗兰教授的讲座内容进行总结后重点回顾了讲座的理论线索：根据莫斯对文明的定义，贸易网络中的国家必然面对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困境——一方面受限于自身独特的起源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又广泛地依赖外界的贸易。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其文明成就不仅始于青

铜时代，甚至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杨清媚教授还就如何理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种文明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提问：既然可以看出两种文明之间存在许多联系，那么当我们像列维—斯特劳斯一样把它们看做两种不同的观念时，二者之间的界限还那么明确吗？

对此，罗兰教授认为，重要的不是文明之间的界限，而是文明的原始性问题。原始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是可取的，而不是“新石器时代”或者“具体的科学”等等。如果我们过分关注区别，就会采用一种选择和拒斥的态度。因此，无论是在20世纪初，还是在今天，莫斯的观念都具有特殊的价值。一个超验的共同网络形成于国家和社会之前——甚至国家、社会可能都只是臆想的事物——这也是民族学相对于社会学的独特之处。

（撰稿：刘小雨）

## 59

### 孙歌： 思想史中的中国与日本

2017年10月2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思想史中的中国与日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担任主讲，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担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志强担任评议，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



东出席活动。

借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大江健三郎所著《定义集》一书的评价，孙歌教授对“批判”一词进行了分析。她首先对比了“批判”的两种理解：其一为现在通行的定义，即对事情正误的判断，但这种批判不属于学术与思想意义上的批判；其二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其重点不在于“错在何处”，

而是给讨论对象划出有效的边界。文学是构成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学家的工作正是在于史料批判。随后，孙歌教授回顾了自己的研究经历，讲述如何从思想史的视角观察日本和中国的边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日两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集，且成果颇丰。在这一历史阶段，两国志士之所以能坐在一起面对时代危机，除去中国复杂的历史脉络原因，更是因为中日有识之士真切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压力，并由此形成暂时的、潜在的联合。这一联合后来再未出现过，战争只是原因之一。孙歌教授所要讨论的恰是中日处在各自脉络中不断推进历史过程时产生的问题，且问题本身存在交集。

孙歌教授所著《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的基本内容包括了沟口雄三分析的中国问题，以及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昭和史论争”。这场论战本身直接的生产性相当有限，但其后续效果形成了重要的讨论结构。在解释本书的布局结构时，孙歌教授表示，其目的在于打破约定俗成的知



讲座现场

识习惯和对中日两国的直观想象。她认为，如果从认识论的层面观察日本和中国，研究对象将不再是单数的、确定的存在；没有人能在现实当中用自己有限的直观体验把握一个国家和社会，只能通过认识论间接地认识。因此，这是一本讨论认识论的书。思想史视野中，她所理解的日本和中国各自是一套完整的机制，是一个庞大的、相互制掣的关系群和结构群，且这个机制和结构处在变化和开放的动态之中。因此，“寻找关系的特质”便成为了思想史最基本的课题，她所关注的也正是讨论机制和动态关系时“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回顾昭和史论争的发端，三位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于1955年出版了具有唯物史观基本特征的《昭和史》。该书重点处理了昭和时期侵略战争发生的原因、变化和结果，并对其进行批判和检讨。分析聚焦在军国主义政府、受欺骗的劳苦大众以及国际国内资本推动战争的方式，同时包含了部分阶级论的观点。作者在序言中阐述了自己的写作原因：第一，昭和是牵

动所有日本人情感记忆的年代，而所有记忆都与战争有关，因此讨论战争具有必要性；第二，战后出版的有关昭和战争的回忆录和经验性写作缺少科学性，因此急需科学性的现代史研究；第三，为什么国民被卷入战争而非阻止战争，是现代史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看来，本书写作重点本应是民众史或社会史，但实际内容却是国家视角出发的政治史——二者之间构成不经意的错位。

1956年，文艺评价家龟井胜一郎针对《昭和史》一书发表评论文章，批判其历史书写的僵化和恶劣。他提出两点有关学习历史要求：一是在民族性和时代的长河中确认自己生的源泉，二是邂逅历史上的典型人物，从而发现形成新的伦理骨骼的根据。因此，“历史必须要写人”，并让后人了解自己为何生在特定的时代和民族。而《昭和史》缺少对这些内容的书写，忽视了普通人的作用，仅将批判矛头指向资本家等群体。以此为契机，日本历史学界和文学界展开论战，并逐渐转变为历史学领域的内部论争。“历史要不要写人”和“历史如何写人”成为论战最有生产性的问题，这场论争的重要意义也变为如何转化历史学、思想史、政治史领域对“人”的理解。

孙歌教授介绍，昭和史论争还引发了“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思考。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历史是可以针对历史事实进行考证的科学。龟井则对此论点进行了攻击，但并没有将讨论引向科学伦理的范畴。此外，也有历史学家提出“历史学没有模式”等不同意见。倡导“政治过程论”的筱原一则认为，不能用概念铺陈历

史，而应注重历史发展过程中浓缩的“关节点”，借此展开有深度和广度的历史分析。这场论战中，许多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史学家引用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孙歌教授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实际并未被关注、理解和继承。在这“厮杀的现场”中，所有参与历史过程的人的初衷和目的与得到的结果必定是不一致的，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可能相反；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但这一论点意味着所有的过程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和谬误，有些讨论将因此失去必要性。

“历史要不要写人”和“历史如何写人”的问题，在讨论中逐步被历史学家转化成“如何在观念化、高度抽象的工作方式中开辟出新的工作途径和思维空间”。而在新的思维空间里，高度整合性的观念需要被全盘打碎。孙歌教授认为，这个问题还可转化为“如何避免似是而非地使用概念”。随后，孙歌教授简要介绍并推荐了沟口雄三的著述：他的思想史是历史写“人”的标准典范，他最基本的工作方式恰是把“人”转化为认识的机制，或转化对中国史的结构性的解释。孙歌教授认为，经验研究生成的不可视结构不能仅依靠抽象概念，还需大量史料的支持。沟口雄三的研究从李卓吾入手，讨论内容从其著述向明清时期士大夫阶层思想结构性转型扩展，并由此引申出中国前近代至今整个历史发展和沿革的内在轨迹。沟口的观点是，以往的历史研究回避了李卓吾的核心问题，仅摘出其中部分拼凑为早熟的现代性思想。由此，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前近代思想结构的假说：



孙歌教授

“没有挫折，只有曲折”，且其思想于晚清之后在中国得到了延展。

沟口讨论李卓吾对“人欲”的解放时，关注的是更深厚的社会转型背景，即明末中国社会个人物质欲望被肯定的正当性。至于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课题，沟口以社会史视野讨论李卓吾的“童心说”，并认为当时农村富民和地主阶层形成了分权欲望，又在清朝政府的压制下转变为纯粹的经济要求。由此形成的乡里空间有别于市民社会，具有代替中央政府、代行地方职权的功能，并与官方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呼应“过程集合体”的观点，结构性地解释中国原理，正是沟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目标。

孙歌老师继而谈到，十九世纪末开始，中日大量引进各种西方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中国原理，并非与西方构筑起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讨论历史沿革中有哪些

在变化当中保持不同形态加以传承的不变机体。“天”或“道”作为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思想的核心概念，常具有强大的解释认知力度甚至是赋予政治合法性的功能，但我们常常忽略“自然”的重要概念。孙歌老师引述了沟口的判断：正是因为自然概念的存在并和天理结合，中国不需要理性、契约等媒介。对此，孙歌教授进一步解释，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理性和契约，只是它们不具备构成“万物一体之仁”的中国原理的条件。李卓吾在主张个性解放之后，将讨论引向了“不分别”，认为人们需要分别的只有“真”和“伪”——其中的“真”便是“自然”。清代思想家更是以自然为媒介区分了私欲和天理，并进一步将“己”和“欲”进行区分，认为“克己复礼”之后的“欲”才具有正当性。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例，其理论基点为中国与西方立国“自然”和“人为”的区别，

并由此发散出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其中，我们需要关注的要点即在于：中国发生现代革命时，传统是如何被转化的。

评议阶段，张志强教授指出，历史认识不仅是认识历史的问题，其核心关键在于通过对历史的认识形成批判性效果。

“体知”历史有助于理解历史当中的复杂部分，回到历史情境作出自己的判断。历史情景中的人和历史的关系事关主体的生成，要求在历史的互动当中找到创生的机能；之所以研究思想，实际目的也是寻找和创造历史的可能性。思想史要求假设的存在，并发掘历史发生的另类可能。结合日本学界的历史检讨问题，沟口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正是借李卓吾的原理性，揭示日本人战后精神处境的一种尝试。

孙歌教授对张志强老师的评议进行回应和补充。她引用桑原武夫等人的观点，论述了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工作伦理和目的。历史学家不能直接地改变现实，但可以通过“禁欲”的方式将思想内容传达到作品之中。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回避了

“日本人的民族感情”问题（包括日本的亚洲主义），并将其归入需要批判的右翼思潮。对此，孙歌教授认为，采用理性方式批判复杂的感情是无效的，这种回避不等同于回避责任，而是出于对复杂的历史事件需要延迟判断的考量。

交流环节，孙歌教授对听众的提问进行了解答。在竹内好和沟口雄三主体关注差异的问题上，孙歌教授提到了丸山真男政治学课程的影响。他将人的政治侧面作为政治学讨论的基点，并提出以下观点：政治的非人格化会影响分析质量，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人格分析的层面。同时，孙歌教授肯定了昭和史论争中的一些论点，即历史学家没有任何义务表达情感，且对他们而言，“人”的含义是非直观的。关键在于如何透过某些思想家的人生，或透过某个事件的某些节点参透极端状态下的终极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普遍性的抽象论述无法触及的。

（撰稿：陈洁樱）

## 60

### 王斯福： 欧洲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形塑与文化计划

2017年10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室举行，主题为“欧洲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形塑与文化计划”。文研院特邀访问

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教授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 担任主讲,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担任主持, 文研院访问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波担任评议。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迈克尔·罗兰 (Michael Rowlands)、芝加哥大学人类学讲座教授冯珠娣 (Judith Farquhar) 参与讨论。

首先, 王斯福教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研究背景。在国家产生的过程中, 文化观念所形塑的共同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许多国家通过制定文化计划、实施文化工程来强化国家的文化意识。在王斯福教授与迈克尔·罗兰 (Michael Rowlands) 教授看来, 中国的文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在他们的理论中, 文明应是具有包容性、变动不居的混合物, 容纳诸多文化, 并因此生成多个政治中心, 但中国文明只有一个政治中心。通过比较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形成历程, 我们可以研究文化工程是否可以成为塑造民族主义国家的一种范式。

讲座的第一部分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国家在国家层面与文明上的差异。在欧洲国家的形成过程中, 文明形态从多神教到一神教再到康斯坦丁时期的基督教统治, 形成了两个终极权威: 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 一个是拜占庭皇帝与东正教宗主教——其中都存在代表宇宙和造物主的外部权威。因此, 欧洲的特点首先在于存在多个中心, 两个权威虽都号称代表造物主的意志和圣经, 却呈现敌对的状态; 其次, 文明之中包容了多个国家, 实施着等级治理。



而在中国的国家型塑过程中, 则形成了单一而普世的文明形态。从区域性的狩猎部落, 到形成大的国家, 不同类别、不同区域的人群被统一到一个国家之中, 并通过一种基于宇宙图景的天下观念, 保证中华帝国从汉帝国以来能够历经多次崩溃却又实现统一。比较来看, 中、欧存在以下不同点。首先, 理念的不同: 罗马帝国强调意志、爱与审判, 通过神学和立法实现统治; 中国则强调榜样和意志, 圣人通过自我修养和道德榜样实现以天理为目标的统治, 并实现世俗与宗教权威的统一。其次, 中国因农民起义、外部夺权多次历经崩溃却始终保持统一; 欧洲却因对教义的理解不同一再分裂, 甚至因信仰差异发动战争。最后, 中国的军事行动则一直停留在大陆范围之内; 欧洲国家则采取了诸

多海外军事行动。同时, 战争还引发了欧洲的国家治理方式与合法性的变革——国家合法性从神权走向人权, “公众”的法律建构了主权的想象性统一基础, 法律也由此能够约束各种权力, 并定义了现代国家的主权和原则。

讲座第二部分, 王斯福教授追问中国历史上是否也出现了类似的、自我定义的国家观念。他指出, 宋代以来, 商业化与科技发展给传统的天下观带来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来自欧洲的工业化贸易的冲击, 不仅固定了天下观念中朝贡体系的边界, 也强化了儒家学统和帝国对正统的支持。鸦片战争之中, 外来的人侵冲击了传统政治的神圣性, 激发许多知识分子讨论变法以对抗外国人强加的国家标准。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话语上的变化, 比如大量使用“法”来讨论制度, 而不再使用传统中常见的“公义”等。

王斯福教授继而提到李蕾 (Leigh Jenco) 对中国变法进行研究的结果。百年前, 中国的知识分子关心引入西方制度是否会引起中国制度精髓的损失。谭嗣同援引王夫之对《易经》道器不二的解释反对了中体西用的可能性, 他认为, 只有在道器复合体的层次上才可能完整学习西方的道和意义。其追随者梁启超和严复则发展出“群”这一概念来理解这个中国并没有的复合体观念。由此可见, 当时中国的思想家们使用传统经典中的中国概念来生产新理论, 向西方学习尝试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一个例子便是将天下理解为一个道德世界, 从而置换了其在历史上的天文学和占星学的解释。

承接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历史, 王斯福教授在讲座第三部分讨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工程——通过不断重述道德危机, 重新建立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 神圣性的缺失使得人们转而使用人民、群众等概念去论证国家的合法性, 并通过大众教育来塑造一种的共同文化素质。这种定义统一国家和人民的文化工程, 是过去的王朝帝王自我修正传统的延续, 其不同之处在于: 朝向未来的话语取代了过去的历史叙事, 着眼未来与复兴取代了对过去圣人之道的遵循。

当前的文化工程是在人民、国家、政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所设定的, 并通过文化局、宗教局、教育局、旅游局加以实施, 实施结果在居委会、宣传栏、学校当中随处可见。这些文化工程因强调统一性而遇到了许多意料不到的后果: 如农村和城市依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迷信现象与小传统的回弹 (如地方性信仰的重现); 又如基于科学和历史叙事的文化工程, 却在现实中熏陶出了以科学话语进行表达的降神会和用宇宙大爆炸理论来解释易经的占卜者; 再如宗祠、族谱编纂和地方庙宇等方面的花费增加等。但是, 这种文化工程的统一性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的建构, 甚至是重构。

讲座最后, 王斯福教授将中国的文化工程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人类学家恩斯特·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认为, 大型工业国家的民族主义就是要将政治单位 (即地域与民族单位) 与人民统合在一起, 因此需要提高识字率, 普及大众教育, 并在更广的范围内通过文化建构团结与归属感。王斯福教授认为, 文化承载着意识形态的

共同感，通过多种渠道的传播和互动整合成统一的单位，以此与其他文化区隔开来。中国通过变法与去殖民化形成了具有新统治合法性的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一样，宣扬大众福利和权利、重视法权的合法性。但相比于欧洲围绕法律和个人主体而实施的文化工程，中国文化工程的独立性在于以下几点：首先，更加侧重道德和文化修正；其次，延续文化中的“人情”，即关系型道德和信任关系；再次，对法权合法性的强调弱于欧洲国家；最后，倾向使用王朝的失败案例来教导人们不仅要约束腐败行为为加强自我修养，还要约束迷信。

评议环节，陈波副教授指出，王斯福教授的文化概念与一般的文化人类学者并没有太大差异，本次演讲中所提到的具有整合功能的文化工程更像是国家的一种工程，而不是部落中间的文化纽带；其次，他认为本次讲座中的文明概念更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定的那种主权国家的文明，与莫斯的文明理论不甚相同，甚至呈对立态。随后，他提出两点问题：第一，以历史的眼光看，欧洲文明包容性不仅没有起到防止战争的作用，反而成为众多战争的根源，那么，能否在这个意义上认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第二，不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在甚至是未来来看，中国都不像是一个民族国家，因此，中国无法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是由于这个松散道器复合体、朝贡体系的存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王斯福教授对此进行回应。首先，他认为文明与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一个文明中存在大量不同的文化。文明是关乎过去的，但文化却未必是历史的，更多

的时候是地方性的。其次，他认为亨廷顿对文明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文明本身并不是战争与冲突的来源，每一个文明都是一个包容性的存在，并不断地从其他文明中借鉴、吸收。

讨论环节，冯殊娣表示，当前中国的文化工程延续了历史上一贯的说教风格。同时，相比于中国传统的世界认知，美国具有更强的世界主义色彩——这也是电视机进入家庭之后发生的巨大转变，新媒体让人们产生了对世界公共领域的关注与认同。迈克尔·罗兰教授则进一步回应了文明与战争的问题，他认为，文明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战争，欧洲历史上最严酷的战斗恰恰发生在宗教瓦解的时期。

（撰稿：包培含）

## 61

### 张邦炜：浅谈宋史研究中的片面性问题——从钱大昕考论宋史说起

2017年10月25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浅谈宋史研究中的片面性问题——从钱大昕考论宋史说起”。文研院访问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张邦炜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

本次讲座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侧重介绍钱大昕对宋史的考论，第二部分则在反思当今宋史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问题。

张邦炜教授开宗明义地提出，钱大昕为大有功于宋史研究的乾嘉巨子。柴德庚先生称其为考史“第一个人”，张邦炜教授表示，若将此语改为“考证《宋史》第一人”，钱大昕当之无愧。在乾嘉考史三大家的著作中，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基本不涉及《宋史》；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虽然包括宋史，但论多于考，长于眼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突破了非汉唐以前书不读的成规，且以考证见长。张邦炜教授征引王瑞明教授的研究表示，《廿二史考异》中的若干条目，可补1977年点校本《宋史》之部分缺讹。张邦炜教授又以钱大昕考订《宋史·宰辅表》为例，具体论述了其对于误录部分晚宋臣僚（宰执官、误记秦桧、汤思退、梁克家与史嵩之）任相时间等问题的修正，以及上述成果对于

当今宋史研究的价值。

张邦炜教授进而指出，钱大昕的考据学问颇具见识，他对《宋史》的校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钱大昕在考订时，重视《宋史》的体例问题。钱大昕将《宋史》历朝《本纪》与《宰辅表》对读，互校互纠互补，发现《宋史·本纪》及《宰辅表》或虽有体例而自乱其例，或无明确规矩。如当书失书，宰执任免是《本纪》与《宰辅表》应当书写的大事，但两者失书均达数十事之多。又如体例不一，宰执官去世称薨与称卒并无一定之规。其二，钱大昕关注宋代制度，钱大昕在考证《本纪》及《宰辅表》时，论述宋代制度特别是职官制度之处甚多。例如，在宗室制度方面，案《真宗本纪》：“（大中祥符七年三月）王元佐、相王元偓、舒王元偁、荣王元俨枢密使、同平章事”。钱大昕认定“诸王例无授枢密使者”是宋代的一项既定制度，“此文必有讹舛。《长编》亦无此事”。又案《仁宗本纪》：“庆历四年七月，封宗室十人为郡王、国公。”钱大昕依据《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诸书补充了十人的名讳、封号与房支。又如，《宰辅表》称：“（至道）三年六月，钱若水自同知枢密院事以秘书院学士免。”钱大昕指出：“秘书省无学士之称，亦无院名。据本传，

乃集贤院学士也。”

此后，张邦炜教授介绍了钱大昕以舆地、官制、氏族为“三端”的治史方法。钱大昕考订《宋史·地理志》，从校勘的角度看，具有示范意义，虽然一般性的纠错数量并不多，不如后继者聂崇岐先生的《宋史地志考异》，但有价值的补正不少，且多有独到之处，主要体现于重视动态考述政区演变，注意到地方守臣兼职、

路级政区有数类、管县政区分四等、地方行政区划称军者有两种等重要制度，揭示年号地名等几种常见现象诸方面；对于《宋史·职官志》，钱大昕则有讨论宋代差遣制度的形成及改革，宰相制度变迁，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与知制造之关系，官府、官员的名称、合称、简称与俗称等成就。邓广铭先生曾提出，治史需“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四把钥匙，亦自言此观点源自乾嘉学者。年代学与目录学虽不在“三端”之列，但钱大昕在这两方面，成就都不小，他著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又在《廿二史考异》中对《宋史·艺文志》的材料来源与具体内容等多有发明。

张邦炜教授总结道，钱大昕对《宋史》的考订，为日后研究者开拓了若干领域。陈垣先生即认为，钱大昕的考据学问为近代学术之泉源，他的《史讳举要》一书，正是为纪念钱大昕诞辰二百周年而作。在具体问题方面，例如，邓广铭先生认为《宋史·职官志》的问题之一在于拼凑芜杂材料，钱大昕对《宋史·艺文志》有类似的评价，



张邦炜教授

惜不知二者有无渊源。又如，姚从吾先生关注南宋末年四川抗蒙山城，张荫麟先生重视晚宋史，傅乐焕、聂崇岐诸先生梳理宋辽交聘使臣问题，陈乐素先生考证《宋史·艺文志》俱受到钱大昕著作的启发。此外，钱大昕所作《疑年录》，虽为自编以备自用，生前未定稿，死后由其弟子刊出，以致内容粗糙，错误不少，但是此书开创了一种新体裁，此后吴修《续疑年录》、钱椒《补疑年录》、陆心源《三续疑年录》、朱昌燕《四续疑年录》等书以及陈垣《释氏疑年录》、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相继问世。贾贵荣、殷梦霞辑《疑年录集成》收录同类著作达 17 种之多。

张邦炜教授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就钱大昕的成果可见，对于《宋史》一书而言，重修不如考订。钱大昕不仅对元朝官修《宋史》不满，而且认为包括薛应旂《宋元通鉴》、柯维骐《宋史新编》、陈黄中《宋史稿》诸书在内的各类重修《宋史》均有重大缺失，有意亲自动手重修宋史，只因忙于重修《元史》而无暇顾及。在他启示下，邵晋涵著《南都事略》，钱大昕与章学诚

均参与其事。邵晋涵对钱大昕的主张多有采纳，如改修宋史当“自南渡始”，不立《道学传》，乃至仿效王偁《东都事略》之例，定书名为《南都事略》。此书或未竟其业或已失传，仅存《儒学》、《文艺》、《隐逸》三传目录。不过，张邦炜教授认为，对于今人而言，明清学者重修宋史的致命通病在于不具备史料所应有的原始性，因此参考价值不大，对《南都事略》亦无需太多期待。此外，张邦炜教授补充称，在同类书籍中，陆心源《宋史翼》价值较大，原因就在于抓住《宋史》缺传这一要害，具有史料汇编的性质，原始性较强。

张邦炜教授继而指出，建国后，学界一度将钱大昕低调评价为史料学家；八十年代起，有学者将钱大昕所言意在“求真”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一词在当代偏重探究事物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之新意相等同的拔高；长期以来，部分学者对乾嘉考史三大家厚此薄彼。上述种种论调，都是相对片面的。张邦炜教授认为，综上所述，钱大昕是一位以史科学见长的历史学家。

讲座第二部分，张邦炜教授进一步就学界在评人论史中存在的片面性问题进行反思。他引述翦伯赞先生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的观点，主张“两只眼睛看历史”。

张邦炜教授继续谈到，宋史研究中的片面性问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研究中各走极端。例如宋史学者中对于宋代士大夫、富民等群体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评价，包括富民、士大夫在内的诸多社会人群不能被简单地视作赞美或鞭挞的目标。

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于宋代婚姻重视阀阅与否、晚宋士大夫归降与否等问题，研究中存在着忽视概念区分、过于强调一面性、综合讨论的现象。三，过甚其词。虽然南宋时海外贸易发达，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但却不足以称为“海洋帝国”。四，数据离谱。宋人提供的数字往往精确度不高，且相互抵牾，不可尽信。学界在估算宋代耕地面积、开封城市人口等数据时均遭遇此类问题，部分数据超出今人想象范围。张邦炜教授认为，在历史学研究中，需多些全局观，少些片面性，不应“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当有实事求是之心。

讲座最后，张邦炜教授提出，作为一个研究群体，当今宋史研究者不仅要侧重个人兴趣的考史，更要努力做到考史与著史并重。张邦炜教授希望宋史研究者可以立足近年来宋史研究中取得的新进展，认真梳理、总结与吸取现有研究成果，从问题出发，思考体系，着眼体系，实现考史与著史的互动。

（撰稿：何天白）



## （二）未名学者讲座

21

### 车浩： 理解当代中国刑法知识转型



讲座现场全景

2017年10月17日晚，由文研院主办的、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车浩作题为“理解当代中国刑法知识转型”的演讲。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担任评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担任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活动。

车浩副教授的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当代刑法知识的现状；

第二部分以犯罪论体系为中心，探讨中国的学术开放与自由；第三部分围绕刑法教义学，思考中国刑法方法论的转向即学术的自主性；第四部分考察刑法教义学的当代中国命运。

第一部分中，车浩副教授在简要提及中国传统的律学与现代法学的不同后，认为中国刑法学现代意义上的发端，应当以清末沈家本主持的变法为起点。正是由于这次变法，才引进了大量西方及日本的现代刑法学著作，从而取代律学建构了本土

的现代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民国的“六法全书”遭到全面清算，刑法立法与理论研究也从德日转向了苏俄。然而，由于当时国家正处在特殊时期，因此刑法学研究曾一度停滞，直到1979年刑法颁布时才又回归正轨。在理论学说的选择上，苏俄的四要件理论业已成为当年绝对的多数说，就算在今日，称之为通说亦不为过。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末，由于理论深度的不足，实务应对能力的欠缺，社会变迁的迅速，学习外国理论的功利，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等因素，以苏俄刑法理论为基底的中国刑法学逐渐开始出现前行乏力的症状，亟待新理论的引入与发展，以重塑中国刑法的研究范式。

第二部分中，车浩副教授以作为刑法学核心的犯罪论体系为切入点，详尽阐明了新世纪后域外刑法理论的引进与在本土的发展。2000年后，在陈兴良、张明楷、周光权等教授的大力推动下，隔绝已久的德日刑法理论又一次登上中国刑法研究的舞台，接续上百年前的学术传统。此后，苏俄刑法理论与德日刑法理论在中国展开了多轮博弈，二者此消彼长，其中尤以犯罪论体系的竞争最为激烈。但是，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苏俄犯罪论（即四要件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该说只是将各要素进行简单的堆积，并没有妥当地安置构成犯罪的诸要素，并使之形成合乎逻辑的体系。与之相对，以德日为代表的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则不存在类似问题，在位阶关系的制约下，该理论能够条理清晰且符合司法认定逻辑地安排诸犯罪构成要素。是

故，在中国刑法学界，目前苏俄理论可谓风雨飘摇，几有随时崩溃之险，而德日理论则步步为营，大有凯歌高奏之势。需要澄清的是，虽然人们过去曾产生过理论竞争会造成研究混乱的担忧，但现在来看，这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学术争论只会增进学术繁荣，为实务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反作用。因此，学术开放在学术史中的意义可见一斑。

第三部分中，车浩副教授着重论述了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即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问题。详言之，虽然有的学者同意苏俄刑法理论存在缺陷，但也不赞成再引进域外理论。他们主张，中国学者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中国人自己的犯罪论话语。该如何评价这种观点？车浩副教授认为，其实从清末变法开始，作为西学的刑法研究在中国就已经势不可挡，因为成文法的引入必然会带动相应研究范式的发展。为此，德日刑法学理论的引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倘非如此，则今日的中国刑法学定无法这样蒸蒸日上。事实上，刑法研究也具有世界的共通性，在全球化的当代，不可避免地会用到共同的概念。这并不是学术自主性的丧失，而是达到自主性目标的手段。换言之，在用共同的概念解决本国特殊的问题时，前者必然会不断受到修正，新的概念也会一并涌现出来。

在报告的第四部分，车浩副教授详细考察了刑法教义学的中国命运。所谓法教义学，一方面是指，研究者以现有的法秩序为前提，致力于解释现行的实定法；另一方面是指，法教义学存在某种类似于实定法的权威性，亦即各种学说包含于实定



车浩副教授

的规则之中。它的具体表现是，当教义学理论遭到反对时，反驳的观点就总会间接地抵触实定法。因此，教义学与实定法之间就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刑法教义学与传统的刑法注释学的区别在于，后者只能解释刑法规定中既有的要素，而前者则可以触及立法者未规定之处，学者在此可以脱离法条的束缚，创造新的逻辑关系。不仅如此，刑法教义学还具有丰富的实践品格，亦即它能够解决实务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切实运用到现实案例中。教义学程度越低，刑法的实践解决力越弱，反之则越强。

最后，车浩副教授总结道，中国刑法学既要清理传统的四要件理论，又要引入新的犯罪论体系，并为本土所接受，可谓任重而道远。

在评议阶段，作为中国刑法知识转型的亲历者，陈兴良教授充分肯定了车浩副教授的报告。陈兴良教授的评议共分为三部分，首先，刑法知识转型并非指刑法规

范的变动，而是指刑法理论的方向性的改变。车浩副教授不是以参与者的视角，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对中国刑法知识转型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十分客观、恰当的描述，同时还历史性地叙述了这场知识转型的由来，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立场选择。

其次，就犯罪论与法教义学而言，前者是刑法所特有的问题，而后者则不然，它是在整个法学界都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关于犯罪论，四要件体系目前已深入人心，若想改变，实属不易。在阶层犯罪论引入之后，不免产生的疑问是，该体系与四要件的区别究竟为何？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定罪既不是依四要件，也不是依三阶层，而是根据法律规定。由于法律规定相同，因此无论采纳何种理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结论都应是一致的。但是，犯罪论体系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分析工具，二者却存在逻辑上的优劣之分，这会导致在处理疑难案件时，得出不同的结论。

关于法教义学问题，在法理学界存在着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的争论。应当认为，二者的研究角度不尽相同，因此并不是对立关系。社科法学主要采用如经济学、社会学等方法进行研究，而法教义学却强调以法规本身为核心，采用逻辑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不过，虽然这两种研究范式在法理学领域不分轻重，但就刑法学研究而言，还是应当以法教义学为核心。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超出了法解释学，因为后者主要是语义的解释，而前者则更多的是通过逻辑学进行法的研究，从而可以超出文字的限制，发挥法律规范的效力。换言之，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法教义学创造适当的规则，解决相关问题。这是一种在创造规则与不违反罪刑法定之间的平衡。由此，刑法学就不再是简单的条文注释，而是转变为一种逻辑推理。一言以蔽之，法教义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逻辑的运用。

最后，就学术的开放、自由以及自主而言，三者既不是简单的堆砌，也不是单纯的并列，而是一种递进。详言之，学术首先要开放，尤其是对外的开放，在封闭的环境下，学术不会有发展。只有在学术开放的基础上，才存在学术的自由即学术争鸣。学术自由意味着平等，学术应当与权力脱离，曾有人希望将四要件理论上升为国家的学说，这是不值得提倡的。最后，同样也是最重要的，是学术自主。学术自主对学者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亦即，学者是不是应简单地地为立法、司法服务？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不仅会使研究者丧失独立品格，成为立法与司法的附庸，而

且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理论，也不会有充分的解释力。因此，虽然学者不应与世隔绝，但也不能只把自己看作立法的辩护者、司法的拥护者。理论必定具有前瞻性，与司法实践保持距离，不能指望理论马上就能运用到实践中去。至于中国学者能否另起炉灶，另创一套新的理论，应当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当下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而且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法律虽然有国境的限制，但法理论却是超越国境的。法教义学的引进是一种话语体系的转变，它仅仅是一种用来分析中国问题的理论工具。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必然会在消化国外知识的基础上建构出本土的法体系。

综上，陈兴良教授认为，好的法学者应当同时是一个社会学家、思想家，因为法律本身是人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叉点。从这点出发进行的研究，其实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只有将法学上升至这样的高度，才能为人类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交流环节，听众踊跃提问，会场气氛热烈。陈兴良教授与车浩副教授就为何要在刑法研究时主要采用德日理论，法教义学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刑法教义学的现实适用程度，以及中国刑法与域外学说在共同犯罪领域采纳标准的不同等问题做了精彩而深刻的回答。

（撰稿：邓卓行）





## 22

陈侃理：  
时间的历史——《史记》与太初改历

2017年10月24日晚，由文研院主办的、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二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侃理作题为“时间的历史——《史记》与太初改历”的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叶炜担任评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担任主持并作引言。

陈侃理研究员从讲座当下的时间引入，指出人们置身于同一个时间秩序中，并非出于天然，而是人为干预的结果。这种人为干预借由政治权力而发生，不断地改变着时间的秩序，从而形成了“时间的历史”。在这段属于时间的历史中，一个影响深远的节点就是汉武帝太初元年的改历活动。此次改历，一是将岁首由十月（建亥）改为正月（建寅），二是将四分历改为八十一分历。

在《史记》的语境中，按照旧历，太初元年（即改历前的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是一个历法新循环的伊始。这个“天历始改”的时机既是司马迁《史记》起笔的契机，也是《史记》记事的下限。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也参与了此次历法改革，但在其《史记·历书》中却隐约其辞，所载《历术甲子表》仍是



陈侃理研究员

四分历表，并不反映太初改历的结果。《历书》篇末亦无“太史公曰”，似乎有意隐藏了个人观点。为了解司马迁对太初改历的看法，陈侃理接下来详尽地介绍了太初改制的背景、动因、内容和结果。

太初改制以前，主要流行的是“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它们均为四分历，实际上是战国以后人的发明，只不过历元不同，月建不同。所谓“四分历”，依靠两个基本经验数据，一是靠圭表测影的方式定回归年的长度（岁实）为365又四分之一日，二是以置闰周期（闰周）为19年7闰（235个朔望月）。由岁实、闰周两个数据，可以推算出每个朔望月的长度（朔策）为29又940分之499日。由此，就可求得天象的循环周期，根据日月运行来调配干支，计算归复原始数据的最小公倍数，根据复原要素的多少，由小到大，形成章、蔀、纪、元等历法周期。

经过“一元”（4560年），所有要素均归复推算起点时的状态。太初改历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天象回归历元的契机。

根据《史记》《汉书》，秦及汉初行用颛顼历，但这一旧说很有问题。比如，此说认为秦始皇统一后自以为居水德，故而用颛顼历，特点是十月为岁首；实则秦昭王时以十月为岁首。此外，用颛顼历推秦汉朔闰，多与《史记》《汉书》不合，用殷历则多能相合，但亦不尽合。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加，天文学家多根据其中的实用历朔（如历书、官私文书中的纪日等）来复原太初改历以前的历法。遗憾的是，古六历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与秦汉实用历朔相符合，故而研究者的历法复原方案多有凑合现象。陈侃理认为这些复原都建立在错误的预设之上。

秦及汉初历法行用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各地并不统一。例如，岳麓秦简《秦始皇二十七年历书》中载八月朔日为癸酉，但里耶8-133号木牍则有“廿七年八月甲戌朔”的纪日。与其怀疑某一记载有错讹之嫌，不如承认秦代使用历朔数据并不统一。造成歧义的原因有三：其一，王朝颁朔行为有局限；其二，民间存在治历活动；其三，地区文化和统治方式有差异。

在历朔不统一的情况下，一个历史性转折就是太初改历。此次改历的动因：一是历法失准，导致“朔晦月见”的情况发生；二是遇到了天象回归历元的特殊时机；三是儒家思想的推动。董仲舒认为“王者必改正朔”，并将之与“明易姓”和“大一统”联系起来，认为颁朔具有象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支持改历的主要原因在于

欲模仿黄帝，改历求仙，其动机与儒生有别。

改历之初，曾遇到“不能为算”的困难。这或是由于四分历的原则和改历的条件、目标之间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隙，或是主张“四分历”的学者之间，难以取得一致。例如，以木星的实际位置来定，太初元年当为焉逢摄提格（甲寅年），但根据“岁星纪年法”，岁星每86年超一辰，这一年又当为丙子年。这样一来，实际天象与旧有周期之间的矛盾就无法调和。转折来自于征召民间治历者。待诏邓平、落下闳提出了颠覆性的八十一分历方案，将一个朔望月（朔策）调整为29又81分之43日。

太初历与司马迁倡议改历时的设想截然不同，故而《史记·历书》不记载八十一分历，包含了太史公的失望之情。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仅言“天历始改”，而不言“汉历”，言“诸神受纪”，而不言“诸侯”、“天下”、“郡国”，或许反映出：司马迁认为，太初历并不能在人间秩序中真正反映天历的更始。

对于太初改历，天文学家有着一分为二的评价，认为优点是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历法中含有日月食、五星运行周期；制作运用了天文观测仪器等。缺点则是年、月长度误差增大；有神秘主义色彩，因为基本数值81来自十二律中“黄钟”的律管长度（9寸×9）。实际上，太初历的优缺点本就相应而生，如对日月食、五星运行周期的测算就是为了服务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天文星占。太初改历并非单纯为了追求技术革新，以上评价并未很好地理解古人意图。

陈侃理认为，太初改历的意义在于：

第一，这是天文“初始”在人间秩序中的实现，虽然司马迁并不承认；第二，实现了时间的大一统，颁朔制度革新，颁朔范围扩大到诸侯国；第三，儒家倡导的正朔观念通行，王朝历朔的颁布、行用成为“统治—臣服”关系的象征；第四，对社会、文化有巨大影响，明确、更新了年、月、日的安排、命名，促使时间观念发生变化。例如，历朔统一后，序数纪日取代干支纪日成为主流。秦及汉初行政文书的标准日期格式为“年+月+朔+日干支”，但至东汉明帝时，“年+月+朔+日序数+日干支”的形式已经官方化。又如，传统节日从以干支到以序数确立。上巳节本定在三月上旬的巳日，后改为三月三日；端午节本定在午月午日，后改为五月五日；七夕（七七）、重阳（九九）等新出现的节日则以重数形式命名。

太初改历是儒生、历法家、方士、皇帝等多方合力产生的结果。这次改历在后世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是中国历史中时间秩序变革的重要节点。回归到对时间这一“人为秩序”的探讨之中，我们可以放眼世界。公元前46年，凯撒制定“儒略历”，设置平年、闰年，行用纯太阳历。16世纪，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改定儒略历，通过宗教力量使得基督教国家均采用了“格里高利历”。东正教国家则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部分接受了格里高利历，如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才废止儒略历，改行格里高利历。朝鲜则在2015年将“平壤时间”调晚半小时，采用东8.5区时，以补回日本殖民者强迫朝鲜使用东京时间而“损失”的半个小时，并且凸显国家主体

性。在时间的历史中，皇帝、教皇、独裁者、革命者都积极地参与进来，他们出于什么考虑，起了怎样的作用，值得我们思考。作为时间秩序中的人，我们是否也在适应、利用，或者反抗，甚至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时间秩序呢？

评议环节，叶炜教授指出，讲座中对于出土文献性质的把握十分得当。对于出土文献中的矛盾之处，不以对错来论，而是保留差异的做法很有解释力。这种观念的形成也与近年来秦汉史研究的推进相关，如李开元提出的“后战国时代”，陈苏镇提出的“东西异制”等均表明秦至汉初，各地文化基础仍然深厚，制度并不统一。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和同学纷纷就序数纪日通行后干支纪日的继续沿用、地方官府和民间自行推朔等话题进一步发问。陈侃理研究员解释了干支纪日的特殊用途，比如文书中沿袭传统，表示庄重，史书为了准确，文学为了古雅，或是出于数术占卜的需要。他认为，地方或民间自行按照历法推算朔闰也有可能与王朝颁朔不同，因为王朝有时会为了特殊的需要，突破历法设计，对朔闰安排进行临时性调整。如武则天神功元年即强行将按照历法应在下一年的闰月移前，人为造成第二年元旦恰逢甲子日的祥瑞。关于时间秩序，可以讨论的话题很多，历史学者应该打消“专家之学”的成见，更多地参与进来，不再局限于历法复原和历史年代学，而从不同角度进行长时段的思考。

（撰稿：李莹萌）

## 23

### 田耕：“金铁主义”与现代国家 ——马克斯·韦伯支配学说的再考察



刘云杉教授为田耕老师（右）颁发聘书

2017年10月31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三期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作了题为“‘金铁主义’与现代国家——马克斯·韦伯支配学说的再考察”的演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担任评议。

田耕老师首先解释了理解现代国家的“金铁主义”思路。这个概念来自清末民初，杨度先生于1917年发表了以《金铁主义说》为名的系列文章。杨先生认为，当前的世界体系由对内文明而对外野蛮的国家所组成，但是中国受制于家族制度和宗法传统等原因，未能建立起以经济（金）和军事（铁）为中心的国家体制。中国因帝制传统而未

能形成现代国家，这一史观从梁启超、杨度、战国策派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都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

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对现代国家起源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金铁主义之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学者指出，从中世纪早期到近代早期约六百年间，欧洲的领土单位从五百个左右减少到五十个左右，国家对内结束了领主主权分立、暴力蔓延的状态。虽然没有实现对外和平，但国家间的战争也不再剧烈改变领土边界了。战后的学者认为，这一相对稳定的体系会一直持续下去，问题在于“新”的民族会以何种方式建立源于早期欧洲历史的现代国家。要建构现代国家，首先要求勘定领土边界，

第二是完成对人民的国民化（军队动员的基础）。在控制土地和人民的基础上，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建设能够实现对人力和物资的充分动员与汲取，获得在人类统治体系中前所未有的强大支配力量。

接下来，田耕老师转而对比韦伯支配学说进行论述。韦伯对现代国家的定义是极简的，抓住了在疆域范围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这一点；而他对于现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又作了极为繁琐的论证。历史社会学家相信，通过对战争和财政动员的能力进行描述，可以指出欧洲国家通向这一国家定义的历史道路是如何将极简和极繁的论证联系起来的。田耕老师指出，韦伯以支配的类型学来理解国家，包含着更为复杂的考虑。对家产制支配的论述更是成为其支配学说中历史最丰富、跨度最广泛的部分。针对这部分论述，田耕老师提出了两点观察结果：第一，家产制作为东、西方都存在的普遍支配形式，在文本上有一个“倒置”的结构。但韦伯认为，只有西欧独特的封建制才决定了现代国家的构成，因此，在时间上靠前的封建制反倒是被置于家产制的论述之后。这样一来，西欧的封建制例外地解决了家产制政体的问题。这个东、西方都要面对的家产制问题是什么呢？第二，家产制支配是一种传统型权威。但韦伯未提及传统上怎么样构成了家产制支配的基础，转而强调在家产制支配中对传统的忠诚与对支配者（主人权）的忠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韦伯对传统的定义相当不充足，很多时候更像一种“剩余范畴”，那么家产制支配何以是传统型权威？家产制支配为什么要通过封建制来

找到通向现代国家的独特道路？这两个问题表明，韦伯的分析要比金铁主义的现代国家道路复杂得多。

家产制出现的最重要契机，并不是在家内建立权威，而是要从家内到家外，对与支配者没有家关联的人树立起政治的关联。田耕老师将这样的政治臣民类比为“编户齐民”，他们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给有领土和财产野心的君主提供“金”和“铁”。那么，家产制支配者如何能够把编户齐民变成像家内一样可以当成财产来处置的对象呢？

家产制支配者建立自己治理工具的第一步便是扩大家产制军队，即打造一支能够大范围动员同时又能够维系忠诚的国民军。君主不仅要结束对异族雇佣兵的依赖，更要摆脱受限于规模与用途的共和性质军队。这就不再依赖自由人的小规模共和式团结，而能够把没有生活关联的陌生人都置于生死攸关的战争考验之中。这也是从古典共和军队迈向现代大规模军队的转换器。第二步就是扩大家臣。家产制君主能从家内关系之外的编户齐民中拔举官吏，将他们纳为自己的治理工具，并大大扩展了支配的力量。大量自由民加入到君主的支配关系中，便是家产制支配发生变化的重要契机。

军伍阶层和文臣与支配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韦伯指出，原先附属于君主的家臣，一旦获得了占有官职的机会，就会谋求成为具有身份性的法团群体。这样以来，他们不仅将官职当成自己可以处置和转移的财产，还对于进入该群体的准入资格拥有发言权——由此构成了对有极强

扩张野心的君主的天然限制。反过来，君主也希望能够源源不断地吸收新人加入管理干部团体，对抗原本占据行政工具的人的图谋。君和臣都利用家产制关系来巩固自己的所得，韦伯将这种对抗形态称为家产制的双轨。但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中看到的，君主不可能一直能够从社会下层中提拔出精英来填补老官僚的空缺，身份化造成的精英有其限度，于是，君主会慢慢走向自己可用的行政支配力量的极限。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的家产制官僚达成了独特的成就，类似的人文教育和身份认同并没有形成能够阻止君主控制行政权的身份群体。中国的传统君主没有遇到西方君主遇到的挑战，在官员群体内并未实现抽取“新人”来填补家臣的循环。韦伯认为，这是极端的不传统，实现了近代官僚制支配出现以前所能达到的最高行政形态。

西方形态中的特例就是英国的治安长官。家产制支配者为了对抗地方的庄园领主贵族，使编户齐民中的一部分自由人长期垄断了地方行政的权力。但他们是用实质理性来处理事务，而没有成为依靠高度功能分化而实现的管理型科层干部，并保留了独立的地方贵族的心态——这也是西方家产制支配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的行政状态。而封建制也极强地塑造了西方历史的信念，在家产制支配之下独立发展出了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防止陷入循环往复的分裂状态。这种契约关系不可能发生在狭义的西欧以外。

田耕老师总结道，在韦伯搭建的考察框架中，家产制支配所陷入的困境实际上

可以有中国式大型官僚制和西欧封建制两种发展道路。这也同时是传统形成的两个来源。传统并非来自于家关系的神圣权威，而是家关系扩展到家外而形成的斗争中的平衡。韦伯对传统的理解，恰恰是在它遏制家（父）长权的意义上而言。东方的所谓专制主义和西方的所谓封建制，代表了在家产制双轨之下继续推进的政治努力，并提供了传统生发的契机。而韦伯对家产制和封建制的倒置，是对于再造传统的两个面相的揭示。韦伯在家产制的论述架构中奠定的这两条路线，启示我们不能仅仅把家产制及其传统看成是纯粹强制力的补充因素。在结合中国历史的情况下，这也是我们重新看待现代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随后，李猛教授进行评议。他对田耕老师有关韦伯的家产制论述的观察表示同意，并强调说，家产制国家的问题是东、西方普遍面临的，也是支配社会学进行文明比较的基础。韦伯从普遍的概念体系给出一个西方特殊性的回答，未能充分地解释能够从家产官僚制得出现代国家的原因。随后，李猛教授结合中国历史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在杨度看来，中国内部未能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管理体制，但这恰恰与韦伯对中国家产官僚制的观察相反。魏晋时期，建立起了类似于封建制的私人效忠关系。实际上，在成熟的中国的家产制官僚制下，君、臣之间能够建立起超越个人效忠的普遍统治方式。李猛教授认为，韦伯的分析没办法展开这个阶段复杂的理性化过程。只有放弃将现代法理支配作为必然的国家发展方向的历史观念，才能理解君

臣概念自身的问题和特性。中国并没有必然要往现代国家发展，因为这种君臣关系指向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与对于人和人关系的理解。韦伯在使用家产官僚制的概念来描述东、西方的时候将中国看作相当理性化的阶段，西方特殊性的强烈问题仍然支配了他对这个概念的具体讨论。

李猛教授进而指出，田耕老师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新的探索，帮助我们理解三种支配形式中最薄弱的传统型支配。至于韦伯为什么要构筑这样一个分类体系去理解支配？他认为，无论中国在前现代时期多么理性化，在现代国家的问题上和现代资本主义一样，只有西方完成了独一无二的理性化进程。真正的推动力量不可能产生于家产制内部，而恰恰可能是在家产制国家中比较边缘或者反理性的力量将家产制国家带到了现代。这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卡理斯玛型支配在韦伯的分析中起到的作用。李猛教授继而强调，我们要暂时忘记现代法理国家及其社会性的基础，转而去反观家产制内部的逻辑。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考，集中在古典共和城邦理论和现代的社会性政治理论，却忽视了围绕家产制国家展开的由家逐渐建立政治组织单位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人类支配形式中最重要的形态，但在理论上却呈现最低度发展的态势。我们需要在田耕老师的报告贡献的基础上，搭建更大的“建筑”使之完善起来。

提问环节，同学们针对韦伯家产制论述中公共空间的位置、政治的意涵、中国古代和西欧不同发展道路等问题向两位老师求教。田耕老师表示，韦伯分析的家产

制自家内至家外的扩展并不是从“家”到“非家”，而是不同的“家”的传统展开斗争。无论在君臣之间发展出多么非人身性的关系，都仍或多或少具有家关系的性质。李猛教授表示，当家内统治扩展到家外时，家外的政治子民的确拥有一些不同的权利，在西欧就建立起了国民中某些人享有的法权性的独特权利。这一发展的最后结果便是在十七世纪形成了杨度所强调的不同国家共存的世界；但在中国，相对于家内子民享有的特权，这种家外政治子民反而对于所有臣民都实现了，并使得这一区分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欧洲来说，这一区分是向现代国家迈进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英国，正处于杨度所谓的“没有统治”和“不负责任”的状态——但这却是光荣革命之后威廉得以重建一个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国家的一大原因。在韦伯看来，历史往往会从一些非常诡异的情形发展出来（比如英国的例外形态反过来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并迫使其他国家按照这个逻辑来重建自身。但在韦伯的分析中存在一个缺陷，那便是他的支配社会学抛弃了政治理念起的作用。中国没有停留在战国七雄的时代，而西欧也未能走向秦始皇建立的统一。在这两大历史进程背后，政治行动者对于未来的政治图景和人与人的政治关系有着高度的认知，而这一点，不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分析中解除。

（撰稿：肖京）

### （三）北大文研论坛

48

#### 李零等：《子弹库帛书》出版学术座谈会

2017年8月2日，北大文研论坛第四十八期“《子弹库帛书》出版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此次座谈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文物出版社、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以下简称“中文系”）联合承办。座谈会根据时间安排分为上午场和下午场。

上午场包括四个部分，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发表主持讲话；文物出版社总编辑张广然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文系、文研院四家单位赠送《子弹库帛书》；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文物出版社社长张自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陈叙良致辞；以及众嘉宾学者们的发言：他们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李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美国



李零教授讲述楚帛书的故事

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教授夏德安（Donald Harper），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凤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乐贤，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

座谈会开始后，主持人徐天进教授一一介绍了与会的各位领导和学者，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随后是赠书仪式，副校长王博、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分别代表各自单位接受文物出版社所赠送的《子弹库帛书》。

接下来是宋新潮、张自成、甘琦、陈

星灿、陈叙良五位嘉宾的致辞。首先讲话的是宋新潮先生，他对李零教授《子弹库帛书》的出版表示祝贺，也对为这本书付出努力的学者和单位表示感谢，并对李零教授在《子弹库帛书》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成就进行了述说，接着谈到了《子弹库帛书》流失、国外引申、海外遗失文物调查、打击文物犯罪等重要的现实问题。

张自成先生代表文物出版社对李零教授《子弹库帛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对参与此次座谈会的先生和女士表示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文物出版社隶属于国家文物局，对出土文献进行整理出版，是其重要任务之一。他对文物出版社的工作成就做了简要的介绍：从建社开始到现在，文物出版社完成了吐鲁番文书、马王堆汉墓、孙子兵法及少数民族文书文献、考古资料汇编的碑刻墓志等工作。而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李零教授的《子弹库帛书》——也是文物出版社新推出的、重要的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

甘琦女士首先讲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香港大学出版社的区别，从而对前者的文化传统做了说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文化身份是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是中国文化的文化身份。其出版品也体现了这种精神。钱存训的《书于竹帛》第一个中文翻译本是该出版社出版的，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1982版和日本1989年版用的也都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翻译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虽然是一个处在中文和英文边缘的出版社，但是肯出版很多、特别难翻译的中文书和原创英文书。李零教授的《子弹库帛书》英文版也将由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一场中国文化研究和传播的接力。楚帛书英文版由两位编辑——杨博士和叶博士负责，另一方面，楚帛书的英文版也将借助中文版责任编辑蔡敏老师的帮助，“站”在文物出版社的“肩膀上”继续前行。

至于楚帛书的翻译编辑和出版进展，甘琦女士谈到，《子弹库帛书》英文版是很幸运的，因为有李零这样的作者，有罗泰教授和夏德安教授这样的译者。而且他们不仅仅是译者，还参与了楚帛书研究的推动工作，比如学者的联名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际共同体，在为一个共同的学术理想工作。楚帛书的中英文版有一个有意思的角度：中文版非常的精美，也非常的艰深；但是英文版上卷在罗泰教授的辛劳工作下，翻译得简明有趣，给英文世界的读者排除了很多的时间障碍和时代障碍。至于楚帛书中的释文，夏德安教授也会用他的方法译成他认为合适英文世界专业读者的译品，整个翻译也将由张瀚墨老师做校订工作。未来楚帛书的英文版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会不断地和译者、作者、编辑，包括文物出版社编辑商量，计划大概在所有稿件收齐之后的一年内出版，做成一个双本——既能合又能分的版本。

陈星灿说道，今年是《子弹库帛书》被盗掘的第75周年，被骗掠到美国的第69周年。《子弹库帛书》是李零先生的第一本学术性著作，1985年初次出版。今年是《子弹库帛书》出版的第32个年头。楚帛书被盗的75年来，有许多的研究成果，而《子弹库帛书》是一个集大成者。楚帛

书研究出版之后做的很多工作，其实是学术史的工作，在美国来追寻他们之间交流的过程——怎样入藏到美国，在美国怎样辗转、收藏。同时，陈星灿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的出版，推动对战国晚期或者《子弹库帛书》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国家的珍贵文化遗产能通过科学方式发掘出来，而不是被盗掘。他还希望借此机会，能把当年盗掘到国外的楚帛书以一种合适的方式要回来。

陈叙良说道，李零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做了全方位的研究——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成就了《子弹库帛书》研究成果，数十年的研究心得。之后，他对李零教授在研究楚帛书方面付出的努力做了细节性的说明：李零先生多次到长沙实地考察，采访蔡季襄的后人，还原了子弹库帛书的渊源。而湖南省博物对于《子弹库帛书》在美国的文物保护状况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而一直以来，楚帛书在中美两地文博机构文化交流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湖南省博物馆也曾积极讨论和调研《子弹库帛书》回归中国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该书一直没能成功回来，但是湖南省博物馆期待《子弹库帛书》或其他文物能在未来以展览或者其他形式回到中国。

“《子弹库帛书》座谈会”上午场的第四个环节是李零、罗泰、夏德安、朱凤瀚、刘乐贤发言。

作为《子弹库帛书》的著作者，李零教授主要给大家分享了《子弹库帛书》从被盗掘到辗转到美国的故事。在抗日战争中，长沙是很重要的战场，楚帛书的盗掘

就发生在第三次会战和第四次会战之间，这之间有一段较长的空歇。在此期间，长沙在修环城公路，盗墓分子借着收集黄土古书籍口号来盗掘文物。这个盗墓小组由四个人组成，分别是任全生、漆效忠、李光远、胡德兴。帛书盗掘出来以后，流落在当时的收藏家蔡季襄手里。蔡季襄收藏过很多文物，其中最有名有三件：第一件是楚帛书，第二件是克利夫兰美术馆的漆木双鹤双蛇，第三件就是陈家大山的帛画。蔡季襄原本一直住在上海，因为房租问题和房客起了冲突，被日本宪兵队关起来，他用他的文物疏通了一个日本人和法国驻上海的领事。从监狱出来后，他就回到长沙。楚帛书就是他回到长沙以后得到的。蔡季襄回到长沙后，正好碰到日本人攻打长沙，他们一家逃难。途中日本兵非礼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就跳到水塘里自杀了，后来蔡季襄1944年写的《晚周缙书考证》就是纪念这事。在逃难中，蔡季襄一直随身带着一个铁筒，里面装的就是《子弹库帛书》。楚帛书被蔡季襄带到吴宫大酒店进行交易，然而对方谎称相机少一个零件，没有经过蔡季襄的允许，就被美国军人带到台湾。本来是要一万美元的押金，然而对方只支付一千块美元。蔡季襄后找吴柱存帮催要帛书，但一直都没回追回来。

楚帛书流传到美国被卖给了赛克勒医生，他直到现在还是收藏所有人，至于其在美国的所有权，《四时令》属于赛克勒基金会，所有的《五行令》则全都在赛克勒博物馆。赛克勒医生曾经谋划，想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落成之际将文物送给中国，但是等到北大赛克勒博物馆建成时，

他已经去世了。

至于《子弹库帛书》所有权问题，李零教授曾在赛克勒博物馆做演讲时讲过，《子弹库帛书》不仅属于中国的学术界，也属于我们全世界的学术界。无论最终帛书能不能回到中国，李零教授想做的是一个复原性的报告，一个复原性的工作。1949年以来很多复原性的考古报告，不仅是学术了解，而且也对了解盗墓和考古的关系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最后，李零教授倡导保护文物，并发明了这样的广告词：“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没有买卖就没有盗墓，文物和动物一样值得保护。”

罗泰教授因为无法到场，通过一个视频，表达了对李零教授《子弹库帛书》出版的真诚祝贺。《子弹库帛书》的写作过程中，罗泰教授也给予了很多帮助，且他是帛书英文版译者之一。

夏德安教授首先转达了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史系苏芳淑（Jenny F. So）教授对李零教授的祝贺。苏芳淑教授和李零教授相识于1990年，他们都是首次在赛克勒美术馆见到楚帛书的。1993年，当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访问快结束时，苏芳淑教授将李零教授的帛书报告翻译成英文。

夏德安教授认为，《子弹库帛书》的出版，不仅对于学术界，而且对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都是一件重要的事。夏教授第一次接触楚帛书是在2007年，2011年经来国龙教授牵线，与柯强（楚帛书流传到美国的关键人之一）的亲人取得联系。2012年，柯强孙女将所有的文件捐献给图

书馆。直到2014年，还一直有关于《子弹库帛书》的新资料出现。从2014年到现在，则没有更多的新资料出现。

朱凤瀚教授主要从研究方法、研究结构和研究思想这三个方面对李零教授的学术研究和《子弹库帛书》做了总结。第一，在研究方法上，李零教授重视对楚帛书原始出土情况复原。楚帛书虽是一件盗掘品，但他尽量将其恢复到原环境里面去，在他的书里出现几次原始的记录——这有助于了解帛书的出土情况。另外，在楚帛书研究资料的处理上，李零教授不仅对先前材料进行梳理，还会进行总结，说出其中的精华——这可以称之为述评。第二，对于楚帛书结构的研究，李零教授在前人基础上，做了更为准确的表述。第三，在学术思想方面，对特殊图形文字表现出的学术思想（如特殊图形怎么解释），李零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是另外一种系统。最后，朱凤瀚教授总结道，李零教授对于楚帛书持续不断地做了30年研究，从书的研究过程到现在，他有一个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所以，对楚帛书进行学术研究，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好处。

刘乐贤教授表示，自己一直很关注《子弹库帛书》，但是因为还没有仔细看，所以对该书的读后感待以后再谈。他主要讲述了李零教授近几十年来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和成果。第一、李零教授在文史论集出版以后，写了一篇以“赶紧读书”为题目的文章，鼓励大家阅读和了解前辈学术，刘乐贤教授借此也提议大家赶紧阅读。第二、以往不太被重视的领域，现在逐渐有了专门的研究，在这些研究里面，李零教

授扮演着“领路人”的角色，而且他是迄今为止研究最为深入、最全面的学者。第三、李零教授对古代的实用文化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做过精深的讨论，先生研究问题总是能够高屋建瓴，给人很好的启发。

唐晓峰教授以一种平行的视角来讲述李零教授这几十年来学术经历。当年李零教授在赛克勒博物馆研究楚帛书时，唐晓峰教授见李零教授经常拿着一张纸反复折叠，从而揣摩楚帛书折叠的方式，后来唐教授才认识到帛书的价值。据唐晓峰教授讲述，80年代初，李零教授非常认真地研究过马克思，通读他的书——他的学术范围特别广。后来，李零教授开始系统地研究方术，这是对学术的一大推动，在历史维度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在西方地理学思想史中，宇宙模式是一个基本问题，那么在我们中国，在什么地方能看到宇宙系统完整地存在呢？式盘就是古代宇宙模式的样板，怎么去讨论中国古代宇宙模式，这是思想史里面非常基本的事情。有了这些认识，我们再去看《山海经》，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严肃的东西。

“《子弹库帛书》座谈会”下午场分为两个半场，上半场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来国龙主持，下半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庆伟主持。参与上半场发言的有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徐天进，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子弹库帛书》字表编订者王月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主任赵平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



李零教授

李守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沈建华；参与下半场发言的有来国龙，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郑岩，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聂菲，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睿，康乃尔大学东亚系教授、系主任罗斌（Robin McNeal），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及文物出版社编辑蔡敏。

上半场首先发言的是徐天进教授，他在2008年就收到过李零教授赠送的帛书研究书。读完李零教授的书，徐老师的感受是，除了帛书自身的学术价值之外，对考古人来讲，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启示，就是旧资料的重新整理。具体的，徐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的，除了帛书之外，还有几批重要的青铜器，这些东西和帛书一样，流传到世界各地。它们资料零散、图像资料不好，现在有条件重新整理这些资料，应该做一些新工作。而徐教授自己也在整理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的青铜器。第二，李零教授对材料的重

视，对细节的在意是考古人缺乏的。李教授在书里专门有一节是讲怎样来做简帛著录，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在他的书里能一条一条地落实。这些对于考古人是特大的启发，好的考古报告，能让读者阅读方便，提供客观、详实、准确的信息。另外，帛书的流传过程，好像跟帛书研究本身关联性并不大，按过去的传统看，只考虑帛书就好。但是整个过程，恰恰可能也是学术研究里面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就跟我们看考古报告，不同历史时期的报告，如果对大的时代背景不了解，体会也不会深。所以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构成我们学术研究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第三，李零老师的书（不仅仅是这本书），精深和广度恰到好处，没有办法再细了。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更广泛的问题需要讨论——小到帛书，大到整个学术，包括整理的方法。这对于我们做学问的人，从最初的资料开始，到一步一步深入，再到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指导意义或启示意义。

孙庆伟从自己的治学道路谈起了与李零教授的渊源。《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是他读李零教授的第一本著作，这也是李零教授自己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大概在1990年左右，孙老师看过李零教授的三本书，都是手写的。当时的感觉是，字写得好，学问大。这几年，李零教授出书的速度很惊人，而接下来，还有好几本书要写。孙老师还谈到，李老师花很多的时间、心血和笔墨去追溯帛书流传过程，其实和考古学家做报告讲来龙去脉是一样的。而李老师注意（楚帛书）墓里面其他的东西，

并一起发表，这其实就是考古的背景问题。一件器物如果脱离了考古背景，很多认识就会出现。

王月前先生是《子弹库帛书》字表的设计者，他主要从参与字表图像、文字处理的历程道出了楚帛书整理的不易。字表最初的设定就是设计成单字、隔纹、分录——也就是现在出版的书里那样。王月前提取了一千五百个左右的字样，按照字的色调、对比度，尽量还原每一个字。为了让字体比较清晰地展示出来，他在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少：有的字特别小，《四时令》里的字在电脑上显示不到半厘米；有的字随着织物变形，文字也脱开了，纤维上只留有一点墨点。

赵平安教授从学者的研究格局和帛书研究情况说，李老师做学问，格局宏大，视野宽阔。对于大的问题，他做的非常非常细，而且能与时俱进，保持持续的关注。楚帛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毫无疑问，李老师是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并一直保持着最前沿的研究水准，起着引领作用。李老师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很好的高度，以及新的材料，可以对照起来进行研究。

李守奎教授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发言。第一，对于非科学发掘的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楚帛书是一个典范。李零教授在文字、文本、文献的研究之上，还整体做了历史、文化的提升研究。此外，对于同一批材料，持续几十年关注，不断地推陈出新，这种学习方法是后辈学者要加强的。对于楚文字的研究来说，楚帛书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类文献。第二，《子弹库帛书》

对于楚帛书的研究非常的全面，接下来，应该有很多与楚帛书直接对应的东西，这样才能使楚帛书研究得以继续发展。

沈建华教授认为，从1942年一直到今天，已经过了75年，帛书流散到美国，开启了最早中国与海外国际接轨的学术合作。另外，沈建华教授主要讲述了李零教授研究楚帛书背后许多艰辛又有趣的故事。如1992年8月份在长沙召开国际马王堆研讨会的会议期间，李零教授胳膊窝整天夹着一本书，就是关于长沙子弹库发掘调查报告。李零教授还专门到上海去寻找蔡季襄居住的酒店和联络地址，做了一番调查。另外，因为楚帛书研究，李零教授和杨振宁教授结缘，成为好朋友。

下半场首先发言的是来国龙教授，他认为《子弹库帛书》的出版意义有四点：第一，对李先生个人学术生涯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点。李先生有自己的追求，从做《孙子兵法》开始，到做金文、铜器，这是他的硕士论文。在硕士论文之外，就是有关楚帛书的大量工作。第二是在楚帛书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从蔡季襄开始，差不多研究过战国文字的学者，都对楚帛书下过工夫。李先生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1985年才出版，但是这个书压了五六年——1980年稿子写完了，很多年以后有一个订补，又过很多年才出版。所以在楚帛书研究里面，清华如果有这方面的材料，可以为以后上更高的台阶奠定很好的基础。第三，从考古学史、艺术史方面来看，来国龙教授对李教授的楚帛书有小小的贡献——他从一位台湾老师那里得知柯强手里有楚帛书的手稿，这个消息

又通过夏德安教授转达给李零教授，从而使其追究这个线索，获得了更多的资料。第四点是关于偷盗文物、国外文物回归的问题。来国龙教授说，现在说文物回归，调子唱得很高，很多东西却落实不下来。但文物不管在哪里，我们把它研究透了、研究彻底了才是第一步。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法律的具体问题，可以讨论。

郑岩教授从通俗小说《盗墓笔记》第一页中的南方楚墓谈起，说这种流行文化和严肃学术都表明了大家对古代东西的好奇，这是他对楚帛书的基本认识。其次，郑教授说到，对于楚帛书，如果历史这个词是关键词，那么它是“复数形式”的：李老师对文本的研究，这是一个历史；对墓葬的重构，这是考古学的训练，是另外一种历史；第三种历史最奇怪，即李零教授谈楚帛书的流传史。流传史说是学术史，好像也不纯粹是学术史。对于李零教授学者身份的认识，郑岩教授说，若干年以后，出李先生的选集，作者身份一定要加“s”：李先生可以是文字学家，可以是考古学家，可以是历史学家，可以是思想学家，也可以是作家。作家没有贬义，他很喜欢李老师把简洁有力的短句子叠加在一起，形成无与伦比的节奏感。郑岩教授对于李零教授的评价是极致——李零教授关心的问题很广泛，无论是学术随笔，还是学术研究，他都做到极致。

郑岩还谈到了艺术史的问题。从商周到秦汉，战国早期的绘画发生了很多变化，战国是一个转折期。很多学艺术史的人将中国最早的卷轴画推到《子弹库帛画》这里，其实真正的卷轴画到唐代以后才开始

慢慢出现。传统艺术史的写作缺少考古学、历史学的大背景。这些年，大家在做转向，转向结合相应的史学、考古学研究。

聂菲研究员补充细节说，李零教授去湖南长沙实地考察过程中，对每个问题都非常严谨——查照片，查档案，查离开的时间。李零教授的楚帛书研究对湖南博物馆最近的马王堆和湖南展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聂菲研究员还对湖南省和楚文化的关系做了简要介绍：自1973年以来，湖南省博物馆对子弹库进行考古发掘，已经完全确定这座墓葬是战国中晚期典型的墓葬。这个墓葬的出土说明了楚文化入湘对湖南文化政治、经济、文化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已经证明在西周的晚期，楚文化因素以两条路线大规模地进入湖南地区，特别是在岳阳地区遗址里面发现了漆器。在春秋中期，楚的势力基本上达到了湖南的本部；春秋中晚期，已经到了湘江一带；春秋晚期，基本到了湘南地区。楚势力的纳入促进了湖南的经济发展。而楚帛书本身也反映了当时纺织制造业的繁荣和文字的普及。

张春龙研究员说，因为李零教授把楚帛书的出土过程调查得很清楚，所以给他们湖南省博物馆的后期挖掘带来了很大方便。李零教授一直在追踪调查楚帛书的资料，不单对楚帛书，还对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从现场资料整理，到表达，再到报告的编写都寄予了很多期望。

王睿研究员由楚帛书联系到了古代的图书以及图像问题。在印刷出版之前，图书的形态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以图为主，以文字为主的，图文并重的；图文有

以文字重的，也有以图重的。而楚帛书属于图文并重类型的。楚帛书很长时间以来不能被识读，就是因为识读起来有困难。我们古代图书中的图去哪儿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山海经》只剩下文字部分，没有图。图象和文字是两种文化符号，这两种文化符号在发展过程中，识读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在时间过程里，图像被过滤掉了。为什么会被过滤掉，怎么样被过滤，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文化符号的识读是靠什么形式灌输的？是教育，还是集体活动？

罗斌教授的发言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研究方法，一是《子弹库帛书》研究内容。至于前者，罗斌教授讲到李零教授特别喜欢做研究，特别喜欢考察问题。在平常学习交谈中，李零教授会和别人分享他的观点，但是在后来出的书里，有些东西又会有所不一样。至于后者，罗斌教授希望大家能关注楚帛书中的四时概念，《子弹库帛书》把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结合在一起，一个宇宙的形态形成了。

王博副校长对李零教授的写作风格和人作了一种风趣幽默的解读。他说，自己喜欢李零教授的文字风格，正经里面透着一点不正经。对于李零教授的名字，王副校长说，这个零，往任何东西上一加，那个东西就被放大了。这个零往老子上一加，老子就被放大了，拥有了很多的读者；往孔子身上一加，孔子就被放大了，也有很多读者，有很多争论。李零教授是个思想家，一个有思想的人，他总能够非常认真，非常严肃地了解不同学科的知识。另外，对于楚帛书中所提到的四时观念，王副校

长认为是一种很重要的观念。在不同的知识领域都有四时观念，比如经书中的《尚书》，黄老书，地理学的书，以及现在的楚帛书。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四时可能有关一个知识发生的次序，或者逻辑的次序。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要谈论了和李零教授接触交流的感受：跟李老师出去考察，到处看看，每时每刻说的话都特别由衷，是很自然的学问。李老师喜欢哪些事物，他就会联想，把自己最有趣的各种知识不断的进行跳动，然后联系，从而发现乐趣。李老师历来关心最远古的东西，他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学者，是特别天真，又有真感情的人。

蔡编辑说，本来可以让楚帛书早点出版的，但是种种原因，拖了下来。巴纳先

生的英文版是一个很好的本子。楚帛书这个稿子本身的复杂性超出了蔡编辑的意料。在编辑楚帛书过程中，蔡编辑一直想着怎样让这本书比巴纳先生的那个本子好。

李零教授最后对“《子弹库帛书》座谈会”做了一个总结致辞，他说，非常感谢学界的各位朋友，能够一起来座谈和他分享这本书的出版。首先，他感谢文物出版社，花这么多的精力最后终于把它出版了，自己的一块心病了结了。另外，对曾经参与过这个书的调查，以及给过他支持的人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很多各方面学者的参与，这个书不可能以这样的形式来问世。

（撰稿：陈彬彬）

## 49

### 范迪安、陈嘉映等： 天心：徐龙森的山水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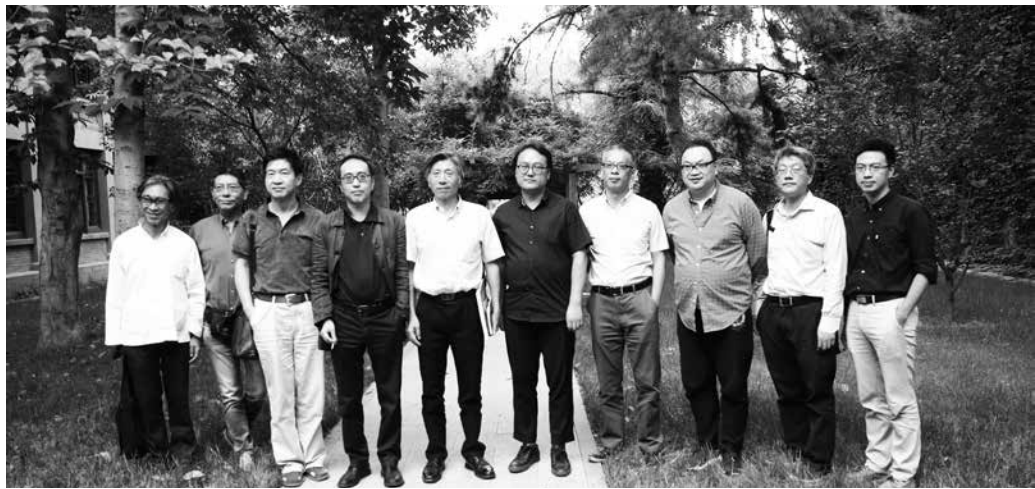


范迪安教授

2017年9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四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天心：徐龙森的山水世界”。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





与会嘉宾合影

学院院长高士明教授主持论坛并作引言，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郑力副教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俞建拖、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文研院学术委员李零教授、朱青生教授也听取了讨论。

论坛开始，高士明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此次论坛的缘起。近年来，徐龙森先生的山水画作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是破局之作。徐龙森先生本人就是一本大书、一局天心山水，他50岁之后独身一人来到北京，发了“一拳打破古来今”的大愿，心心念念在于山水，以巨丈的方式呈现了不一样的山水画卷——高士明先生提到，这次论坛不仅是讨论徐龙森的山水，更是要讨论我们的山水，通过对徐龙森先生的讨论唤起大家对山水的认知和感觉。

引言环节，高士明教授表达了对明代以来高度程式化的假山假水的不满，他认为今天山水画的危机核心是山水经验的危机——中国的山水传统中其实隐含了一个今天所缺乏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对山水的感知化为一种山水经验，维系着人与世界的本源性联系，这一联系不在主客之间而在天人之际，山水大物终是假名。因此高士明教授希望这次讨论能够起于画作，但超出山水画界，讨论山水经验。随后他通过投影展示了徐龙森先生的一些画作和工作场面，并用一段影像展示了2009年在布鲁塞尔皇家大法院的展览“山不厌高”和在纳尔逊博物馆的“江山行旅”。

讨论环节中首先发言的是范迪安院长，他是徐龙森先生艺术和展览的重要推动者。发言中，范迪安首先表达了对北大的敬畏和对文研院邀请的感谢，他认为我们应当从一种全球文化进一步交汇、碰撞的张力中思考中国文化。首先他引用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的“际”、“变”、“言”来说明今天的研究应该关注交汇的地带，把握新的突破和变化规律，用图像的语言表达“一家之言”。其次他将徐龙森的作品呈现概括为“谋求独化的途径”——在布鲁塞尔高等法院的展览是中国的“自然”与西方社会“法则”的对话，在罗马市政博物馆的展览是“造化自然”与“人造自然”的对话，在纳尔逊的展览与宋画同时展出则是当代山水与传统山水之间的千年对话。接下来，范安迪院长从历史中人与山水关系的变化来把握徐龙森的意义，以魏晋时期《画山水序》为界，中国画中的山水从混沌的宇宙中剥离开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成为人们可以感知的此岸世界；而北宋时期的发展，则进一步将山水与时间变化联系起来，这折射出中国文化对生命与时间的敏感；到了现代社会，山水画传统如何突破成为时代命题，徐龙森的巨幅画卷呈现了一种新的综合复合形态。

最后范安迪院长总结到，今天中国艺术的创新，不仅仅需要寻求传统文化的支持，更要集合多样性的文化资源，进行总体的艺术创造，比如今天“一带一路”议题倡议下的文化交流。一方面在边界之“际”寻找新知识的增长点，一方面在运用“通观”的胸怀和方式进行整合和创造。

随后，著名画家中国美术学院郑力进行发言。他介绍了自己与徐龙森先生接触的历史，他从三个方面讲述了徐龙森先生及其画作的独到之处。首先他认为徐龙森先生是一个具有崇高使命感的理想主义者，为人清澈明净，非常用功，做事以道统为原则而又放浪不羁，爱好喝酒，这种性格

和刺激给了他一个非同寻常的起点和格局。其次他认为徐龙森先生在选画上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和能力，从不人云亦云，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我行我素。而从他画作的技艺上看，不管是用笔还是用墨，都有一种超高的能力和掌握：他巨幅画作的手法却是用一种画小的册页的手笔进行的，其间的难度非言语能尽；对水与墨的理解和运用，徐龙森做到了极致，而且他的画作只有在远处才能看出山水画美的追求和意向；他画作中笔的运用更是挥洒自如，用笔和运墨的心手合一，其气格远在唐宋以前。郑力认为，徐龙森的创作方式和创作结果都是前无古人的，虽然可能徐龙森自己并不在意这样的评价。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教授也从哲学的角度谈了对中国山水传统的看法，他认为，在希腊文明中“自然”与“自然界”、“自然”与“山水”之间差的很远，他认为希腊的“自然”没有走向“山水”值得大家讨论。比如西方艺术发展中晚近才出现了风景画，而且与山水画之间相距甚远。他认为这个现象的根源可能在于希腊“神人一体”的文化将人与完美的神都作了呈现，因此不需要风景或者山水来描述。而在希伯来文化中，一直拒斥有形象的神，因此对超越界无法用形象呈现。而中国山水从自然切入，联系了人类形体与社会，又超出了人的形体与社会，成为一种心智的寄托和安顿身心的方式。而且不仅是绘画艺术，在文学作品中这个特点也很明显，西方作品中缺少中国人对山川形胜的自然描写。最后陈嘉映老师提了两个问题：在西方艺术中有没有哪个阶段与山水画很接

近？中国人与山水的关系是不是与中国人没有超越信仰的文化状态有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赵汀阳研究员结合阅读张文江《渔樵象释》的感想，从历史、山水和渔樵三种意向出发进行讨论。历史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支点，它的起源经历了从巫转史、从天命转向人性的变化，过去占卜的工作寓于历史之中，文化的眼光由天落地，人们从事物之中获得直接性的经验，而山水恰恰就是一种与俗世相对立的直接性经验来源。在此视角下大地被分成了逐鹿之地与山水之地——山水是超越性的世界；而山的不变与水的变化又代表了中国人对永在而非永恒的追求，只有变与不变的共存而非完全不变才是中国人理解的永在。在山水的基础上产生了一批特殊的人，就是渔樵。他们是中国式哲学家，归属于山水，唠叨着变迁与革命，通过无穷无尽地讨论将时间拉入历史之中。由此山水成为容纳一切历史的隐喻，作为旁观者静静观察着历史的变与不变。渔樵也要背着山水才能观察历史，谈论成败，这就是山水的独特资格。

高士明先生对此进行了评论，他提到浙江巫山的江湖汇观亭，亭中一幅对联“八百里河山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灯火尽归此处楼台”其实也在描述一个一览人世的位置。他提出了两个问题，山水犹如理想中的桃花源，但是为什么渔人还要离开？从艺术史来看唐代、五代、两宋的山水画中仍然是有社会的，元代以后山水画才真的“去社会化”了，为什么那个与社会生活相连的真实山水反而被历史排异出去了？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认为，对这个问题需要追溯“际”的涵义，他从夷夏之辨和文质之辨两个方面来阐述艺术的流变。从夷夏之辨来看，魏晋、宋代都是重要的转折点，各民族融汇之“际”催生了丰富的艺术形式。南宋之际文化兴而武力弱，出现了代表文人私密性、趣味性的手卷；明清之际的“遗民画作”与诗歌中的“残山剩水”相互映照，反映了文人对世道变迁的哀叹。从文质之辨来看，这对矛盾在历史中一直此消彼长、循环往复。与当下中国的进步史观不同，徐龙森的画中完全没有人，反映出一种“由文趋质”的现象，展现了他对文质之辨的理解。

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在讨论中首先回应了陈嘉映教授的问题，即如何理解中国山水画和西方风景画之间的区别。从西方风景画的发展来看，早期风景画以人物为主宰，随着近代自然的高度科学化，风景画极大发展，用以对抗科学化趋势。李猛教授认为风景画与中国风水画的差别，更深刻地体现在两种文明对天地的理解中，希腊文明较早地消解了天的概念，使用“自然”；而中国的山水虽然立足于大地，但其支撑性的概念却是“天”。另一方面，西方的风景画是作为一种被框定的图景呈现，而中国风水画却是无法被框定的。李猛教授也谈到在布鲁塞尔和罗马的展览策展中巨幅山水与原有画面构成的对话关系，它没有挑战意味，反而是和谐相处的，体现出一种自然的观念。他也强调了中国山水文明的滋养对现代社会的启发，在秩序介入和发声的意义上值得思考。他最后回

应了郑力的观点，即徐龙森的画作有一种只有远观才能欣赏的特点，这与希腊建筑中的圣地有某种相似之处。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在评论中首先回应了李猛和郑力的观点，他认为徐龙森在西方博物馆空间中的呈现，既有本体论意义，也有对话意义，还有对我们的意义。他提到在传统经典比如郑玄的《周礼》中，山水文明具有“开门见山”的意象，是一种山水巨障的形象。因此山水并非封闭空间的创造，而是与自然呼应的作品，是一种“小天下”的境界。这种山水的“小天下”并非西方意义中自然法则的构造，而是一种经验性感受，通过笔触营造一个天地之象，表达出“天地”概念。山水除了纵向天地的无限外，横向上也是无限的深远，隐含着平衡与秩序。山水中呈现的不是一个自然法的自然，而是一个自创自然，它融入了人事的历练与对自然的描摹。

另外，渠敬东教授也介绍了徐龙森先生的发展路径和画作意义。徐龙森先生的意愿在于接续北宋传统，撇开南宋至元代以来从“物象”到“心象”的过度自我刻画，努力呈现全景山水的无形大象。他这种回归并非是单纯技法上的回归，而是带有个人内在精神的努力，是与自己内心斗争并坚持的真实写照。他的画法是他生命体验的合流，它是经验的、实践的，以他的坚持为归，积累着对历史、传统及世界的观察，以此成就了他的作品。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俞建拖先生从需求和供给角度对山水画的进行评价。对山水画的需求来自多个方面，它首先是

文人自我表达的需要，也是他作为社会成员向社会提供理念和价值，影响社会文化的需要。每个社会都需要一些积极的因素推动文化的进程，山水画的回归也表达出社会对这一艺术形式的需要，以及人们对其精神价值的寻求。徐龙森创造了大量内容丰富、形式独特的山水画，其价值可见一斑。

高士明教授最后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诚挚地感谢各位与会者的热烈讨论，高度赞扬了徐龙森先生的艺术追求，称其不仅是在追溯五代与宋的画境，甚至要回到东汉王延寿的《灵光殿赋》中。他及山水画界的朋友也希望积极努力，将山水画作追溯的更远，古至盛唐的《碧落赋》、魏晋的《东临碣石》、以至《山海大荒经》，不但看山水，亦看天下，恢复在浩瀚宇宙中顶天立地的人。

（撰稿：包培含）



## 50

## 布鲁斯·卡明斯等：反思美国区域研究



布鲁斯·卡明斯教授

2017年9月1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反思美国区域研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教授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主持论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咎涛副教授，新闻传播学院王洪喆助理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刘海方副教授、雷少华助理教授参与讨论。

卡明斯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东亚史、朝鲜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专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古斯塔夫和斯威夫特（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杰出贡献教授、前历史学系主任。他于1999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其著作《朝鲜战争的起源》第一卷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图书奖，第二卷获美国国际研究学会昆西·赖

特（Quincy Wright）图书奖。此外，他还是《剑桥朝鲜史》的主编，并多次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民族报》（*the Nation*）、《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等期刊杂志发表文章。

卡明斯教授曾发表两篇有关美国区域研究的文章，并在相关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因而也成为“冷战社会科学史”论说的发起人之一。这两篇论文分别是《边界位移》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1997）和《咬那只喂你的手》（*Biting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Why the 'Intelligence Function' of American Foundation Support for Area Studies Remains Hidden in Plain Sight*, 2004）。

卡明斯教授坦言，撰写这两篇文章原

因有三：一是受“愤怒”和“抗拒”两种情绪的驱动，其意图在于批判；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些被前任学者忽略的、有关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支持地区研究的证据；三是因为几位家庭成员都曾与中情局发生关联——他的父亲在1950年代初期短暂加入过，而他的姑母则为其服务近三十年。

卡明斯教授谈到，70年代，一份激进报纸曝光了当时全美最大的学生组织——全国学生协会（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长期受中情局资助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不少人表示愤怒难忍，相关组织的领导成员也纷纷表示并不知情。而卡明斯指出，不仅是学生组织，美国的区域研究也与其关系密切——50、60年代多数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科学家或社会学家就与中情局合作密切。

在他看来，身为一位知识人或许会面对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成为职业学者，二是为国家服务。而他本人的观点是：你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条道路，但绝不要同时走这两条道路。七十余年的人生路，卡明斯教授谨守界限，不曾接受过来自情报部门的任何资助，也不曾与之合作。

接下来，卡明斯教授对“区域研究”的概念内涵和起源做了简单介绍。他风趣地将区域研究的创建称为美国对外部世界研究时取得的“活动腿脚的地儿”（elbow room），也就是高等教育体系内制度化的生存空间。截至1945年，多数美国大学历史系的研究领域是这样分布的：美国史是最重要、研究力量最强大的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次是欧洲史，准确的说是西欧各主要国家的历史，如英国史、法国

史和德国史；中国、印度等国被视作“伟大文明”，相关研究和教学的内容也基本上局限于古代经典文献和著名学者的思想学说；而像中国周边的几个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则一般划归在“汉学”（sinology）名目之下，并无独立的学科地位。在当时，二战引发了对海外知识的急迫需要，而这样的学术配置难以对此进行回应。汉学家们虽可阅读中文却无法用中文交流，他们专研古代中国，却对现代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所知不深，不能提供有直接帮助的见解。在此背景下，战后掀起了在大学内推进区域研究的浪潮，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于1962年迎来了第一位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何炳棣教授（当然还有此前来到政治学系的邹谠）。时至今日，系内拥有五位研究现代中国的教员，中国历史领域也已完全成为芝大历史系建制的一部分。

在谈到区域研究和常规院系设置的关系时，卡明斯教授指出，在区域研究建制化的过程中，它不断面对来自于政治科学等自称“更为理论化”的学科质疑和挤压。这种情况在不同院系有不同程度的表现。1980年代末的芝加哥大学，计量方法和理性选择理论正流行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界，在这些学科内部，对某一区域研究专家来说，除非他能证明自己具有理论水平或精通数字统计，否则很难被同行们认同。

至于推动战后区域研究制度建设的资金问题，卡明斯教授强调了情报机构和基金会的作用。由于国会迟迟不愿拨款资助大学中的区域研究，中情局在五、六十年代通过福特、卡耐基等基金会组织为区域

研究投入了数额巨大的资金支持。1957年，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号人造卫星，国会在震动的刺激下，终于于次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NDEA），该法案第六款明确提出，联邦政府将资助拉美研究、非洲研究等“语言与区域研究”项目。

在卡明斯教授风趣且掌故丰富的引言之后，几位参会的嘉宾学者分别结合自身学术工作发表感想。牛可副教授认为，卡明斯教授此次发言，较其已发表的两篇区域研究的文章似乎更加复杂、平衡和丰富，他对此表示赞赏。近年来，牛可副教授本人也对美国区域与国际研究的历史有所关注。根据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关于区域研究的相关档案文献所示，美国区域研究的创建和发展并不能仅仅通过“冷战社会科学”的单一模式来解释。在情报部门和国家资助、引导、控制区域研究之外，推动区域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群体有着更高远的超越政策效用的目标，和对“跨文化理解”（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的真诚追求，而这也是应当予以承认和赞赏的。其中的一些区域研究学者更是有意识地与情报部门和政府部门保持距离，抵制政治权力对学术的侵害。他认为，认识到这些对于推动中国自己的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咎涛副教授分享了他本人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欧亚研究系访问期间的见闻。两年间，他逐渐了解到该系具有国防研究的相关背景——该系最早是为二战中军队专

门的语言训练项目（ASTP）而设立的，其一度财力雄厚，大部分学者是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旁听乌兹别克斯坦语时，他认识了两位学生，其中一位在学期中突然消失，后来得知这位同学曾经受雇于情报部门。卡明斯教授对咎涛副教授的分享内容很感兴趣，据他介绍，印第安纳大学的中欧中亚研究在全美的排名很好，由于冷战期间中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相关的区域研究也享有颇为重要的地位；随着冷战结束，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成为独立民族国家，中亚研究的重要也进一步提升。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时，中情局内就曾雇有一位操阿富汗官方语言（即普什图语）的雇员。

雷少华助理教授在评议环节提出了如何看待中情局对区域研究资助性质的问题。对此，卡明斯教授指出，情报部门的资助或许是一种带有宣传目的的控制行为，但同时，这种资金支持也的确为美国区域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使学者们具备到海外展开田野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机会，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学术研究水平，及美国对于世界其他区域的认知水平。卡明斯教授并不认为中情局希望将所有学术研究应用于海外宣传，不过在冷战期间，美国在朝鲜半岛发动的心理战可以作为区域研究被纳入宣传战略的活动之一。雷少华助理教授紧接着提问，应该如何正确评估和使用近年来解密的中情局档案？卡明斯教授建议，学者在阅读情报部门相关档案报告时，应结合其他已公开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人类学家的实地考察），对所研究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后做出判断，避

免被有明显谬误的档案信息干扰，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

刘海方副教授提问到，在美国，国家对于区域研究的资助是否存在优先次序？非洲研究大概处于何种地位？卡明斯教授肯定了这种优先次序的存在，进而指出，联邦政府资助区域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要了解敌人的情况——冷战期间美国的首要敌人是苏联，其次是中国大陆，再次是东欧国家。朝鲜一直是个麻烦。早在1960年代，四大基金会就出资设立了六个朝鲜研究中心。以后几十年，随着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了相关区域研究机构之中。卡明斯教授还提到，尽管在1980年代零星出现了有关安哥拉的研究项目，但非洲一般被视作一个整体的学术研究对象。此外，非洲研究有时也被置于对英、法、荷等帝国殖民地的研究类别之下。他还指出，近年来，恐怖主义在北非兴起蔓延，非洲研究的重要性将会持续加码。

王洪喆助理教授注意到，卡明斯教授的两篇论文分别作于“9.11”事件前后，他想了解卡明斯教授的看法是否受到该事件的影响而有所变化。卡明斯坦言，他曾在“9.11”之后对该事件作出评论并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出版，但当时所做的一些分析判断——例如预言类似恐怖袭击不太可能继续发生——时至今日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他认为，相比于珍珠港事件，“9.11”对于美国的影响并不具有彻底转变的性质，它只不过强化了原先既已存在的种种趋势。但对于学术界而言，“9.11”可称得上是一份巨大的“礼物”，它为新的政策研究赢

取了大量资金，也使得学者与情报部门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密切。

牛可副教授还就区域研究在大学内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的情况提问。就此，卡明斯教授解答道，芝加哥大学风格趋向保守，院系组织比较坚固，新的研究领域历来不易获得专属的组织平台。区域研究的发展通常都在常规系科内部进行，而各系也往往不易争取到设立区域研究教席的权利。芝加哥大学一般没有全校范围发展区域研究的计划，也不像其他大学那样设立国际和区域研究中心与学院（school）。即使区域研究机构招聘，也只是行政人员而非教员。卡明斯教授所属的朝鲜研究就是通过一个项目（而不是中心）来加以组织的——这个项目也有活跃的学术联系和共同活动。他表示，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区域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政治学系也在比较政治学下为区域研究提供教职；但在人类学系、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注重理论化的趋势导致地区研究被抵制甚至排斥。90年代后的十多年里，社会科学中浓厚的实证主义氛围降低了区域研究的地位，近年来，人文学科对区域研究的参与力度却也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卡明斯教授也观察到一个有利于区域研究的趋势，即随着国外学生比重的不断增加，大学管理者开展了更多的有关海外地区的学术活动。

（撰稿：陈希）



## 51

## 文明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方法与反思

具体内容参见“文研周年”周年学术论坛。

## 52

段晴、林梅村等：  
两汉魏晋时代丝路南道的多元文明

2017年10月10日晚上，“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两汉魏晋时代丝路南道的多元文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持论坛并作引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外国语学院姜一秀，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罗帅，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开始，段晴教授追溯了丝路南道多元文明交织的历史。按西域诸国兴起的时间顺序，首先可追溯到精绝王国。现在的尼雅遗址部分覆盖了西汉三十六国之精绝国的部分地域。精绝王国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原本仅存在于汉文史籍《汉书》当中，在西汉时已经不复存在，并入了后起的鄯善王国的版图。

对精绝故地的确认主要根据斯坦因发掘出的书简。上世纪初，斯坦因曾四次进



段晴教授主持并作引言

入尼雅，发现大量佉卢文世俗文书和少量汉文书。斯坦因第四次考察所获文物至今下落不明，照片却一直保存在英国图书馆中。90年代，中国学者王冀青、林梅村亲赴英国图书馆，才将斯坦因在尼雅第14号遗址发现的22枚汉简公布出来。其中一枚上书写有“汉精绝王，承书从（事）”的字样，表明14号遗址所在地就是精绝故地。同时，林梅村教授推算出14号遗址出土的汉简来自西汉王莽时代以及东汉初年，尼雅遗址

最早使用的文字是汉语。在精绝王国时代，中原汉文化进入西域时显示出强势的劲头，汉语成为精绝王国的官方用语，汉文化的影响也体现在物质文化的各个方面上。这一时期最精美的文物是尼雅遗址出土的织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极具中原汉文化特色。

段晴教授强调，精绝王国仅仅存在于汉代。在魏晋时代，它逐渐沦为边缘，成为散落的聚落住地。西汉三十六国在历史上都是立体的存在，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永远存续。

还在西汉时，精绝国后来被鄯善兼并。鄯善即《汉书》中的楼兰王国，《后汉书·班超传》明确记载：“鄯善本西域楼兰国也。”但是鄯善王国的名字未见于佉卢文书中，“鄯善”也并非源自汉语，而仅仅作为地名存在。与“鄯善”这组音最为接近的是中古伊朗语的Šāhān-šāh，即“王中之王”。这一政治理念起源于两河流域，人类历史上第一大帝——波斯帝国就依照此建立。这一理念在西域丝路南道的小王国里面也可以看到，比如佉卢文书中有几个佉卢王称自己为王中王。从鄯善Sahan这个词来看，楼兰转名为鄯善时，兼并了周围包括精绝在内的小国，在此之后，它自称为王中王。

鄯善王国时期的流通货币是汉佉二体钱。铜钱一面是佉卢文，一面是汉文。佉卢文是贵霜的官方文字，可见西域当时的主要势力是贵霜人和汉人。公元100年，班超治理西域31年后回抵洛阳，东汉逐渐失控于西域。林梅村教授总结过，《后汉书·西域传》关于西域的绝笔之年是公元175年，

在此之后，东汉还延续到了公元220年，这意味着东汉对西域有几十年的失控期。这期间西域各王国在文化领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开始以印度西北方言为官方语言，佉卢文为官方文字。段晴教授认为，东汉撤出之后，大月氏败于兴起的波斯帝国。在公元2世纪后期，萨珊波斯兴起，贵霜衰落，人们逃至丝路南道一带。

接下来，段晴教授对佉卢文进行了介绍。印度古代文字唯有婆罗谜文字和佉卢文，前者晚于后者诞生。佉卢文虽然是印度的书写文字之一，但它并未普及，仅是贵霜王朝时代的一种文字。后来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也退出历史的舞台。段晴教授认为，仍有佉卢文随着贵霜人、大月氏人深入到了丝路南道各个绿洲，进入尼雅、和阗，并使用到4世纪末。人们对佉卢文非常陌生，但实际上它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有一批佛经是用佉卢文记录的。斯坦因当年也在和阗库尔玛尔石窟见到了佉卢文。

据林梅村教授统计，尼雅遗址发掘出的佉卢文简牍上，共出现国王八人。东汉撤兵之后，汉朝对西域记录一片空白，学者无法得知当时尼雅遗址上发生了什么，而只能从佉卢文简牍中得知当时出现了使用佉卢文作为官方语言的王国，名为纳缚波。纳缚波是尼雅遗址上最后的王国，它也不是鄯善——鄯善始终没有出现在佉卢文中，只能算作一个政治概念。纳缚波国则是贵霜的一支逃至丝路南道并建立起的王国。

段晴教授认为，既然尼雅从贵霜王国流亡而来，那么它在词语当中必然留有贵

霜的痕迹。佉卢文是贵霜王朝的官方文字，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斯坦因通过对“dramga 官署”这个词引申义的考证，说明纳缚波的王室来自犍陀罗一带，曾经是贵霜王朝麾下的藩王。另外，佉卢文的书写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国王御用简牍楔印检；另一种是皮质的，出土文物有马伊利王写在羊皮纸上给官员的密信。可以看到，贵霜王国贵族都接受书写教育。

同时，尼雅也是一个与汉文化圈毗邻的绿洲，文字语言中大量存有汉的特征。比如有一个翻译词“主簿”，佉卢文写作“cozbo”。纳缚波国由王土和封地构成，并无“州”的划分。凡是纳缚波国的国民，或者属于国王，或者属于封地的领主，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真正的自由民只有僧团的僧人。在公元3世纪最后的30年，封地、部族与国王产生了矛盾，当时的马伊利王利用“主簿”这个汉代官职的引入，对尼雅的官僚体制进行了一场变革。

随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姜一秀进行发言，主题为“从佉卢文书中的刑罚看汉魏丝绸之路的多元文明”。姜一秀提到，佉卢文书没有明确记载当时的刑罚体系，但可从出土的法律文书中进行推断。佉卢文书中与刑罚相关的佉卢文词汇大约有十个，即 Damda、Avimdhama、Mugesā、Sitha、Prahara、Nigrāha、Hastagada、Bamdhana、Masu Khoritaga、Musga Chimdavo。直译成汉语即“惩罚”、“罚金”、“罚款”、“教训”、“杖罚”、“囚禁”、“拘捕”、“束缚”、“剔除头发”、“割除辜丸”。从词源来讲，Avimdhama

和 Mugesā 这两个单词的词源不是很清晰，著名语言学家布罗认为这两个词都来自尼雅本地土语，意为罚金。

姜一秀表示，刑罚词汇的方式标准与周边的文明有相似性，并以 Musga Chimdavo 割除辜丸一词举例。割除辜丸这种刑罚以往见于斯坦因等人发现的文书中。Musga 是梵文中的“小老鼠”，引申意为辜丸；Chimdavo 意为切断。青海藏医药博物馆收藏的司法文书中这样写到：“若是有人第二次提出意见，将被杖打一百，并将被放置木楔于生殖器中，割除辜丸。”姜一秀则在新疆博物馆藏的文书中读到：“谁若是第二次对此争议提出起诉，将会给予他杖罚，并且割除他的辜丸。”这两份文书都载有 Musga Chimdavo，并且与杖罚同时出现——给要翻供的人提出的威胁性刑罚。

这个词汇来自印度雅利安的语言，印度也有类似的刑罚。《摩奴法论》第十一章规定：“玷污师傅床第者必须坦白罪过……不然，他可以亲自割去其男根和辜丸，并且把它们捧起来合上双手向恶魔的世界笔直走，直到倒下为止。”对于犯罪的情况，《摩奴法论》的总体原则是犯法人以哪个身体器官犯罪，就割除哪个器官。只有不当的男女行为才会导致割除下体的行为，由此可见，古印度并不存在单纯割除辜丸或者下体的规定——这一点极大区别于佉卢文。

中国的宫刑最早在《周礼·秋官·司刑》中提出，“宫者，丈夫割其势”。纵观史书中记载，关于宫刑的形式有多种说法，而受刑者鲜因男女关系判刑。此外，东汉

时期记载的因大逆不道被判宫刑，则是冒犯了皇权。佉卢文书中对于男女宫刑的判例与中原王朝一致，从刑罚方式上来看，两者都因大逆不道之罪割除辜丸。甚至可以这样说，佉卢文书中的几种刑罚正来自中原王朝的宫刑。

姜一秀总结道，尼雅文明中的十种刑罚反映了丝绸之路文化的多元性。一方面，这十种有关刑罚的词汇都能在印度古代经典中找到源词汇；另一方面，细究尼雅刑罚的体系，则与汉魏时期平行。由这些事实可以推出，尼雅的刑罚受到三种文化影响，并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罗帅分享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简述贵霜王朝历史以及佉卢文进入丝绸之路绿洲时间和原因。首先，罗帅简单介绍了贵霜王朝的领土扩张史。根据《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公元2世纪，月氏人被匈奴打败，逐步西迁，在大夏分为月氏五翕侯。约公元30年，丘就却统一月氏诸部，积极向兴都库什山以南发展，逐步蚕食印度-帕提亚王国。接下来，两个王一直在寻求扩张，占领了印度河流域。到迦腻色伽前期，占领了恒河中下游地区。在贵霜前四王的时候，随着军事扩张，贵霜也发展起一个广泛的国际贸易网络。它的贸易范围向西到达西印度洋地区，向南向东到达东南亚地区，向东沿西北路上丝绸之路，到达塔里木盆地、中原地区，长安洛阳等地都有贵霜的足迹。贵霜王朝与汉朝的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建立贵霜王朝之前，大月氏就同汉朝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敦煌悬泉汉简中有17枚提到了大月

氏，斯坦因第四次进行中亚考察时在尼雅发现的一枚汉简，也提到大月氏使者。

在佉卢文进入丝绸之路的时间问题上，罗帅基本认同林梅村教授所提出东汉末年这一说法。罗帅认为，佉卢文进入丝绸之路与汉朝的统治相关。西汉的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与管理制传入该地区，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汉朝的治理涉及政治、文字、社会体系等诸多方面。文字方面，在汉王朝势力进入之前，各国有语言而无文字。在汉王朝统治时期，官方通行汉文——这为楼兰、尼雅等地出土的汉简所证实。尼雅遗址出土的一批西汉汉简，字迹为较为熟练的汉隶。罗帅认为，这批汉简可能由专门的文案机构为精绝国的王室成员代写。

罗帅表示，汉朝统治时期，汉文在绿洲国家上层社会中使用。公元175年前后，汉朝势力撤出西域，绿洲国家文案机构中汉人离开。此举导致汉文维系的文字社会面临严重危机，并影响到各国行政、经济、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此时，各国都需要寻找汉文的替代品。由于国土狭长险远，鄯善国的行政管理层对文字的需求更为强烈，由此，国王直接引入了犍陀罗语佉卢文。

随后，罗帅提出，佉卢文进入鄯善等国时承担贵霜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不大。究其原因，贵霜基本上未曾对塔里木盆地实施过有效控制。贵霜王朝的兴衰轨迹与东汉王朝大致重合。公元2世纪中期后，汉朝式微，对西域的统治变弱。同时期，迦腻色伽之后，贵霜也再没有能力向外进行大规模扩张。至公元230年前后，贵霜在

今阿富汗的领土逐渐被萨珊蚕食，退缩到西北印度。东汉末年，也就是鄯善采用佉卢文初期的时候，贵霜王朝自身内外交困，不大可能对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施以政治军事压力。换言之，佉卢文得以在鄯善流行，并非出于外部的政治军事原因，而是出于内部因文字真空所导致的对 newText 的需求。

论坛最后，林梅村教授回顾了自己四十年来的佉卢文研究历程。若要研究佉卢文，先要学难度较高的梵文，还要通巴利文知晓一些音变规律，最后才能开始学佉卢文。对佉卢文的研究是从法国开始的。斯坦因委托波耶尔、塞纳、拉普生三人加入佉卢文文书的考释工作。现在的研究发现，在东汉末年，于阗、龟兹都在用佉卢文，后者的使用时间最长，一直持续到7世纪。当下的研究情况存在一个问题，即提出一个新的说法，就是在挑战很多人的说法。林梅村教授认为，研究佉卢文可以利用北大的优势资源，“联兵作战”，比如可以找藏语研究者来破译佉卢文中的地名难题。

同时，还可以把和阆语相应的地名与梵文、佉卢文、汉文放在一起讨论。

在观众提问环节，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提到，他从80年代以来就是林梅村教授的听众。80年代，他曾与林梅村教授讨论，因为汉文资料中没有任何记载，所以把佉卢文放在公元175年到220年这段时间是“死无对证”的。但反过来，林梅村教授的观点也填补了这段时期的空白。段晴教授所提出的说法也有道理，东汉时期汉势力退出西域，贵霜势力在当地上升，因而将佉卢文放在无汉文史料记载的时期。整体上，西方学者都一边倒地认为，佉卢文的流行是因为贵霜人占领了塔里木盆地。从纯学术角度讲，西方说法缺少史料根据。罗帅提出的文字真空值得思考，但也要经过一段时间验证才知道能否为学界普遍接受。

(撰稿：张欢)

## 53

### 葛兆光、陆建德等：今天我们为什么讨论“何为中国？”

2017年10月18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三期在北京大学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主题为“今天我们为什么讨论‘何为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文

研院特邀访问教授葛兆光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担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建德，文研院访问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波出席论坛并参与讨论。

论坛开始，罗新教授介绍，“何为中国”的题目来自于葛兆光教授所做的研究。葛兆光教授在宗教史、思想史等学术领域引领风潮，同时也是影响很大的历史学家，对后学者影响颇深，使他们开始关心民族、国家等话题。葛兆光教授在“从周边研究中国”的框架下著有一系列著作：《宅兹中国》《想象异域》《何为中国》及《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今天所讨论的主题，也与这些论著密切相关。

葛兆光教授首先发言。一开始，他解释了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何为中国”。自2010年以后，讨论“中国”的论著越来越多，如许宏的《何以中国》、许倬云的《说中国》、王赓武的《更新中国》、刘晓原的《边疆中国》以及李零的《我们的中国》等。葛兆光教授也出版了三本书，推动了这场讨论。讨论中国的论著，使得“中国”这个概念，从本来不是问题变成了问题。他说到，过去人们习以为常地使用“中国”，比如在书写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通史时，学者讨论更多的是何为文学史、哲学史和历史，并不在意为什么它是“中国”的。但是，当“中国”成为问题，有三个现象显题化，使得我们不得不讨论何为中国。这三个显题化的现象分别是中国内部各族的差异、中国和周边各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和国际秩序的关系。

与此同时，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有三个时代特别热衷于讨论“何为中国”，这三个时代分别是北宋、晚清民国以及现在。这三个时代的共同点在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剧烈变动，迫使中国不得不重新界定“我”与“他”。比如，北宋在



葛兆光教授主讲

澶渊之盟后，进入了各国并立的国际秩序。宋朝不再是汉唐那样的天下帝国，而是契丹、高丽、日本、大理、安南以及后来的女真、蒙古环绕的国际中的一国。因此，中国人在这一时代才有“中国”的焦虑，于是讨论何为中国，谁是中国。就连宋朝理学的诞生也与这背景密切相关，《中国论》的出现、“尊王攘夷”的春秋学成为经学重心，“正统”论述背后也包含着这一问题。正是因为这一时期华夷、南北、文武、佛儒、君臣关系发生变化，人们反过来追问，谁是“中国”？凭什么是“中国”？于是，汉族中国的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开始形成。

第二个时代是晚清民国，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和孙中山等人对未来国家的设想，其实就是在争论“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华民族”应该是怎样的？大清帝国的疆域、民族是否还要维持？这一争论在中国面对国族危机的时代不断出现。最后在1943年，有两部著作引人注目，一本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另一本是罗梦册的《中国论》，遥遥回应北宋以来关于“中国”的焦虑，也在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近代世界秩序中构想未来的“中国”。



罗新教授（中）主持评议环节

第三个时代就是现在。现在我们讨论何为中国，很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崛起，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葛兆光教授以车厢比喻世界：原有的国际秩序就像一节车厢，里面站满了各安其位的人，但此时，如果有人突然变胖，要占多人的位置，就会出现矛盾。同样，当国家迅速变化时，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问题，东部和西部、贫穷与富裕、城市和乡村、汉族和非汉族等。但是，面对这些问题必须追溯历史，任何变动都有其历史。2014年葛兆光教授在哈佛大学参加一个名为“Unpacking China（打开中国）”的会议时指出，如果你想打开这个装满谜团的中国箱子，就要先说明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是怎么装进去的。换句话说，就是在谈论现代中国之前，首先要知道中国的历史根源——这是一个历史学者的责任。如果将历史学家比作医生，他会诊断病源，但不会开药方、动手术。所以，我们所讨论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内部问题、周边问题、

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中国？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历史来源是什么？

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和纠纷，都有很长的历史根源。这些棘手的问题，不断地提醒我们，要重新认识“何为中国”——是传统的帝国？还是一个现代的国家？或者是一个文明共同体？这需要涉及五个关键词：疆域、族群、宗教、国家、认同，这五个关键词就是我们关注的核心。

就传统而言，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中心清晰，边缘移动，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讲清楚中国的内外变化，就常常会在历史叙述中形成固定的中心和边缘，往往会关注中心忽略边缘。以云南为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它虽然是汉文化边缘，但曾是吐蕃文化、汉文化和南亚东南亚文化、西南夷文化交汇的中心。曾经的南诏、大理虽然经过明清改土归流融入中国，但它的历史文化还是特殊的，如果依旧秉持旧

有的中国观念，那么，就会丧失所谓边缘区域的丰富性。第三个会出现的问题是，历史学科的学科划分。比如，现在民族史如果以现代中国的边界划分，边界内称民族史，边界外称中外关系史，那么很多问题就很麻烦。如果说明传统中国疆域在不断移动，那么，在某些族群的历史问题上，民族史与中外关系史就不必那么画地为牢。边疆史地这门学科也一样，它在命名时，一些区域、一些族群、一些文化就被归入了“边疆”也就是国家边缘，这里的“边”是相对于“中”而言的，那么，这些边缘在历史上会不会曾经是中心呢？

因此，讨论“何为中国”，不仅涉及对中国的重新认知，也是讨论中国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寻求认同。无论是2011年出版的《宅兹中国》还是今年出版的《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葛兆光教授一直对现代中国热切关注，并从学术立场上，把这种关心放回历史的语境中讨论。

罗新教授补充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讨论“何为中国”成为热点话题，这个现象本身就折射出一种中国的焦虑。这种焦虑本来是非历史学界的焦虑，即现实政治和大众文化的焦虑。但到后来，这种焦虑情绪传染至学术圈内，使得大家言必谈中国。探讨的内容涵盖了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现在的中国的形成路径等等。

罗新教授的领域是民族史研究，很早以前，就曾提出跨国界、突破现代国境、突破中国史和世界史等观点——目的在于规避现有学科框架对于学科自身发展所造成的束缚。而葛兆光教授进行的是思想史研究，回应现实的责任感更强。因此，他

在《何为中国》一书中回应了很多重要的时代话题，包括：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如何转化为今天的世界观；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如何转化为今天现行的国际秩序等。近几年来，外交词汇中出现了“大国”、“小国”等说法，这在西方国家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却成为一种普遍思维。这些语汇的应用，其实来自于传统的天下帝国和朝贡体制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将传统思维中的天下观转化为现在国际秩序下的世界观困难重重。所以，如何从历史角度看待中国以及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现实问题。

随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建德发言。他指出，目前的史学研究面临许多挑战，历史叙事有一个建构的过程。

“中国”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先验的存在，它处于历史生成的过程中。因此现在讲“中国”，一定要强调这个概念的开放性与可塑性，它处在发展变化进程中的。

陆建德研究员随后指出，中国之所以有今天，不仅要强调文化的传承，更要强调文化传承的开放性。中国与周边文化积极互动，并吸纳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若要了解中国这个概念的历史维度，就需要从多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才能观照到它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它才会不断吐故纳新、自我更新。我们的自信应表现在多样性和包容性之中，可以追溯根源，但溯源的同时要防止本位主义倾向，并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波认为，何为中国是一个难以讨论的问题。有



人类学教授提出中国是一个包容各个民族的共同体的观点。对此，陈波教授承认民族包容性，但对是否为共同体持保留意见。对共同体这个概念进行溯源，它原指没有区域和等级差异的原始社区。但如果说它包容各个民族，就会有矛盾。

接下来，陈波副教授分享了自己对《何为中国》一书的心得体会。他认为，《何为中国》中存在两条交错的线索：一条是在历史上寻找他者，另一条是在中国思想史中寻求一般思想、知识和信仰的现代架构。书中还存有两个议题：一是中国和China的关系，二是国别思维。

其一，中国和China的关系。在一般概念中，China等同于中国。但陈波副教授在阅读西方著作时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西方语境下的China，指代不明，令人困惑——不知是指中国的一部分还是整体。在西文中，China所指代的，不一定是国度，也可能是石头、算盘；即便是国度，也不一定是中国，还有可能是菲律宾；即便指的是中国，也不一定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基于此，陈波副教授认为，China一词的功能是去掉中国中心观，把它纳入到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地理体系和世界地理想象。它是中国的对抗性概念，不是等同概念。

其二，国别思维。葛兆光教授所提及的国别思维，回答了去掉中国天下观后，用什么来看世界这个问题。陈波教授所理解的中国是一个杂糅的中国，也是各种文明要素纵横交错的复合体，还是天下共主的关系体——基于“中国”概念之上的一个宇宙观、天下观的体系。陈波教授认为，

解释中国是中国知识界学人的重要责任。目前为止，中国学界的知识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都不足以来解释中国的关系体系，但对于这一领域能产生的成果值得我们期待。

葛兆光教授回应了陆建德研究员和陈波副教授提出的若干问题，包括晚清民初时期学人对中国的理解，以及汉族概念的建构问题。他指出，流动的、被建构的中国，同固化的、现代国家的中国之间存在着矛盾。两难之间，我们必须选择妥善的解释和自己的立场。葛兆光教授在《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中强调了五个存在着内在紧张的论述：第一，中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在空间上有不断移动，因而不能用现代中国领土去倒推历史，将今日所有的族群历史都看成是中国的历史；第二，我们要承认中国自秦汉以来已经形成核心政治文化区域（或者说是汉族中国），拥有一个稳定延续的中国历史；第三，必须承认中国，汉族中国是五方杂糅的；第四，追溯历史，现代中国与中华民族乃是由宋代至清代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过程形成的；第五，由于这种历史原因，中国有现代国家和天下帝国的复杂性，因而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中遇到了种种麻烦。

葛兆光教授最后总结说，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讲清过去这两千多年来的变化，即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杂糅叠加”到“凝固成型”的中国。而现在与未来的中国应当是什么，则是政治家的责任。

（撰稿：张欢）

54

## 王斯福、迈克尔·罗兰等： 时间性与文明



王斯福教授作引言

2017年10月2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时间性与文明”。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担任引言，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担任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舒瑜副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杨清媚副教授，文研院访问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波副教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论坛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罗兰教授首先指出，本次论坛的主题较为宽泛，是他与王斯福教授之前进行的两场讲座的提炼与延伸。罗兰教授表示，在一个长时段的时间框架内对人类社会进行理解和研究非常重要，他自己的研究接近于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理论。不同于布罗代尔强调环境的变化，他更关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并强调将其联系到地理和空间，从更大规模的区域去研究长时段历史。而正是区域中人口、货物以及思想和知识的

流动，联结了整个大陆，因此他更注重流动性和集体性(collectivity)，而不是区域之间的互相孤立。

罗兰教授表示，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入一个象征文化的时期，抽象符号和图画诞生。从法国南部到南俄罗斯之间的一群人的活动遗迹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当今的科学手段已经能够允许我们用电脑技术和大数据来调查长时段的、大区域的文明模式。尤其对于远古DNA鉴定等技术革新了我们对长时段变迁的理解，并证明了原始人之间相互孤立隔绝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得益于这些新数据和新科学，我们必须从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寻求、发展新的合作点。自然科学家虽然掌握技术，但他们不知如何解释通过技术获得的新模式。因此，创造和解释新的模式对未来二十年的人文社科领域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不仅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必然。

然而，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受到概念与范畴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这个概念。“社会”的概念出现在19世纪工业化、城市化的危机和变迁之中。这个

概念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它聚焦于有边界的社会团体，从而有益于促进一个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因此，社会性成为了涂尔干、韦伯通过西方社会理论而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在危险开出的“药方”。

“社会”的概念及其界定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但是，这个概念在面对未来的时候越显现出局限性，不能解释新模式和新变化。我们必须把视角提升到更长的时段和更广的范围，以便发现社会或者社会性的形成过程——而正是这些过程将重新定义“社会”。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角度讲，我们应该关注它们如何塑造长时段过程的不同经验，应该关注人们如何体验、理解、识别这些巨大的过程。对人们来说，这个过程可能是隐形的，甚至是超出掌控的，但是这个隐形的过程常在政治主导的文化工程中被具体化。罗兰教授最后总结到，从一个长时段的视角看来，古代永远存在于现代，而不仅仅只停留于古代本身而已。

王斯福教授指出，他更加关注有生命的时间性，并认为长时段的时间性存在于人们的心灵和生活方式之中。这有异于罗兰教授所关注的大数据以及从中获得的时间性和具体化、精细化的人类历史。在人类学领域中，有关时间的最知名力作非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的《时间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Time*）莫属。该书主要涉及处在日常和季节循环中的时间，比如努尔人如何在不同季节之间往返于不同的地方放牧。而他希望阐述的是一种生活其中的、更长跨度的时间，不止于以日和年为周期。

王斯福教授表示，对于人们来说，同一时间（time）可能同时存在着若干个时间性（temporalities）。他举出三个例子来进行说明。当一个道士进行冥想时，他就回到了时间和宇宙的起点，通过把东南西北的中心汇集于同一个地方，将这个地方同宇宙的其他地方调整（adjust）在一起，并使其具有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长度。由此，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能够供人们生活得更好的地方。如果这个道士要做一个葬礼的仪式，那么他必须通过测算死者八字，在一个长时段的时间周期中来确定葬礼的时间和地点。与此同时，死者的家属会在电话上跟道士确定葬礼时间——这也是道士们赖以生存的、符合商业逻辑的另一种时间。因此，不同类型、不同空间性的时间性在同一时间汇集于道士一个人的身上。

第二个例子则涉及救赎性时间（redemption time），这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关于审判的时间。救赎性时间同时意味着被永远诅咒的可能性和在最终的审判中获得永久救赎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有着自己的生命时间。同时，还有一个根据他们的罪恶和生活方式被救赎的时间可能性，他们在作为造物主、救赎者、审判者的上帝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过着一种“可能的”生活。显然，这与中国的宇宙观完全不同，是不同文明中的不同时间性。

第三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同一个客体会触发几种不同的时间观念。当一个人站在山顶靠近洞穴时，满眼都是石头，他会用理性时间思考这个地方。但同样的石头，对于另一个可能要从这些石头上跳下去自

杀的人来讲，则会以着短暂的、个人的、戏剧化的时间观念来看待。与此同时，这个洞穴对一个隐士来则是秘密而具有精神意义的地方。这三种时间维度完全可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同一个地方对一个人来说既是一个隐逸的时间，也是一个短暂的戏剧，又或是一个地理性的时间。

日常生活中会发生很多偶然，比如，我们将一次偶遇称为事件。对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而言，文化具有一种内在矛盾的结构，某个事件可能恰好引分（Schismogenic），一件小事变成一件大事，并逐渐在结构中演变为毁灭性的爆炸。这个改变时间性的大事件，形成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巨大的改变可能使得救赎性时间演变为进步性（progressive）时间，即作为一个未来导向的世俗性时间。不过，生活在进步性时间中的人，同样生活在长时段的时间性之中，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教徒们仍活在救赎性时间中。这些同时存在的时间性并不必然发生矛盾，最有意思的是研究他们如何生活在其中，以及如何让这些时间性彼此相适应——或者根本不必适应，而只是把它们互相分开而已。

王铭铭教授则从学术史和方法论的角度阐发了“文明”研究的意义。他指出，两位教授都将时间性看作文明的核心内容，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和展开的。罗兰教授是从史学、考古、经验性的外部视角出发，而王斯福教授则是从文明的内部视角对时间观做出体察。

随后，王铭铭教授以两个方面概括了

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其一是将学科史研究作为出发点。对吴文藻先生的创举加以褒奖的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并不知道北京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有傅斯年及陶孟和这两个传统。因此，其在1962—1963年相继发表的文章将社区研究法视为社会人类学中国时代的最重要创新。严格说来，“文明”之所以会出现在我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当中，主要是因为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利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人类学》一书中质疑了这种企图仅用村庄研究（village study）来看待整个中国的方法。1993年，该书被介绍给费孝通，使得费从由马林诺夫斯基所写的《江村经济》序言展开了一系列对社区研究的系统性反思。序言是否为费先生代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反思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江村研究是否能与文明社会的人类学直接挂钩？是否能通过村庄这种小单位看待中国这种大型文明系统？费孝通的反思给我们提供了启示，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思考文明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学者们探索了西方对于“文明”的著述。

王铭铭教授继而谈到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文明的进程》一书，他认为，该书对文明研究的贡献在于清理“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历史，而这两个概念导致了以德国和英法为代表的对现代性的两种理解和处理。“文化”侧重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领域，而“文明”则注重一个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精神差异。埃利亚斯另一个贡献在于提出文明进程的观点，他认为自上而下的文化工程会对地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必须



罗兰教授手持聘书

考察民族志之外的、更宏大的观念形态形成的历史过程。

除了埃利亚斯，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对文明研究的贡献则在于，通过对印度整体文明的研究来提出等级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反观在近代基督教化以后的欧洲，个体主义如何成为一种非社会的现象。

王铭铭教授表示，文明不能简单地被时间性来定义。如果仅按照时间性来思考，那么文明可能又会回到文化的概念——后者仅涉及一个群体对时间观的共享。相较于“文化”而言，“文明”允许我们看到一个文化系统内部的差异和变化。在方法上，我们可以通过纵、横两种模式来把握这种变化：纵向上，从等级或阶级意义来考虑；横向上，则从与外部文明的流动关系层面来考虑。因此，文明概念的提出既要有学科史的思考，也必然要有超越现象学的方法论上的思考。

随后，渠敬东教授发言。他指出，罗兰教授将文明理解为莫斯意义上的、多元交互及不断扩散转移的系统，而王斯福

教授则把文明定义成与日常生活中人的处境相关的时间性，二者都具有启发性。罗兰教授所批评的“社会”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并以吉登斯为代表所提出的概念。吉登斯用“结构”来理解社会，将每一个位点的个人理解成为一个能动者，个人在内化社会结构的时候会将自身与社会的结构匹配起来。吉登斯没有看到的是，西方的救赎性时间在现代意义上变成了所谓的意识哲学（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并经过理性的筹划（project）成为个人行动的准则。目前，西方因无法实现吉登斯意义上结构化遭遇到重大危机，并存在很多断裂，自我意识筹划的线性时间在具体的社会过程中是破碎的，因为它被多重的时间性所分裂。所以，我们目前在日常中看到是碎片化的时间状态。而吉登斯因内在的批评力度不够，没有看到这种破碎的维度。

渠敬东教授继续谈到，西方并不仅是用这种方式想象时间性。比如，弗洛伊德对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梦境进行分析的时候，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发现了一个逆向的、回归起源的时间状态：这个病人的故事里既有他的童年回忆，也有对文明起源的回忆。因此，一个很小的案例呈现的是个人的生活史、家族生活史和西方文明的完整历史，这是一个三者共存的叠合结构。弗洛伊德的解释实际上揭示了王斯福教授所说的多重时间的意涵，而将时间视为多重组合这种理解本身，又将我们导向文明的问题意识。因此，时间性可以被理解为文明本身。

那么作为一种文明，中国的时间性如

何展开？渠敬东教授试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若在法国租房，房东要根据自身及房客的社会地位、未来收入进行评估来约定租金——一系列评估是在一个社区整体的意义上进行的。这就是莫斯所讲的总体社会交换（total exchange system），即任何两个人的交易都是一个社会交易的结果。两个人交易的时间片段，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时间结构。这与纯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所理解的理性筹划的线性时间完全不同，所以，西方对于社会时间的理解也是复杂的。而对于中国的士人来说，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时间的集合体。在入世的方面，士人通过史学的传统和脉络来理解时间和人事，并相信历史的起点在循环的结构里不断重现，也因此以史观的方式想象自己；而在出世（归隐）方面，他们则在山水的系统里完整地想象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故此，士人通过历史和山水在纵、横两个维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这就造就了一种区别于西方透视法的、对世界的动态理解。这个逻辑对理解中国的内在时间性非常重要，这与西方所理解的现代的时间是不同的。

杨清媚教授则提出是否有必要用“文明”取代“文化”的疑问。她表示，费孝通在回应利奇时借助的是“文化”的概念和文化模式的论点。每个社会的文化就像一个蛋糕模子，给每个人提供了对于这个社会共同体最初的情感知识——语言的、血缘的、土地的。但是，这样的文化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并非以均质的形式体现，换句话说，并非每个个体都能体现社会的全貌。因此，费氏对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中进行了松动的处理，他认为，没有任何文化能完整地覆盖社会的边界。费孝通这样表述，不只是为了回应利奇，也是为了回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费孝通在之后又提出了文化的多元一体性，这是一种关于“诸文化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基本接近文明的概念。如果说文明意味着能够容纳不同质、不同政治阶段的社会范围，那么，在这个弹性的、包容性的意义上来讲，费先生所指的“文化”与“文明”在本质上并没有很大差别。而莫斯的文明概念却是有边界的，我们从不同地方借用他们的社会成就来成就自己，也要通过否认这些成就来界定我们自身。那么，这种否认就是承认文明也有自身边界，因此可能不存在那种无边无际、通过关系的接触而无限蔓延的文明。

舒瑜研究员则将探讨了“文明”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可能性。正如埃里克·沃尔夫质疑的，社会科学使用的“社会”、“国家”、“文化”这些概念被想象成为内在同质而外在独立的封闭实体，像台球桌上的台球，碰撞之后就相互分开，似乎彼此之间是缺乏关联。沃尔夫通过世界范围内的人口、物品、技术的流动，展示出人类社会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系统，人类群体处在蜘蛛网一样的关系之中，因此我们很难再把任何既定的文化视为封闭的系统或自我维持的生活方案。但是在看待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的方式当中，我们遭遇了概念缺乏的困境，因此需要一种关于文化形式的新的理论，沃尔夫虽然指出了社会和文化概念的局限性，但实际上并没有找到新的概念来描述人类社会的

开放性和关联性，这就是文明概念被重新提起的原因。

涂尔干和莫斯在 1913 年重写的文明定义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他们指出，社会学往往认为群体生活只能存在于界限清晰的政治有机体当中，因此，国族生活被认为是群体生活的最高形式。这样的社会学因而无法理解一个处于国族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更为广阔且边界模糊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文明，一个具有统一性且存在方式独特的整体。涂尔干与莫斯认为，文明不为某个国家或民族所有，它的存在方式是一种超越国族的形式，构成了不同国家之间共存的道德母题。某些文明的要素（诸如神话传说、技术语言）超越国家的边界，在不同的社会中流动和借鉴，国族的文化都是这个道德母题的特殊形式。涂、莫二人提出的文明概念是没有明确边界的，但实际上文明不可能无远弗届，总是存在一个能够覆盖的范围，甚至不同的文明会有叠加和重合的区域。莫斯用道德母题来界定文明影响的范围——道德母题抵达到哪里，这个文明就延伸到哪里。那么，罗兰教授提到的三种烹饪背后是否存在一套接近莫斯所说的道德母题？且这个道德母题界定了三种不同的文明？

陈波教授则关注将时间性及文明的主题与中国研究结合起来的路径问题。他首先谈到，莫斯礼物与文明这两个研究领域密切相关。莫斯所谈到的总体馈赠和总体呈现体系，是一个长期的、大范围的、跨越多个群体的体系。陈波教授在此试举一例。法国南部的餐馆中，陌生的顾客之间在短时间内围绕葡萄酒的馈赠建立一种社

会关系，这种建立过程涉及复杂的心理、经济等方面的因素。这个例子被列维-斯特劳斯称为“微观总体社会事实”。若按照这个概念提炼出一种研究文明的方法，那么，个体之间的交换并不限于个体——比如皇帝和喇嘛代表的就是不同的群体。莫斯意义上的礼物交换也是群体之间的。除此之外，陈波还表示，中国的文明研究还需要与具体案例结合起来，并兼顾汉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我们应该澄清中国文明是怎样的一个混合体。他认为，可以借助王铭铭教授提出的三圈说来把握这个问题：中心圈通过把农历时间赐予远方的人而获得一种中心性，其农历时间相当清楚，越往外则越模糊。因此我们可看到，从外向内便是从模糊到清晰。但当佛教传入中间圈之后，则冲击了该圈的时间观。因此，我们可以从三圈说的角度理解中国的文明和时间性。

随后，罗兰教授对物质文化的生命哲学进行回应，王斯福教授从文明的中心性和扩展性两个角度推进讨论。王铭铭教授进一步阐释了文明对于讨论欧洲共同体的内在矛盾和批判主权-国家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渠敬东教授则进一步探讨了文明中心的开放性特征及涂尔干和莫斯在法国提出文明概念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涵。

最后，在场学者回应了现场听众关于文明研究中的性别面向、多重时间性是否具有歧义等问题，并一致认为，“时间性与文明”对于当今世界和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是一个仍需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撰稿：苏婉）

## （四）文研汇讲

### 01 李楠：为何中国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国家——基于地理因素与政治整合的考察



李楠教授

2017 年 9 月 13 日，2017 年秋季学期第一次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楠教授发表演讲，主题为：“为何中国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国家——基于地理因素与政治整合的考察”。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张邦炜、邓淑苹、肖瑛、孙圣民，访问学者陈波、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陈志远参与讨论。本次报告中，李楠教授采用历史计量方法，结合历史与当前汉族空间地理分布数据，分别对民族认同与民族融合起到重要影响的地理假说与政治整

合假说进行检验。

在报告中，李楠教授首先介绍了该研究的研究动机。他认为现有经济学文献虽然注意到民族认同、民族融合对经济发展、政治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关于民族认同与民族融合形成等相关研究比较缺乏。接下来，李楠教授分别就现有理论中的地理决定论与政治整合决定论两个主要假说进行分析。关于地理因素，李楠教授认为尽管现有研究文献无论经济学，亦或语言学，均从地理因素进行解释民族融合与民族认同问题。地理因素虽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地理因素却无法解释同一地区在

不同时间点的民族空间分布动态变化问题。因此，政治整合假说更加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尽管很早就有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强调地区间政治关联对地区间民族意识以及文化差异有的影响，而且会出现较强的政治关联缩小地区间的差异性，但截至目前依然缺乏政治整合对民族认同与民族融合的实证证据。

接下来李楠教授首先提出本文要考察的假说。假说一认为由于汉族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因此地理环境成为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制约因素。如果一个地区地理环境越适合农耕，该地区拥有越高的汉族人口比例。假说二认为汉族不仅是最先建立统一封建王朝的民族，也是历史上多数统一王朝的建立者。李楠教授认为通过设置郡县等措施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管理，从而不仅促进了汉族人口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因此，如果一个地区设置郡县时间越久或纳入历史上大一统国家累计时间越长，该地区拥有越高的汉族人口比例。假说三认为尽管适合农耕的地理环境对汉族人口分布起重要作用，但是政治整合更加重要，政治整合可以通过提供公共物品等削弱因地理环境对汉族人口空间地理分布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为检验以上假说，李楠教授分别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汉族人口分布信息以及中国汉语方言地图集中汉语空间地理分布信息作为民族认同和民族融合的代理变量；此外，分别采用农耕适宜度和各地设置郡县累计时间作为地理因素和政治整合的代理变量。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最终发现地理环境和政治整合都对汉族当

前分布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农耕适宜度每增加一个等级，汉族人口比重上升0.3%；而设县累计时间每增加1%，汉族人口比重分别上升0.6%。而且政治整合与地理环境相比，对汉族空间地理分布影响更加重要，政治整合会削弱地理环境对汉族空间分布产生的不利影响。设县时间每增加1%，地理环境对汉族人口空间地理分布边际影响下降0.2%左右。

最后，李楠教授又对为什么作为政治整合的郡县制会对民族认同与民族融合产生促进作用进行进一步解释。李楠教授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重要机制：一是郡县设置有助于边疆移民，通过征召和强制等移民措施使汉族可以在边疆地区定居，进而削弱了因地理因素等造成的移民成本。二是郡县设置有助于水利建设等公共物品提供。汉族是以农耕作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因此为保证基本农业生产活动，水利设施的提供与兴修十分必要。而郡县设置可以通过水利设施等公共品的提供，促进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进而促进汉族人口迁移与民族融合。三是郡县设置有助于儒家文化的传播与教化。特别是在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开创和完善，历代政府在地方设立掌管儒学教育的官学机构。这不仅有利于人才培养与选拔，儒家思想与汉文化也增强了民族认同与民族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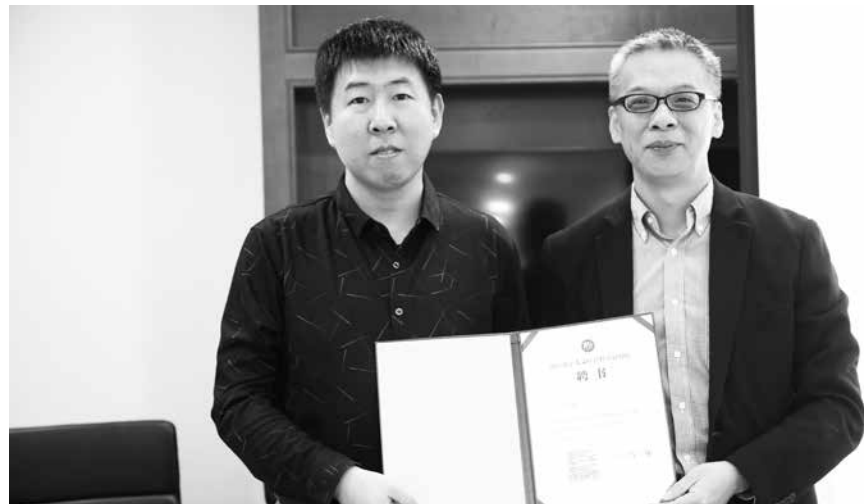
在报告之后，各位与会学者分别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就报告的内容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与看法，并对研究选题、数据使用以及研究方法等展开了激烈而丰富的讨论。

（撰稿：李楠）

## 02

陈志远：

### 从佛诞年代推算看中古佛教经院主义学术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陈志远老师（左）颁发聘书

2017年9月27日，文研院秋季学期第二次邀请学者报告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发表演讲，主题为“从佛诞年代推算看中古佛教经院主义学术”。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李楠、肖瑛、孙圣民，访问学者陈波、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中古史中心副主任史睿参与讨论。本次报告中，陈志远老师利用佛教和外典文献，分析了中古时期知识精英将印度佛诞年代与华夏王统纪年相配合的方式，讨论其立论依据，进而了解知识背

后的宗教诉求。

陈志远老师首先介绍了佛教时间观的学术意义。他指出塑造时间感的行为在各个文明中广泛存在。对一年之内农事活动和节庆的规定，即所谓“年中行事”，成就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以年为单位的时间跨度，体现了人们对历史走向的把握和对自身历史处境的认识。在佛教语境中，信徒们按照历史循环论甚至衰退论的时间观念，安排并划分释迦牟尼佛灭度直至弥勒佛降生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此，释迦牟尼佛的生灭年代就成为重要问题。近代以来，学者们试图收集不同语种的史料

以确定佛灭年代，陈志远老师的努力也在于此，他侧重考察汉传佛教在中古时期对这一问题的解释。

在中古时期，佛诞年代存在两大系统。一是认为佛诞生于周庄王十年，其立说依据在于《太子瑞应本起经》，其中把“佛诞日四月初八大放光明”比附到《春秋》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见，夜明”的天象异相。这一学说最早见于五世纪中前期的刘宋时代，梁朝沈约对其技术缺陷提出疑问：周代用何建正，四月辛卯是否为八日。释道安在《二教论》中对这一挑战进行了正面回答，随后隋代的经录编撰者费长房也支持他，二者援引了更多的佛教经典来论证它的合理性。

另一系学说则主张佛诞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或前后数年，较之前说提早了数百年。佛诞年代的提前为其在佛道相争中赢得更高的权威，但细致梳理相关文献却发现，其最早成说年代在北齐末年，此后又在道宣、法琳的作品中进一步解释。持该说者大多出自北齐，北齐初年魏收撰《魏书·释老志》尚持庄王十年佛诞说，到了北齐末年已采用新说，可见二者之更替。从论证方式来看，新说不再援引儒家正经，而直接炮制伪书《周书异记》，避开了经典解释的技术困难，这一点对比于释道安引用《庄王别传》来辅助《春秋》的解释方式即可见一斑。这一学说在具体结论时虽前后相差数年，但似乎已使用由干支推算纪年的方法。在法琳晚期的作品《法琳别传》中，他篡改了《文殊师利般若涅槃经》的年代，进一步将庄王十年佛诞说包摄在新说之中，使之成为唐宋以降广为接受的

说法。

陈志远老师最后对本研究的意义做了推展，他认为费长房等人的工作实际上是编纂世界史的初步尝试。当两个文明相遇时，如何将彼此的历史记忆安排在同一张通代年表里，这是相互理解的需要。在中国与印度历史遭遇时，中国拥有发达的史官传统，而印度的历史意识相对淡薄，使得中古时期汉地的知识精英在世界史的构建中处于更积极、更有创造性的地位。这点涉及到我们对知识史的理解，一方面要看到客观知识背后存在着政教主张、伦理道德甚至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不宜轻视知识形成与传播的相对独立性，它需要借用当时人共同认可的学术范式，以精致的说服方式取信于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变动是相对惰性的。

主题报告之后，各位学者围绕着知识史的研究方法与前景、实证史学的限度与标准、南北朝佛教知识的变化、中古三教论争的时代氛围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陈志远老师指出，佛教经典中对佛灭后历史状况的描述也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四至六世纪之间，产生了对佛灭后若干年教团状况的描述，以及佛教正法、像法、末法三时说。它们与精确计算佛诞年代的讨论是相对独立的，二者的遭遇引发了新的教理阐释，净土教、三阶教等隋唐新兴宗派便是以末法时代为前提，对传统修行方法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转而鼓吹更为简捷激进的修行实践。

（撰稿：陈志远）

### 03

## 张邦炜：钱穆论著中的一些疑问 ——从宋代“平民社会”论说起



院长邓小南为张邦炜教授（右）颁发聘书

2017年10月10日，文研院秋季学期第三期邀请学者报告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邦炜发表演讲，主题为“钱穆论著中的一些疑问——从宋代‘平民社会’论说起”。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肖瑛、孙圣民，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唐雯参与讨论。张邦炜教授围绕宋代“平民社会”论与“丞相副皇帝”说的部分内容展开分析，并援引历史文献及其他相关历史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了钱

穆存在的疑问以及历史研究的几个要点。

报告中，张邦炜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并以亲身经历讲述量化史的史学应用、问题意识在不同时期的体现和发展。随后，他自述了学习钱穆理论的经验与体会，并由此引出对宋代“平民社会”论的思考。他指出，根据钱穆《理学与艺术》一书中“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等表述便提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社会”，这种论断是失度、过度的，不完全符合钱穆的原意。钱穆曾提及“平民社会”从秦以下已经开始，宋代并非“第一个”。

为此，需要解决“平民社会”的定义问题，并明确平民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差异。张邦炜教授指出，钱著没有对“平民社会”进行明确定义，但不难根据众多论述总结出一些基本特征。钱穆所说的“平民社会”主要指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封建贵族、无特权阶级、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又称“平铺社会”。但钱穆更常使用以士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或“士人社会”的概念，即已承认了社会内部等差的存在，与“平民社会”一说自相矛盾。“平民社会”论中“无特殊势力”的基本定义，也和秦以后门阀世族这一特权阶层长期存在的史实相悖；即使是西汉与唐宋两个“无定型时期”，诸侯王、士大夫等特殊势力同样存在。其中，宋代的平民化趋势相对明显，有着可观的研究空间。张邦炜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特殊势力一直存在，与“平民社会”相比，强调社会不平等性的“权力社会”一说更准确恰当。

钱穆与钱著在史学领域影响很大，读者也涵盖了专业学者与普通学生，其观点常被广泛认可。对于宋代所属的历史分期，钱穆曾提出“后代”、“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概念，其中的讨论热点便是“近代”概念。钱穆认为，宋代是近代的开端，而“近代”的三个基本特征分别是科举制度、中央集权和门阀消灭。张邦炜教授则认为，中央集权并非自宋代始，若将此视为近代化的标志之一，会使同样实行中央集权的秦代也成为了“近代国家”。同时，钱穆的宋代“衰世”说也与“宋代近代”论下的“盛世”说存在相悖之处，“什么是近代”的问题亟待解答。

接下来，张邦炜教授围绕“丞相副天子”说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宰相是“副皇帝”还是“皇帝的副官”。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钱穆提出了“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专制黑暗”是晚清革命派为推翻满清政府进行的宣传。为此，钱穆提出了两点依据：一是皇帝副宰相，宰相是“副天子”，但同时也认为宰相是皇帝的管家和副官；二是将“君主专制”等西方名词强行引入中国历史不符合中国国情，外来概念与本土历史实际存在出入。张邦炜教授则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表述与“朕即国家”联系起来，对钱著观点表示了质疑。

在中国古代“重法”还是“重人”的问题上，张邦炜教授认为，钱穆“中国传统政治缺陷在于重法不重人”的论点不妥，但对“皇帝制定法律”的说法表示赞同。此外，钱著中“汉、唐时代已实现‘民主精神之文治政府，经济平等之自由社会’”、“宋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门阀世族、形同一盘散沙”等观点也需要我们的审视和质疑。最后，张邦炜教授再次提到了历史研究中量化史学的潮流。他认为，引入并应用统计学的关键在于“怎么算”，不在于“该不该算”。他以宋代耕地面积等数据为例，指出历史工作者需要避免因使用历史文献中的不可靠数字而生成不可靠统计结果的现象。

主题报告后，与会学者从自身的学科角度出发，就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统计工具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而丰富的讨论。讨论环节中，张邦炜教授再次强调了正确看待和使用统计工具的必要性，并就“历

史不能也许”和“历史需要想象”这两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历史可以想象，但不能狂想；历史可以也许，但不能胡乱假设。历史应当坚持“人文学科”的定位

和发展方向。

（撰稿：陈洁樱）

## 04

### 邓淑苹：何以“万国玉帛” ——探龙山、二里头时期玉文化的形成与意义



2017年10月17日，文研院秋季学期第四次邀请学者报告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研究员以“何以‘万国玉帛’——探龙山、二里头时期玉文化的形成与意义”为主题展开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张邦炜、李楠、肖瑛、孙圣民，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唐雯出席并参与讨论。

邓淑苹研究员首先指出，《左传·襄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在夏代开国之时有许多政体与“夏”共存，也说明当时领袖会盟时都要执拿“玉帛”。《国语·楚语（下）》记载观射父对楚昭王解说祭祀用贡品时强调“玉帛”为“二精”，由此可知“玉”和“帛”二种会发光泽的物质组成的“玉帛”，是古人用以祭祀

与会盟的“信物”。

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测夏王朝约公元前2070至1600年，那么传说中的“夏禹”应是公元前21世纪的政治人物（或政治实体领袖的称号）。为什么当时华夏大地有非常多的政体，其领袖多相信“玉帛”具有沟通人神的法力，可作为人际与人神间的信物呢？这个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考古资料可知，在今日中国版图上，玉器文化的萌芽约始于公元前六、七千年，比传说中的“夏禹时代”早了四、五千年。最初，“玉”是人们在打磨石料制作器用过程中的一种坚韧、可磨出光泽的美石，人们只用它来制作工具或饰物；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这种没有生命、既硬又冷的矿物，赢得多数先民的认同，被视为具有“法力”的通神物质。那么在公元前二千年的“夏禹时代”，先民又用美玉制作什么样的器物来代



院长邓小南为邓淑苹研究员(右)颁发聘书

表身份来沟通人神呢?

由此,邓淑苹研究员在本次报告中以时间为线索,将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长约五千余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以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300年为界,探讨先民从“制玉为器”到“以玉为礼”的发展经过。

第一阶段(公元前7000-3500年?),玉器逐渐成为身份表征。从陕西龙岗寺仰韶文化早期墓葬资料可知,玉石质工具武器的尺寸与精致度,已是社会地位较高者身份的象征。从兴隆洼文化等墓葬资料可来看耳饰块可能具有象征身份的意义。

第二阶段(公元前3500-2300年),玉器除作为身份象征外,更发展有复杂的通神功能。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是一条自东北向西南的山脉链,将华夏大地分隔为低平湿润的华东地区与高亢干冷的华西地区。或因生态差异,不同地区的先民发

展出不同的宗教思维,并制作出不同的祭器。

华东先民或相信动物有灵,雕琢大量以动物为主题的玉雕,用作宗教人物(巫觋)的行头。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南方巢湖-太湖流域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都出现极富神秘气息的动物主题玉雕。以上二区均出现了从耳饰块发展的“胚胎形玉雕”、写实或式样化的玉龟壳以及以一双大眼为核心的动物面纹等。同时,由于这两个区域并不接壤,共享的“动物精灵崇拜”信仰可能是经由社会菁英上层交流网落传播的。

在这期间,华西先民则开始出现蕴含“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圆璧与方琮。萌芽期的方琮多为中央有大圆孔的厚方块或方筒,有的还在其上下孔缘磨出短射口。但无论制作精粗,边璧必平直,以成就“方形”器身。齐家文化早期墓葬中已出现成组璧琮掩埋现象,应是“同类感通哲理”在考古学上的例证。

黄河上中游的宇宙观与感通哲理可能也通过上层交流网传播至长江下游,并促动良渚文化产生内部质变。这场变革使得“龙首纹”玉器消失,原本只在四角雕“兽面纹”的方圆形玉镯突然变高、变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琮”;更可刻上“鸟立祭坛”等符号,与圆璧构成成组礼器。

第三阶段(公元前2300-1500年),“万国玉帛”的辉煌场景形成。或因气候巨变等因素,龙山时期战争、迁徙频仍。红山、凌家滩、良渚文化等均先后消亡;齐家文化接续了仰韶、庙底沟文化中以玉器象征身份、沟通神祇的传统,在第二阶段末期迅速窜起,更在第三期以等量的圆璧方琮成坑掩埋。

陕北石峁文化盛行墨玉牙璋、长刀与玉戈;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与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则流行神祖面纹,分别以嵌饰、佩饰器、有刃器为神祖面纹的载体。经分析,这种神祖像是将远古陶器、玉器上的圆眼、獠牙、“介”字形冠、鸟翼等组合而成。

位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则呈现“海纳百

川”的态势。牙璋、长刀、玉戈来自华西石峁传统;神祖面嵌饰器发展的“柄形器”,以及由“介”字形冠发展的“华东式扉牙”则来自华东传统。此时,或属夏王朝重要都邑的二里头,则是“万国玉帛”场景里最具潜力的政体。

报告结束之后,邓淑苹研究员与在座的邀请学者展开交流。对于如何处理考古发现与相应历史脉络的互动关系的问题,邓淑苹研究员表示不倾向于根据考古发现去证明先验基础,而是更愿意在新考古材料基本公开的前提下,从现有材料出发来归纳历史观结论。对于作为后阶段华西系统玉器代表之一的璧是否由东北环璧文化圈传入的问题,邓淑苹研究员指出,考古学界历来认为,华东地区的发掘投入力度远高于华西地区。财力不足加之频繁的盗掘现象导致了华西地区出土玉器的贫乏,但并不能因此就推断当地玉器一定为外来品。

(撰稿:邓淑苹)

## 05

### 肖瑛:家国关系论述的中希之别

2017年10月24日,文研院秋季学期第五次邀请学者报告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以“家国关系论

述的中希之别”为主题展开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张邦炜、邓淑苹、孙圣民、李楠,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



唐雯参与讨论。

肖瑛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报告的选题缘起：一，推进公共性研究时，家、国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核心主题；二，家和国在一定意义上是个人安身立命的两个最为关键的处所；三，不同文化和制度对家、国各自的性质以及其间关系的界定，涉及到该文化和制度的社会组织逻辑，并进一步关涉这些文化和制度赖以以为基的人性假设。

有鉴于此，肖瑛教授以近年来学者们从礼制角度对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的扩展性论述作为研究起点，以柏拉图的《法律篇》以及儒家早期经典《孟子》《礼记》作为主要分析文本，讨论中希经典思想中对血缘的亲疏远近本性的不同处理路径，并进一步分析它们对各自思想中关于家和国的性质、功能以及家国关系的影响。

与《理想国》众所周知的敌视家庭，视家庭与城邦关系势如水火不同的是，在《法律篇》中，“家庭”构成城邦公民立法的基本单位，个人首先是家庭成员其次才是城邦公民。维护血缘关系是家庭立法的首要原则，一方面通过婚姻立法和遗产继承立法保护家庭中父亲的血脉延续，另一方面确定血缘上的亲疏远近是家庭权力和权利分配的基本规则。柏拉图的家庭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保护了家庭的独立性，彰显了血缘纽带及其内在的友爱在家庭构成和维系中的本体性地位。但是，家庭对于城邦并不具有绝对的独立性，相反，只有以城邦为背景，我们才能理解柏拉图对家庭地位的想象。

在柏拉图看来，家庭虽然有自己的独



肖瑛教授

特性，但同城邦在目标、统治方式上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家长制的，后者应该是贤人统治；前者以私利为目标，后者则是为了公共善。家庭对于城邦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它是城邦目标的实现工具。总之，家庭和城邦是一对矛盾体，既彼此依存，又始终处在冲突中。柏拉图的努力，就是消除家庭对城邦的各种反动，使之成为城邦目标自我实现的工具，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家庭的自然情感逻辑，并力图将之净化后带入到城邦之中以推进城邦的善。

柏拉图对家邦关系的如上界定，根源在于他的“双重自然”的人性预设，即灵魂与肉身的分离，以及灵魂中理性与情欲的对立。灵魂与肉身之间、理性与情欲之间，隐含着灵魂比肉身高尚与理性比情欲高尚的前提。前二者通往德性，是神性的自然；后二者通往邪恶，是人性的自然。人的二分和人之灵魂的二分表现为家和理想城邦的二分：家庭表征的是肉体 and 情欲，理想城邦表征的则是必要情欲和理性。个人灵魂的状况表征了家庭和城邦的状况。但是，情欲和肉体特别是“必要情欲”并非没有

价值，身体不朽也是普通人的神圣事业，所以，家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儒家经典对人性的假设也具有“双重自然”的味道，即《孟子》中的“不忍人之心”与“爱有差等”。“不忍人之心”指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相互关心、帮助和谦让，是“仁义礼智”四端的来源；“爱有差等”则指血缘关系中内在的亲疏远近的情感，是人伦秩序的基础。当然，与柏拉图的“双重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不同，《孟子》所表达的这两种自然人性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仅凭依于“爱有差等”的血缘情感，那很可能出现的是有家无国的局面；反过来，若无“人伦”的自觉牵引，人难以成其为人，“不忍人之心”也难以彰显。因此，在孟子的言说中，暗含着两种人性相结合的主张，基于“爱有差等”，建立起“伦”的社会秩序；基于“不忍人之心”，人能够把亲亲和尊尊的逻辑不断向外推扩。“大同”就是这两种人性有效结合的产物。

与柏拉图把亲疏远近的自然情感限制于家之内、家和邦依照不同的自然人性来确定目标和治理原则不同，儒家传统突出了“爱有差等”的普遍合理性及其道德价值，为差序格局的礼制结构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从正心诚意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的组织和治理逻辑。

肖瑛教授最后提出，中希之间的比较会涉及非常多的因素，他的研究仅仅讨论了一个问题，即不同的人性预设对思想和制度建构的基础性作用，而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些预设的后续变化及其在思想上的扩张和转换机制，更没有讨论这些思想脉络同民情和制度的相互建构逻辑。而且，面

对复杂的历史，我们很难基于这种比较对两种不同预设及其不同后果做出孰优孰劣的评价。

但不可否认的是，第一，这两种预设及其思想和制度建设都重视源于血缘的自然情感所内含的“友爱”对于家庭乃至国家（城邦）的重要价值；第二，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情反思和家国关系重构方面遭遇的困境，应该同这两种传统的余脉在中国背景下的相遇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报告之后，肖瑛教授与其他邀访学者展开交流。就中方孔孟学者的儒家思想与希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否有可比性，以及中希方对家国概念存在巨大差距的根源性等问题，肖瑛教授表示，任何思想只要对后世产生现实影响就可以拿来比较，而这个影响的根源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内容，即儒家与柏拉图思想中不同的“双重自然”人性预设。自然人性不同，对家国的概念与设计就不同，人性预设带来的制度不同，其影响就不同。此外，肖瑛教授还就“自私的基因”是否存在、《资治通鉴》对于家国关系研究的作用等问题同与会学者交换意见与看法。

（撰稿：肖瑛）



## 06

唐雯：  
从新出元载墓志看德宗的太子地位

2017年10月31日，文研院秋季学期第六次邀请学者报告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唐雯研究员以“从新出元载墓志看德宗的太子地位”为主题展开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孙圣民、肖瑛，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参与讨论。

陈寅恪先生曾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唐代皇太子地位不稳固，多数情况下无法顺利即位。唐雯研究员从这一论点出发，对德宗的储君地位作了初步的考察。她认为，虽然陈寅恪先生已经提出此命题，但在一般印象中，德宗仍旧是唐代极少数以皇长子身份立为太子并顺利即位的皇帝。所以在后来，几乎没有学者继续关注，但最近新出的元载墓志却将这一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该墓志是德宗即位后不久撰写的，背景为元载恢复官职并改葬，而墓志里特别提到其功绩之一便是“立定禁中之策”、“不摇天下之本”，也就是保护了德宗的太子地位。这与早先所出的严厚本墓志遥相呼应，在严厚本墓志中，早已定性为奸臣的元载竟然在死后三十年因曾经保护过德宗而被溢为忠。由此，唐雯研究员表示，德宗储位稳固与否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首先，她运用《通鉴》引《建中实录》

和《旧唐书·赵涓传》这两段材料说明代宗对于德宗的不信任——这也奠定了德宗太子生涯的主基调。接着，唐雯研究员向大家展示了《册府元龟》中所载宝应二年五月，群臣上表请立太子，最终被代宗拒绝的一条材料。通过这条材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代宗并不愿意立德宗为太子。之后，代宗又将德宗图形凌烟阁并赐铁券，而这些都强调了德宗的臣子身份。

约同时期，宰相刘晏多次上表要求自己的女婿潘炎辞去元帅判官一职（元帅判官是时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德宗的属官）。刘晏上表措辞中的惶恐之态表明他意识到了代宗对立太子一事的犹豫，并有意让自己的家族与德宗进行切割。最后，在吐蕃入侵、代宗东奔的背景下，德宗终被立为太子。唐雯研究员认为，德宗之立，与其说出于代宗的本心，不如说成于以元载为代表的群臣的拥立。

那么，代宗究竟为何不愿意立德宗为太子？对此，唐雯研究员表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有自己所中意的人选，那就是他的次子郑王邕。唐雯研究员结合近年出土的郑王邕墓志和传世文献中的一些资料，勾勒出了郑王的人生轨迹。

和他差不多年纪的皇子要在他死后才有机会遥领方镇，在此背景下，郑王先是被任命为平卢淄青节度大使，后又被任命为极其敏感的天下兵马大元帅。而自从肃

宗以该职平乱即位之后，这一职衔始终与皇位继承密切相关。在德宗被立为太子后，随即解除了这一职衔。郭子仪屡次上表要求恢复他的元帅头衔，但始终没有成功，反而是郑王被代宗置于这个极其敏感的位置上，这也表明了代宗对于郑王特别的重视。不过，这似乎并不是郑王势力膨胀的终点，郑王墓志在记其加天下兵马元帅之后谓有“内自禁旅，外周卫服”（禁旅指的是禁军）。唐雯研究员由此认为，郑王应该曾经涉足过禁军事务。

随后，唐雯研究员探讨了代宗、德宗两朝禁军领导层的变化。自李辅国以肃宗亲信宦官的身份掌握禁军，到后来的程元振、鱼朝恩，禁军的领导权一直都掌握在宦官手里。但是，在大历五年鱼朝恩被杀之后，内官不再领禁军，取而代之的是军官出身的王驾鹤。所以，在那之后的近十年中，北衙禁军似乎又回到了唐代前期武将掌兵的状态，宦官与皇权之间的桥梁似乎就此消失。唐雯研究员表示，这一时期可能由郑王取代了宦官成为了禁军与皇权之间的桥梁。而另一方面，从德宗继位后对禁军事务处置失当的表现来看，还是太子时的他并没有处理禁军事务的经验。在这之后，郑王似乎还有过遥领节镇的经历。不过，这一切都在大历八年郑王去世后终于归于平静。对此，唐雯研究员认为事有蹊跷。墓志称他在内第去世，之后被权厝在内侍省。但无论他是生前住在十王宅还是禁中，尸体都不应该出现在内外朝之间的



唐雯研究员

内侍省。此外，哀册文中并没有记录他去世的地点——而这本是哀册文开篇必然会记述的内容。

郑王死后，群臣又有推立韩王的动议，但从代宗直接废除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的举动来看，他似乎无意立韩王为太子。之后，代宗又将郑王的儿子舒王谊托付给德宗，以致德宗朝围绕着舒王谊又掀起了一场动摇太子的风波。唐雯研究员表示，代宗命德宗收养舒王谊的举动本身就有政治交换的意味在里面，而德宗将这种托付内化为了自己的意志。

唐雯研究员的报告以德宗为个案，再一次印证了陈寅恪先生关于唐代太子地位不稳固的理论，同时也提出了政治史研究中预先设定的理性人是否符合历史真实的问题。

主题报告后，与会学者分别从自身学科的角度就报告的内容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与看法，同时，围绕着政治史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理性预设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撰稿：唐雯）

## （五）文研读书

### 02

### 中西古代统治：制度与观念——马克垚教授著作研讨会



现场气氛热烈

2017年10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西古代统治：制度与观念——马克垚教授著作研讨会”，此次会议主要围绕马克垚教授的新作《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展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垚作引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阎步克教授、彭小瑜教授、黄春高教授、叶炜副教授、李隆国副教授、张新刚助理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耕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方诚峰副教授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开始，李猛教授首先介绍了与会嘉宾和研讨会的主要内容。马克垚教授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资深学者，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制度、思想、社会提供了一种典范，其新作《古代专制制度考察》所探讨的专制制度问题，不论是对研究西方政治思想，还是反思中国历史传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克垚教授随后在引言中介绍了本书的写作背景。在六十余年的世界中古史研究中，他在偏重社会经济问题的同时，逐渐也涉及到了法律政治问题。本书就是对这种法律政治问题进行探讨，马克垚教授

在写作过程中逐步产生了四点想法。

首先，通常的观念认为，相对于世界中古史上的西欧命题“王在法下”，中国的传统观念是“王在法上”。而马克垚教授认为，中国也存在“法大于王”的思想和观念，比如皇权受到先王之法、自己制定的法律、礼等规范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其次，如果认为皇权受到了限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国所谓的专制呢？马克垚教授曾经认为，受到官僚制度、法律限制的中国皇权不能算是一种专制制度。对于这一观点，祝总斌教授认为并不成立，比如官僚制度发达的明代，皇帝依照廷杖制度可以直接将大臣杖毙，因此并不能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专制制度。

再次，如果不能否认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释这种有限专制的现象？马克垚教授在东方学的研究中找到了解决此问题的灵感。他考察了民主与专制二分思想的来源，即西方认为专制是东方文明的专属，而希腊等文明国家则是民主的发源地。若跳出这个二分法所对应的地域边界，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在非东方世界的罗马、俄国（半亚洲式的）、英国、法国、两河流域都发展出了有限的专制制度——这一观点构成了《古代专制制度考察》的主要内容。

最后，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马克垚教授也产生了两点疑惑。第一点在于民主专制的二分法本身就是西方的观念，在著作中使用这一观念来讨论各个地区的文明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能够用专制制度进行客观指代？第二点在于制度的客观性与运作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二者很难分清楚。若从史料来考察，所谓专制制度下的

大多数皇帝其实都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在运作上无法实现完全的专制。马克垚教授认为以上两点是本书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希望在本次研讨会上听取其他学者的意见与批评，得以吸收改进。

李猛教授认为，这本书既体现了世界史的内容，又体现了对中国史的观照。讲座的上半场，他首先邀请了研究世界史和中国史的老师对本书进行总体评价。

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步克教授结合自己研究中国制度史的经验进行了评论。首先，他认为该著作在知识上对研究者很有启发，许多论点都富有新意，并希望马克垚教授能够进一步将论述拓展到古埃及、拜占庭等古国。其次，阎步克教授认为自己的研究主要从政府类型等政治学视角出发，而马克垚教授的著作则以东方主义这样一个文化视角切入，且这本著作并没有出现为了抗衡东方主义而出现的西方主义思维。再次，阎步克教授认为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视角，带有价值判断，没有对政体进行客观实证研究，而中国人习惯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合起来。对专制进行实证研究，就是观察政权集权程度的高低，因此不同的定义会生发不同的观察角度，对专制的理解也就不尽相同。

此外，阎步克教授认为研究历史要有连续的视角，即与现代进行对比。中国古今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中西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在客观上表明了东西方主义视角依然很有价值。历史上中国诸多显赫的帝国与帝王与当下东方文明所存在的各种现象都表明东方专制主义并非完全虚构。更进一步说，专制制度的好坏是一个相当复

杂的问题，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都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在历史上，人们最关心的是温饱问题，其次是秩序和正义。专制君主制与贵族制、部落制孰优孰劣，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前者同样留下了盛世和灿烂的文明。因此马克垚教授反对一味贬低专制制度是无可非议的。

阎步克教授还认为，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制度发展是社会自然进化的结果，并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一些威权主义的拉美国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一些民主化的国家反而陷入了衰败的境遇。对于中国来说，历史上深厚的集权主义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形塑了当下对制度的选择，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国人对制度的自信与日俱增，未来很有可能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形成强大的集权体制。在此背景下，从历史的连续性出发去理解历史上的专制体制会有不同的答案。

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也从事中国史研究。他认为马克垚教授的著作破除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学术建构，将罗马、英国、法国等国历史纳入专制政体的分析框架中是一个突出的贡献；其次，他认为著作中所提到专制与君主制之间的差异，以及两种制度下的军事、法律、财政间的差异为何，仍有待探讨；再次，如果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学术话语未必客观普遍，那么同样出自西方学术的政体分类学同样值得怀疑，能否建立中国自己的政体论同样是值得探索的话题；另外，用专制来指代中国古代时期的历史其实容易形成理解上的障碍，消解了历史连续性，而改用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来描述似乎更加清晰；最后，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本书所揭示的专制主义的普遍性意味着历史中有很多不变的存在，如果我们希望进行一种新的制度创造，还需要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能简单贬低敌视。

随后，北京大学历史系彭小瑜教授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当前的研究发表了看法。首先，他认为中国历史往往以故事的方式呈现，而且集中于中央层面，中间与地方治理的内容则在史料中比较缺失，所以他最后选择从事世界史的研究，也是希望从制度方面有所借鉴；其次，如果能够抛开整体的制度研究社会治理，则会有很多突破性的发现，比如在专制制度背景下去考察实际的社会治理的利弊，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等等。再次，他认为评价制度也不能简单化，需要回到当时历史背景下，回到老百姓的幸福中，当前教科书中对历史事件、历史制度的评价其实是有失客观的。最后，他认为从事制度研究不能大而化之，需要有更多细节的材料作为支撑。比如新近的研究就发现君主集权的埃及、波斯等古代帝国存在大量的社会自治和地方自主性迹象，用集权或者专制的话语来描述往往成为一种不适当的标签，过度概念化障碍了对历史的认识，所以还需要学者做进一步的专门化研究。

北大历史系黄春高教授从学术和文本两个方面评价了这本著作的意义。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以往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在讨论专制主义时都是在谈东方的国家和文明，西方人看待自己的传统都认为是民主的。而本书则将专制看作东西方都存在过的政体，这在学术史意义上是一大贡献；

此外，一般意义上对专制主义的讨论是带有情感色彩的，比如西方学者对英国、法国的集体主义制度多带有赞同意味，而马克垚教授的著作则进行了去感情化的处理，研究了希腊、罗马等西方历史中的专制传统，这也是学术史上的贡献。其次，是从文本本身引出对专制主义的道德判断问题。虽然政治学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就有政治与道德分离，但现在依然认为政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西方往往会带着价值判断的眼光看待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可是历史中的大多数制度在当时都是具有合法性和道德支持的，因此从历史角度，可以看到更加中立的专制主义政体。

李猛教授随后进行了回应，首先他认为马克垚教授的著作尝试着把“专制”这一政治批评概念转换为历史分析概念，并起到去污名化的效果。传统的政体分析是在希腊城邦历史环境下进行的，有大量的政治现象既不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框架之中，也不在现有的民主分析框架里。专制这一概念不被认为是一种政体，而这本著作却将其作为政体进行尝试。从历史来看，其实存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运作受限制的现象，也存在不绝对的制度运行中权力使用的独裁情形。其次，这本著作对专制制度的定义包括了军队、司法和税收等方面，但问题在于专制政体与其他如奴隶制、君主制政体在这三个方面有何区别。早期的专制主义是封建派用来攻击君主制的，因此专制制度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确。

讲座的下半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叶炜首先进行了评论，他主要谈这本著作对他的启发。首先，马克垚教授出于学



马克垚教授

术自觉打破了传统东方主义的视角，从具体的地区来研究世界各国的制度历史，这种方法值得借鉴。其次，在世界史的研究中要注重存异求同，中日这样相近的文明求同容易，所以关键在于求异；而在各种差异极大的文明之间，更重要的是求同，这种研究侧重值得效仿。最后，叶炜副教授也提到从著作中引申出来的问题，即不同地区的专制政体是否有发展程度的区别，不同类型的专制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专制政体对不同地区发展有何种影响。

作为马克垚教授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李隆国副教授首先对该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贺，这是非常重要的成果，而且为世界史学科的后学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道路。其次，他也向中国史的同行人表示感谢，因为对于研究世界史、中世纪史的学者来说，要能够作出让世界同行瞩目的成果，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从中国史的研究中吸收概念和方法与西方学者对话，马克垚教授的著作就是吸收中国史创新世界史的一个典范。最后，他用欧盟科学基金会的罗马世界转型研究作为例子，解释了新的视角和维度对研究带来的启发，比如从马克垚教授的

专制主义政体出发，可以超越传统研究视角所见的罗马帝国的衰落，并观察君权如何与贵族政治结合得以形成，比如蛮族将领依靠教会获得了立法权。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从三个方面谈了著作对他的影响和启发。首先，他认为这本著作让他意识到了中国古代国家的性质以及国家结构的复杂性，将中国的国家制度放在世界历史中去考察，可以发现背后相似的逻辑与机理；这种比较也能发现其实在传统中国史研究中使用的政权、朝廷等概念其实过于简单化了。其次，他认为本书的贡献可能在于古代君主制度研究而非专制制度研究，因为不同学者对古代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定义，马克垚教授笔下的专制其实等同于他人所说的君主集权制。使用专制话语消解了其背后附加的各种意义，很可能无法让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满意，专制在学术界的传播本身就是各种主义作用的结果，抽离了专制背后的主义色彩和愿景是否容易造成混乱。最后，他认为马克垚教授在著作中关于专制制度中军队、官僚、税收的讨论，其实与学术界对国家形成、国家能力的讨论相契合，隐含了现代国家是古代国家完善、能力提高的预设。而这本著作主要与东方主义对话，如果也同国家主义、国家能力等理论对话，又该如何看待古代专制政体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点值得探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主要结合韦伯的研究展开评论。首先，韦伯在讨论国家时一方面将统治作为即社会行动学的概念进行解释，即统治是一种人身关

系；另一方面则是拒绝了政体类型学的进路，从组织的角度来探讨了现代国家的诞生，比如军事、政治、司法三种早期的现代组织催生了现代国家。马克垚教授著作的启发在于，这三个组织层面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局限于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区域，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其次，韦伯并没有严格建立政体类型学与行动支配类型的关系。以中西封建制为例，他认为对应于传统权威和法理权威之间的变体，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历史社会学对国家的认识。比如他们将罗马帝国西北部的专制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起源，而在韦伯之前的德意志政治经济学则将这种制度称为可启蒙的专制政体，以此严格地区分了来自古代专制政体中的因素。但是以上的理解都是局限于16世纪后的领土式的国家形态，这些成果在其他地区可能遭到了很大的挑战，因此田耕助理教授认为，历史社会学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与马克垚教授的研究相吻合，就是要跳出狭义的西方视域，在更广的范围内来考察韦伯的学说。

李猛教授随后进行补充。在韦伯研究中，他使用的分析概念恰恰是专制而不是方诚峰副教授所钟意的君主集权，原因可能恰恰在于强调制度化还是人身关系的一面。由此引申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国家最根本的特征和差别是什么，可能也在于传统的军事和皇帝体制是高度人身化的。

北大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主要结合对希腊史的研究发表了评论。首先，他认为这本著作对他的启发在于研究既要做细，也要照顾到大方面的考察，努力地扩展自

己的视野；其次，他认为这本著作重新定义了专制制度，赋予其中性评价，超越了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将问题带回到了政治本身；再次，在西方的政治观念中，暗含了公民的积极参与，并不把专制视为政治共同体的组织方式，而这本著作的意义在于破除了直接民主的神话，将民主制度还原到城邦内部权利的组织 and 权利的斗争；最后，张新刚助理教授也表达了一点疑惑，希腊雅典的政治被本书排除在专制制度的分析之外，是否预设了早期希腊的城邦制度达不到后来专制制

度对军事、税收、官僚的要求；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混合政体的追求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所理解的政治本身就非常排斥专制。他认为，除了传统的西方与东方这一对视角，还存在希腊与希腊之后这一新的研究进路。

最后，马克垚教授对各位教授的热烈评论和建议表示感谢，希望在吸收大家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这个研究。

（撰稿：包培含）

### 03

## 绘画与视觉机制——《知觉的悬置》研读会



2017年10月30日晚，“北大文研读书”第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绘画与视觉机制——《知觉的悬置》研读会”。本次会议主要围绕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一书展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沈语冰作引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担任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丁宁教授、李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唐宏峰副教授、郑州大学文学院贺玉高讲

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常培杰讲师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开始，李松教授首先介绍了与会嘉宾和研读会的主要内容。沈语冰教授长期致力于艺术基础理论工作，翻译了大量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名著。其最新译作《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甫一出版就受到高度评价，具有跨学科和原创性特点，对于国内发展艺术学理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此外，完全基于西方语境和材料则是本书的另一特点。至于将其推广到中文语境中是否还具有有效性，李松



李松教授

教授认为值得讨论。

随后，沈语冰教授作引言。他表示，本书主要以19世纪的三幅画——马奈的《在花园温室里》、修拉的《马戏团的巡演》和塞尚的《松石图》为切入点，横向地探讨其所处时期的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美学所共同关注的主题，即注意力。

沈语冰教授以《在花园温室里》为例，回溯了传统艺术史中常见的五种分析路径，并介绍了本书作者克拉里所采用的视觉考古学方法，以凸显本书的创新所在。第一种是图像志的方法。该画的主题是“幽会男女”，即一男一女处在私密的空间中。这种形象最早可追溯至亚当和夏娃，以及洛可可时期大量表现在花园中幽会的贵族男女青年。早期的相关作品通常关乎私密空间中的男女情爱，而这幅画中并没有裸体和激情场面——男女眼神毫无交流，手与手几乎相触又尚未接触。沈语冰教授认为，这是马奈所刻意追求的效果，一方面延续了“幽会男女”这一主题，另一方面又是对该主题的颠覆。

第二种是形式分析的方法。马奈将两人进行了强烈的对比。女子处于画中亮部，而男子处于阴影之中。女子的面色如所处背景中的玫瑰般绯红，肌肤吹弹可破；而男子留着棕褐色的胡子，脸色蜡黄，微微谢顶。

第三种是现代主义的方法。沈语冰教授着重强调，自马奈开始，绘画走向平面性。《在花园温室里》的空间被高度压缩，平面感十足。为此，马奈也在眼窝阴影、鼻子高光以及女子的裙摆阴影等细节之处做出补偿和调整，以制造一种浮雕感。另外，他甚至留下空白的画布没有完成，以此强调画作的形式感。现代主义强调的是材料和媒介，而非叙事内容。

第四种是精神分析的方法。此画包含着种种隐喻：女子面如鲜花的意味引人联想；男子被置于类似剑麻一样带有攻击性的植物丛中；鲜花是植物的性器官，通过色彩和芳香吸引昆虫传播花粉和繁衍下一代；椅子如牢笼般将男子挡在一边……男子的“武器”雪茄显得短小，而女子的“武

器”洋伞可开可缩，显得强大，这也具有独特的意义。沈语冰教授指出，精神分析方法无法被证伪，且具有较强的文学性意味，因此，采用该法进行分析时须有所保留。

第五种是艺术社会史的方法，即理解作画的整体背景，包括用途、功能、尺幅、模特以及画面之外的史实等要素。沈语冰教授介绍了此画的创作背景以及画中模特二人的身份关系。这幅作品的女模特是19世纪70年代巴黎的时装大亨，她的美貌、时尚让马奈深深着迷。马奈在其晚年梅毒复发难以起身时，曾寄信给这位女子，期待对方来看望自己。沈语冰教授认为这种分析视角使得观画的感受更加立体和丰富。

接下来，沈语冰教授介绍了克拉里在本书中所采用的视觉考古学分析路径，该方法源自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马奈创作该画的同一时期，凯撒全景透视图、连续摄影等一些重要视觉技术的发明对人的视觉进行了重新建构，并使得吸引注意力成为一种获取商业利益的手段。同时，注意力也被建构为一种正常人的规范，学校教学、工厂生产、军队训练都对注意力提出要求。克拉里认为，时代背景下对注意力的高要求使得人们产生对于集中注意力的逃避。马奈经过四十次重复修改，才还原画中女子恍惚迷茫的眼神，反映出男女二人对于注意力的逃避。而在克拉里看来，此画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观物机制存在关联——是并非因果关系，而是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相关关系。

在李松教授的建议下，沈语冰教授继续补充介绍了书中有关注意力的论述。首先，《在花园温室里》呈现了男女二人对

注意力的逃避，这是对时代背景下经济及规训体制对于注意力正面要求的反抗。其次，不同于传统画家旨在捕捉一个瞬间的永恒，该画减弱了绘画的时间感，具有一种悬置感。马奈意识到绘画是一个人为建构的碎片化过程，这种知觉的碎片化是当时重要的时代特征。

讨论部分，丁宁教授首先发言，他结合自己真实的观画经验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克拉里的切入点非常精妙，不仅代表了时代背景下的视觉文化，还与当时的注意力和文化景观存在相关关系。丁宁教授指出，克拉里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马奈是维拉斯盖兹的信徒。维拉斯盖兹擅长使用黑色，而这幅画中的黑色形象特别多。因此，非黑色的形象会更加凸现出来而显得更有吸引力。丁宁教授还表示，以传统艺术史方法及画作本身的主题性作为出发点来解读《在花园温室里》很有必要。

朱青生教授则介绍了自己与沈语冰教授在研究方面的差异，即对翻译重要性的强调程度不同。朱青生教授偏向于回到问题本身的状态之中，而非翻译相关问题的著作。关于此书，他认为其创新点在于从同时代的技术背景视角分析人的视觉变革。随后，朱青生教授回应了李松教授所提出的问题，并将本书的研究背景与中国进行比较。他指出，本书考察的是19世纪西方世界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中视觉机制的变革，其技术发展及社会变革与当时的中国截然不同。如今，微博、微信等工具带领中国经历着真实的视觉变革。因此，朱青生教授表示，克拉里的研究路径对于研究当代中国更具有借鉴意义。

贺玉高老师作为本书的共同译者，首先对书名进行了解释：从认识论角度分析，科技文化的发展使得原本的宗教价值崩溃，客观真实、终极真理不复存在；从商品经济角度分析，快速更迭的时尚使得人的注意力不断转移，商品经济中的交换价值摧毁了本真价值。随后，贺玉高老师对《在花园温室里》进行分析，他指出，画中相似的单调要素构成了一个封闭梦幻的空间，具有催眠效果，指向知觉的悬置。此外，贺玉高老师表示，本书最重要的特点是将福柯知识考古学方法应用于绘画领域，现代性通过运作“注意力”这一权力话语来控制人、摧残人，书中所列举的三幅画均表现了画家意识到注意力被资本主义控制后所做出的反抗。

李松教授则对本书提出一些质疑。任何时代都会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而将画中女子出神恍惚的状态归结于对于时代背景下对注意力规训的反叛，并将画中相似的图形要素解释为具有催眠效果，显得证据不足。此外，本书没有考虑马奈作画的背景。是模特要求马奈为其定制此画，还是义务为马奈做模特？此画是赠人还是归己所有？李松教授认为，这些问题会影响到对此画的解读。

随后，几位学者围绕注意力问题进行讨论。李洋教授认为，作为一种生理现象的注意力早已存在，但是作为一种知识学概念的注意力，是19世纪后期在心理学领域被明确提出。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发生变化，注意力既是资



沈语冰教授作引言

本主义内部的组成部分(即资本主义商品)，也成为其发展的环节之一。李松教授以金银器的制作为例，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同样具有注意力发生的情境，并以此来与李洋教授所说的资本主义视野下的注意力作出区分。李洋教授进而分析了这两种注意力的区别：李松教授所例举的是基于主体的注意力，即一种集中注意力的主体行为；而克拉里所关注的是注意力建构的对象及其所形成的环境，如视觉机器、绘画装置、电影装置等。中国封建社会注意力的创作与观赏指向的是宗教行为或是封建权力，而克拉里所探讨的注意力指向一种消费行为。常培杰老师认为，克拉里关于注意力的阐释是其重要的出发点和逻辑，现代社会中注意力的丧失引起了关于如何重建主体的讨论，而绘画在其中起到了统合复杂多样经验的作用。这正是本书集中探讨的问题，充满了矛盾与张力。李洋教授回应道，资本主义工业的现代性要求人们集中注意力，但与之矛盾的是，人的注意力是不断涣散的——这也是现代性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在李洋教授看来，本书不是严格的艺术史著作，更倾向于知识学的理论著作。因此，该画艺术社会史角度的背景故事不是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此外，他还指出，克拉里不仅借鉴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还借鉴了保罗·维利里奥的方法。保罗认为，速度革命是现代性的本质标志。克拉里受此影响，完成了著作《观察者的技术》。

唐宏峰副教授则认为，克拉里将书中的三幅画与所处时代的技术背景相互融合相互解释，这既有优势亦有不足之处。优势在于，书中呈现了克拉里对于历史的灵感与想象力；而不足之处则在于，论述存在断裂，缺乏历史的实证性。此外，唐宏峰副教授还指出，当前中国近现代视觉研究中极少有学者借鉴视觉考古学方法，而这种融合多学科材料与视角并抽象出某种理论的方法，对于中国本土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对此，朱青生教授作出补充，克拉里的研究问题聚焦于1879年至1900年间，而同一时期中国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克拉里的方法无法处理当时的中国问题，而对于中国如今正在遭受景观社会危机的问题，或许具有借鉴意义和操作的可能性。

常培杰老师从文明论的视角进行解读。他表示，在西方发展过程中，艺术最大的变化在于对普遍永恒之物的关注转向眼前经验之物，这同时也是克拉里的出发点。现代性关注短暂、转瞬即逝的事物，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不断重塑和更新着人的主体——主体对新事物的自动化认识导致了主体性的消解，而艺术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对现实经验的赋形。中世纪的绘画

以目的为导向，从而限定了艺术特定形态，而现代社会中的绘画是自下而上随着经验进行建构的。常培杰老师认为，克拉里关于艺术作品在对复杂经验进行赋形时如何处理聚焦整体与聚焦部分之间的悖论，作出了非常精彩的解读，从而引起读者对注意与失神、整体与部分、连续与断裂、边缘与中心、自动化注意和主动注意等多种悖论问题进行关注。这些悖论的核心是人的知觉合理化问题。

沈语冰教授对各位学者的建议表示感谢，也就翻译问题作出回应。他表示，应当用一种多元主义的视角看待翻译。翻译关系到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能够促进考察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因此，翻译实践具有高度重要性。

会议最后，李松教授对本次读书活动进行总结。作为艺术史领域的资深学者，他认为在研究艺术理论问题的同时，确定艺术史实十分必要。

(撰稿：王梦倩)



## 静园雅集

### 13

#### 李长声：茶道和日本的美意识



旅日作家李长声

2017年10月20日下午，“静园雅集”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茶道和日本的美意识”。著名旅日作家李长声担任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担任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李杨教授、张沛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周悦教授出席活动并参与讨论。

李长声先从日本茶道中的“三千家”

说起，现今日本比较著名的茶道流派大多和千利休及千家流派有着深厚关系。千利休之孙千宗旦晚年隐居后，千家便分裂成三大流派——“表千家”、“里千家”与“武者小路千家”——这便是“三千家”。茶道是一门手艺，也是一门生意，千家善于经营，在茶道界独大。茶道延续主要靠血脉和权威，即封建的家元制度。

李长声简要介绍了茶道的产生背景与历史渊源。道教早于佛教传入日本。在平安时代，“道”主要是指知识分子的技艺。从中世到近世，“艺”逐渐加入伦理性，纷纷演变为“艺道”，于是，“茶道”一词便应运而生了。其实，较之“茶道”这种颇具玄意的表达，“茶汤”或“茶”的说法在日本更为普遍。千利休曾说，“茶汤，就是把水烧热，点茶，喝，而已。”《广辞苑》载，“茶汤”指“招待客人，点抹茶，并且设筵开席，也即茶会”；“茶道”指“用茶汤修养精神，钻研交际礼法”。随着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茶道作为一个综合的文化体系，涉及建筑、园林、美术、工艺、饮食乃至宗教、思想、文学、艺能等方方面面。例如茶室属建筑范畴，露地（茶庭）属园林范围，茶具属于工艺，点茶和饮茶的动作又可看做是一种表演行为。因此，李长声认为，以茶道为题，几乎能道尽日本文化。

讲茶道，便要谈到茶。茶在唐朝时期便被遣唐使带到了日本；9世纪初，日本汉诗有云“吟诗不厌捣香茗”，其中的“捣”字，意即将中国唐朝的团茶捣碎；南宋时期，武士平清盛把持国柄，推行与宋朝的海上贸易，商船往来频繁；日本和尚荣西赴南宋借道去印度参拜佛迹遭拒，却偶然得到临济宗黄龙派的衣钵，将禅宗、茶和宋朝文化带回日本。荣西带回日本的宋茶用石臼碾成齏粉，叫做抹茶，也作挽茶或碾茶。李长声表示，日本人也喝茶叶，名为“煎茶”，鼻祖乃明末清初来日本的隐元禅师，而他又是日本黄檗宗的始祖。

李长声继而谈到，茶道与禅密切相关。首先，二者一同被和尚荣西带回日本。其次，创立茶道的三代人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和千利休都曾在京都大德寺参禅，并极力使茶道摆脱日常俗世，变成佛道修行。珠光参禅点茶，悟出禅就在茶汤中，这便是所谓茶禅一味。同时，禅僧的墨迹是茶室必不可少之物，茶书《南方录》称，“墨迹为第一，乃主客一心得道之物也”。进茶室（茶道术语“入席”）遵循这样的礼法：首先要先行礼，再抬头往里看（看见的便是挂在墙上的墨迹），接着欣赏茶道器具，之后坐到自己的席位上。

李长声表示，其实茶道的源头是在中国。他举了茶道工具茶筴的例子。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谈到：“茶筴以筋竹老者为之。”《大观茶论》中还记载了茶筴的使用方法，“手轻筴重，指绕腕旋”，现在的日本茶道表演手法亦是如此。和尚荣西可能是第一个在日本寺庙里用茶筴点茶的人。在千利休之前，日本茶道中使用的茶具主要是唐物名器，并以福建建窑烧制的天目茶碗最受推崇。同时，上文提到的茶室墨迹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痕迹，如今日本茶道界第一墨宝非宋代高僧圆悟克勤莫属。日本与中国对待茶的态度有所不同，日本把中国茶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七事之一上升到了文化的层次。对此，李长声谈到，“很多日本事物，我们仿佛站在河边，只见河水在眼前流淌，叹为观止，却不知道或不关心它是从哪里流来的，这无疑是非常可惜而可叹的。”

接下来，李长声谈到日本茶道中的两



种流派，即“书院茶”与“侘茶”（也称“草庵茶”）。银阁寺中的同仁斋，四叠半大小，铺满榻榻米，便是“书院造”的原型。书院式建筑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房间里有个“床之间”——也就是用床之间的地方挂字画、摆花瓶。若在书院式宅第里喝茶，饮茶前要先欣赏主人收藏的唐物，这样的茶汤就叫做“书院茶”。当时的权贵们争相将“请来”的唐物视为珍宝，似乎拥有唐物就等于拥有了中国文化所代表的优越感。

“侘茶”，也叫“草庵茶”。“草庵茶”在后世成了气候，以致现在的人们一说茶道，几乎就是指“草庵茶”。草庵并不是指简陋的房屋，而是一些好茶的富商在自己的宅院里辟出一片令人联想到深山幽谷的小庭院。在庭院里搭建一个隐士所居的草庵，便当做脱离世俗的“市中山居”。村田珠光改造的茶室，墙上尚糊有白纸；而武野绍鸥干脆裸露土墙，却保留了唐物；千利休则干脆把空间只剩下二叠大小（两个榻榻米），成了名副其实的草庵。京都妙喜庵的待庵茶室传说为千利休所使用，也是最古的茶室，四面土墙，茶客进去后只剩下窗户采光，有意营造了一个别有洞天的环境。如今四叠半是茶室的普遍形式，在小屋里浅酌低唱，便是“四叠半趣味”。居室虽小，却广容大众，小小的茶室暗含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千利休曾改造茶室，在茶室窗下开了二尺见方的小口供茶客出入，写做“躡口”。茶客需先在躡口前面的踏石上蹲下，一眼望见墙上的墨迹，再钻进去，“乃见须弥入芥子中”。由于躡

口狭小，武士无法持刀进入，后来被附会诠释为茶室里人人平等云云——于是茶道又多了一重思想境界。

谈及日本文化之美，李长声称其华丽又简素。京都金阁寺金光灿烂，像极精美的和服与三岛由纪夫的文字，这种华美一看便知来自恢弘大气的中国文化。京都另有一银阁寺，涂满黑漆，又因年久失修而剥落如疤，日本人却从中看到美，名之为“寂”（さび）与“侘”（わび）。“侘”就是不求装饰，结构简素，色彩枯淡，像是中国留有大片余白的水墨画。金阁寺华丽，实属露骨地显示中国文化；银阁寺简素，却是将中国文化不突出的部分加以极致化。所以，日本美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自然生发，而是取之于中国，再加以剑走偏锋的改造。

茶道主要发挥了简素的美学品格。日本哲学家久松真将这种品格归纳为七种：不均齐、简素、枯高、自然、幽玄、脱俗与静寂。李长声重点解释了“枯高”一词，“枯高”，有“寂”（さび）或“涩味”（しぶみ）的意味。在日语中，“寂”与“锈”同音，历经岁月而生锈，不见生气与活力，便显得高雅。例如茶室或寺庙里立着石灯笼，上面生长了青苔，就是“寂”的样子。又如王维诗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便是七种情趣兼备的。

李长声指出，茶道之美还在于‘侘’，而‘侘’之美也是中国人最不易理解的。在此，他援引千宗旦《禅茶录》：“不把不自由当作不自由，不把不足当作不足，

不把不顺当作不顺。”传说，丰臣秀吉便要来千利休家赏花、开茶会，然而千利休却把花统统拔掉了。丰臣秀吉原本恼怒至极，进门却看见花瓶里插了一朵牵牛花，便只有赞叹了。扫荡满园春色，只留一朵，这便是“侘”之美。又有传说，有人得一尊贵茶罐拿去给千利休品鉴，完好无损时不得青睐，摔碎后再拼接起来反而获得大师的青眼相加。由此可见，“侘”，不是贫，不是简，而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审美角度。

千利休将“侘”发挥到极致，打破了对唐物的崇拜和迷恋，而这也是对中国文化的最大否定。做茶碗时，千利休让工匠用手捏、用竹片削而不使用辘轳等工具。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东西，既不均齐也不圆润。而就在那时，中国的陶瓷技艺已经十分精良。可见，若要将中国文化改造成日本文化，则非另辟蹊径不可——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破这套审美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中国文化就是反传统，日本文化本身就具有某种“前卫艺术”的潜质。

李长声继续谈到，茶道兴起之初只是筵席的附属，恰似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喝茶聊天，后来慢慢升级为喝出境界、吃出境界。他在此援引里千家的家元千宗室的原话，“茶道常被说是‘招待的文化’，其实是‘寻找自我的文化’”，“茶道是修炼。删繁就简，尽量舍弃身上的虚荣、嫉妒、鬼花样，寻找本来的自己，接近本来的自己”。茶道集社交性、修行性、艺术性与仪式性于一身，其基础是社交性，于是便产生了“一期一会，不盼回头”的独特美学意味。主人请客人喝茶，不在意有滋有

味，而注重有板有眼。主人的态度谦恭又谨慎，发自内心地招待客人，道就在其中了。

活动最后，李长声与到场嘉宾和现场观众就自然意识、匠人精神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精彩的交流。

（撰稿：陆敏秋）



## 菊生学术论坛

07

### 科际合作——藏学与人类学领域间关系

2017年10月14日至15日，“菊生学术论坛”第七期暨“科际合作——藏学与人类学领域间关系”首次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该会议由“藏学人类学阿坝研究合作项目”组织，文研院与商务印书馆联办，历时一天半。

与会学者包括中央民族大学才让太教授、班班多杰教授和何贝莉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扎洛研究员和俄日航旦研究员，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和吉毛措博士后，中山大学刘志扬教授，上海大学张亦农教授，青海民族大学才项多杰教授、陈乃华副教授，西藏大学更尔易西副教授，四川大学玉珠措姆教授、陈波副教授，四川阿坝州编译局宏科局长，北京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主任李霞，北京师范大学翟淑平博士后。此外，参加会议的还包括“藏学人类学阿坝研究合作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及阿坝州编译局的两名工作人员。

10月14日上午，王铭铭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他在开场讲话中指出，藏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交流与碰撞由来已久。尤其在过去三四十年来，藏学家引入了不少人类学概念、



与会嘉宾合影

方法与理论，开拓了学科视野，而人类学家也借鉴藏学研究的内容和结论，在象征、社会结构、宇宙论、历史、宗教、文明等方面受到诸多启迪，两个学科呈现出密切关联的面貌。基于此，本次工作坊聚焦于藏学与人类学相互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并以此来探究二者之间进一步结合与启发的必要性和意义，并讨论科际合作的路径与具体方向，从而思考藏文明研究的广泛人文社会科学意义。

在致辞中，才让太教授代表“藏学人类学阿坝合作项目组”对文研院和商务印书馆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并对与会学者表示了欢迎和感谢。阿坝州编译局宏科局长介绍了“藏

学人类学阿坝研究合作项目”的渊源，他着眼于阿坝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繁荣来思考这一课题的意义；从自然和文化两个方面呈现了阿坝州的整体情况，并认为阿坝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足以使其成为藏学人类学科际合作的学术基地，能够为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基础保障，同时为阿坝社会的发展提供文化与智力支持。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主任李霞编审介绍了“菊生论坛”的渊源，希望通过这个论坛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交流与合作。

会议开幕式之后，与会学者各自介绍了个人的基本情况和研究经历，会议进入主体发言阶段。上午场由中山大学刘志扬教授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中山大学藏语学习和藏学研究的基本情况。中山大学不但每年举行“藏族文化节”，广泛介绍藏族文化，还要从西藏民院招收20名学生。他带领学术团队从2006年开始在川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先后涉足平武、松潘等地区，目前开始关注金川、黑水等区域。调查涉及的主题除了人类学的传统领域之外，也关注土司后人保留下的文本，同时注重考古学调查、壁画研究等。之后，刘志扬教授追溯了国内外藏学研究的大致历程。他指出，西方的藏学研究有两个传统：一是文本传统，例如19世纪末期，他们关注藏文文献的历史缘起及其与梵文的关系——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二是关注人和社会，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无法踏足中国藏地做实地研究，只能在喜马拉雅山脉外围以印度、尼泊尔等地区为田野点进行藏人社区调查，关注语言、宗教、文学、社会结构等主题，并以此来重建西藏传统社会的整体图式。近年来，西方

的喜马拉雅和西藏研究转向关注全球化的贸易网络、文化变迁、象征主义、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反思和批判等方面。此外，刘志扬教授还强调了阿坝地区多元文化、多元民族交汇的特点，即国家、地方、民族在这一区域是互动关联的——这一特点一直为人类学重点关注。他指出，还应该关注一些新的文化事项，例如牧民定居带来的生计方式改变与社会变迁，水利开发、矿产资源开放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以及旅游经济带来的社会文化变更等等，这都需要在今后重点关注。

才让太教授通过对比自己的藏学研究经历和与西方藏学研究的成果后指出，目前中国藏学研究的理论、思路、方法和手段都过于陈旧，阻碍了藏学研究的视野，有必要通过引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善藏学研究的这种局面。才让太教授介绍说，他与王铭铭教授近期交流频繁，并得到阿坝州的支持，计划以阿坝州嘉绒藏族文化为载体，初步建立藏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他们共同主持的“藏学人类学阿坝研究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不少学者已经开始了藏学人类学研究的具体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藏学人类学”这一名称虽被提及，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路径还未建立。才让太教授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促使藏学和人类学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能深入结合，建立起交叉学科的理论框架，使“藏学人类学”正式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学科，并以阿坝课题为契机，对嘉绒区域性的大小传统、多元化复合性等历史与现实经验加以深入调研、描述与探讨，推动阿坝州嘉绒藏区的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才让太教授还说明了早期苯教在文本和仪轨两方面的价值。从文本角度看，陆续出现的苯教文本揭示了佛教传入青藏高原之前藏地本土的文化传统，对于追溯藏族的历史、科技史、思想史等方面尤为珍贵。从仪轨层面看，现在民间的几乎所有仪轨都起源于早期苯教，例如“央”、“朵玛”等。才让太教授认为，文本研究和人类学实地调研的相互结合或许是两个学科相结合的一个突破点。最后，才让太教授指出，人类学非常珍贵的一点是能够以一种平等的目光去看待各种不同民族和文化，这背后是一种公平的态度，这对于中国的藏学研究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接下来由班班多杰教授发言，他认为这次会议是藏学和人类学向学界宣告正式联手，也是“藏学人类学”名称的正式开始。他理解的人类学是针对人本、人文、人类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理论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藏学作为国际性学科，内部涵盖的元素很多，一方面是关于民间、民俗方面的学问，人类学的方法能够全部覆盖；另一方面是经典和精英文化，除了哲学、心理学、技术学等内容，人类学的方法也基本可以覆盖。因此，文化人类学可视为藏学研究的工具、理论、方法。他指出，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藏学，至少有一百年历史，期间取得了很多成果；改革开放几十年，成果不小，但很有限，也不够深入，例如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藏语，经典作品非常少。另外，人类学虽然长期关注藏族地区的性、婚姻、家庭、亲属关系，但系统化的成果还很不足，且缺乏一个整体性的视角；在政治组织和社会控制方面，虽然也有从政治学角度进行的活佛



现场听众

转世、全民信仰、农奴制等研究，但从人类学角度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管控的研究还非常不足；对藏族的“集体人格”、生计方式、生活方式、经济体制等做整体上的研究，仍然不够；关于宗教、文化、艺术的成果也屈指可数；对藏医、语言、诗词韵律、天文历法、戏剧等方面，多为具体的研究，缺乏整体感，很少是从人类学角度进行的。班班多杰教授指出，人类学的现实针对性最强，也关注应用，对于传统和现代关系应该多加思考，例如传统村落和美丽乡村建设之间要进行协调，要站在当地人的角度去思考；关于寺庙的管理问题，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和寺院管理人员的关系，都可以应用人类学视角去考察，并提出合理化的方法，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班班多杰教授最后说，藏学家和人类学家应该在语言优势和理论优势方面互补互助，推动两个学科的结合，在藏族社会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成果。

扎洛研究员指出，藏学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的范畴，由于价值理念和理论体系不统一，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框架去规范理论研究，但是仍需要通过抽象化去建立理论体系。而这次会议对于藏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合作探

究就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从最基础的研究做起，沿着这样的方向，才能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他指出，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是藏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其本身提出理论并运用到其他学科的情况很少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藏学做得越久就越谦逊，另一方面是因为藏文书写体系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未断，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文本丰富，任何人都很难获得整体感，因而理论抽象的时候难以把握。

紧接着，扎洛更具体地表明了他对于人类学理论如何应用于藏学研究的思考。第一，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藏族人的宗教做整体分析：藏族人的宗教生活非常丰富，关乎生产、生活的诸多层面，既有世间法，又有出世法；既有世俗的，又有形而上的，结构方法有助于更真实、更系统地理解藏族人的宗教生活；第二，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藏族人的书写体系进行研究，例如高僧传记等文本，历史学家可能只关注对他有用的部分，但人类学的角度就更为整体和全面，也能更为深入地把握书写的思想体系、叙述模式、叠加过程，因而能从同样的文本中解读出不一样的内容；第三，关注藏族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象征主义和形而上的内容，例如唐卡画、佛像、手印、装饰、颜色、建筑、器皿、声音、服饰等，都代表着各种意义，对于理解藏族人的文化和生活极为重要。

张亦农教授从解构的角度表达了他对学科界定和理论吊诡的思考。他先是对藏学、人类学的学科界定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追问。首先，何为藏学？他从自己的研究经验出发，对藏学的内涵与外延提出了疑问，例如，做拉萨清真寺的研究，能叫藏学研究吗？

民族关系的研究能叫藏学研究吗？其次，“为何藏学”？他指出，汉学横行了几个世纪，逐渐弱化，但为何藏学发扬光大的呼声如此之高？藏学为什么要和人类学合作？紧接着，他开始追问，假定藏学有合法性，其他诸如“医学人类学”的分支人类学有没有合法性？这些“XX人类学”与合法的民族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质疑了学科界定问题之后，张亦农教授又反思了理论吊诡问题。他认为生硬地将人类学作为研究方法结合到藏学显得很机械，是一种“工具浪漫主义”，藏学传统研究方法的陈旧、呆板，并不能全然将人类学视作一个全能的新式武器。事实上，人类学提供的更多是一种思路，一方面强调“更大的情境”，另一方面是“批判性思维”。

俄日航旦研究员以自己格萨尔研究的具体经验为基础，提出了藏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他认为，目前藏学研究的内部都不能流畅对话，更勿论跨学科的交流，研究思路和方法都过于陈旧，急需进行研究范式的转化，对藏学研究的方法和论进行一次革命。以格萨尔研究为例，他认为应该超越将文本看做独立体系、只关注作者和文本本身、不关注语境的文本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的研究方式，转向关注语境、关注读者的后现代研究方式。

陈乃华副教授从更多元和多样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议题和方向，去思考藏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可能研究路径。例如通过根敦群培的多重形象去思考不同文化如何相互观望和理解；重返石泰安的书写中去看佛教和道教的关系；如何理解与考察不同文明的知识 and 知识人；如何理解佛教的物质文化

以及业力、轮回等主题；佛教与社会转型；村落互惠；如何在佛教社会中反思；如何思考在场的政治等等。

下午的会议由宏科局长主持。他指出，青藏高原这片土地给祖祖辈辈生活其中的人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在人们不断改造这片土地的过程中，其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尤其近些年来出现了诸多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宏科局长希望通过两个学科的对话和联合，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看这些问题，真正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如何从过去走向现在，他们在想什么？面对现在各种各样的惠民工程、水利建设、资源开发，他们的生活方式、生计手段都发生了哪些激烈的变化？这些发展要求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主题都可以放在藏学和人类学交叉学科的视野中去重新考虑。此外，作为一个地方文化工作者，他也希望在实际的工作，能够得到两个学科的智力，用一种新的视野去认识问题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更好的决策，才能更切实地立足于人们的生活去思考和行动。

陈波教授反思了藏学和人类学的科际合作到底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他认为，藏文明和汉文明本身就一直在互相打量和理解，人类学作为第三种眼光，投射进来，本身也许是不必要的。他还指出另外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语言工具，他以李安宅留下藏文田野笔记为例，说明了多种语言、多语文本对藏学人类学的挑战；第二，不同文明的视野与眼光也会对藏学人类学带来挑战，例如汉藏文明的不同纪年方式会使得历史年代的断定出现偏差；第三，不同群体的学术

脉络会让他们思考不一样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议题，而世界的本相是多元文明交错的结果，但现在需要的是要以藏文明为中心来看待世界、看待天下，而非将之放置在一个框框里去界定谁是“我”、谁是“他”，因此应该基于多元、多维度的自我与他者，去思考文明应该向何处去。

更尕易西教授从文化多样性、学术多样性角度探讨了藏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他认为藏学研究领域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有一种自觉的接受意识，他用“文化自觉”概念来说明这种意识，并强调不同文化的共处而非冲突。这不仅对于藏学研究具有意义，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文化交流的推进都很有价值。他认为，人类学和藏学都有各自的概念体系和学术传统，因而要从人类学、社会学的思想史研究出发，推动藏学的议题。人类学一向关注他者，也重视区域性研究，特别是从1945年之后，美国基于区域性研究将世界分成几个重要的学术区域，多学科结合对之进行综合性研究。而现代意义的藏学关注历史、文化、语言、宗教；人类学的藏学研究，主要是以藏文明为中心展开的文史哲研究，但“中国藏学研究”、“藏语言文学”、“藏学”等概念不明晰。实际上，藏学要结合人类学理论，应从广义的人文关系来理解和界定，才更为准确。最后，更尕易西强调了藏学人类学研究时，最好能掌握本土语言，且要有一些适当的距离，才能获得一种他者的视角。

玉珠措姆教授认为藏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应在更具体的层面进行，例如与人类学某个分支学科，这更有利于探讨两个学科的理论框架建构。她以自己的研究经历为例，说

明藏学研究者会无意识地应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指出：第一，人类学的思维方式和视角对藏学研究很有启发意义；第二，人类学非常重视实地调查，能够为文献研究提供很好的补充，口传资料与典籍、文本、档案应该相互结合与验证；第三，藏区的民族志的研究仍很薄弱，尤其藏区内部的多元性很明显，各区域的文化多样性也很突出，都需要更细致的民族志研究；第四，藏人研究自己的文化会因为熟悉而缺乏敏感性，因而应该保持一些相对的距离，才能保持洞察力；第五，应该重视地方的文史资料、传说，尤其做区域历史研究时，不应将资料划分等级，只要有解释力，都应同等对待，这也是跨学科对话的意义所在。

才项多杰教授以自己的研究为例指出，在藏语和汉语的互相翻译过程中，很多深刻的文化意涵和文化品位会消失，因而语言的掌握在调查研究中非常重要。他还强调，藏学和人类学的结合，要同时注重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将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藏文化的特殊性关联起来，也就是说，要用藏文化的具体事去提取理论。此外，他特别强调，一定要避免知识性的错误。最后，他指出，藏学领域几乎都与宗教领域脱不开干系，因而在宗教研究的时候要避免全盘否认或全盘接受，而应采用一种“学术需要理性，信仰需要宽容”的态度。

何贝莉认为藏学和人类学的科际合作需要结合具体的研究主题去推进。她也强调文本研究应该与实际调查相结合，应该以一种关系主义的视角去看不同的文本，打破不同学科对不同文本的取舍，整体性地分析文本内部的分化和联系；此外，也应该重视

田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

王铭铭教授首先追溯了人类学与被研究文明之间关系的大致脉络。第一个阶段，西方人类学与其被研究文明的关系是一个文明替代另一个文明，人类学曾在此阶段扮演不光彩的角色；第二个阶段开创者为马林诺夫斯基，马氏主张人类学研究不同文明，并认为人类学有助于殖民地的间接统治；第三个阶段出现于三、四十年之前，基于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用“反帝”观念来反对西方对非西方的帝国支配。尽管人类学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发生了不少变化，角色有根本性变化，但它对于被研究文明始终保持一种罗曼蒂克情怀。王铭铭教授坦诚自己对于藏族的研究也具有这种罗曼蒂克的态度。

随后，王铭铭教授详细讲述了他自己最想了解藏文明的那些部分。首先，他认为藏文明不但具有地方性，更具有世界性意义，他关注藏人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如何处理与他人、他物、他神的关系。这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影响着人们对于生命和死亡、幸福和痛苦、幸运与不幸、罪恶与善良、规矩和僭越等问题的观念，而这些都需要通过具体的民族志调查去慢慢理解。

翟淑平认为，理解藏文明首先要“除魅”，要拂去附着在藏学研究上的诸多其他内容：一方面是民族政策、政治管理等考虑；另一方面是外部世界附加给藏区、藏人的诸多想象。藏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和借鉴，有助于祛除这些想象，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包含着诸多智慧和启发的藏文明体系。她以藏族民间信仰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为例，从大小传统关系的讨论出发，说明了要祛除对于藏区宗教信仰的笼统想象，必须进入更为具体的区域社

会内部,通过具体的实地调查,并借助史料、经典、法本、传说、民间故事、集体记忆等材料,来复现这种嵌入性的社会文化情境,进而去理解藏文明。此外,翟淑平认为,从最细微的文化现象到最宏大的藏文明体系之间,都可以通过藏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建立起不同层级性的研究,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到一个城镇、一个更大的区域体系,这种层次更丰富、更多元的研究,都可以与区域研究相结合。

吉毛措以自己的苯教研究经历为例,指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古文献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她认为,实地调查有助于挖掘史料中未记载的文本信息,通过访谈、观察等方式获得的资料能够有效地对文献研究做出补充。以往的藏学研究主要是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考据,相对忽视对人和社本身关注,因而引入人类学的实际研究,非常有必要和价值。她还指出,人类学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藏学能加以借鉴。此外,她认为藏学人类学的研究要求研究者要懂得藏语言文字,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吉毛措提出了自己作为藏人研究自我文化时、自我如何转成他者的问题。对此,王铭铭教授做出了回答,他说,永远不要设想自己研究的就是自我,因为这个自我很可能是政治性的强加。而且,自己对本文化的熟悉程度可能远远低于自己的想象。

10月15日的圆桌会议由才让太教授主持。作为引言人,王铭铭教授简单概括了前一天会议中与会人员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例如,藏学研究应该更专门还是更综合?藏文明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民族”作为载体还是“区域”作

为载体?他所推崇的藏学人类学,含有对历史研究的期待,区别于藏人类学(Tibetan Anthropology 或 Anthropology in Tibetan Areas),更重视历史和文明的研究,并注重与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相结合,关注历史人文研究与现实的关系,能更好地处理严谨的学术与广阔的视野之间的矛盾。因为只有开拓视野,才能与其他区域对话,在跨地区合作中,解释藏人的生活系统和文明系统,总结出藏文明的普遍理论。

其他的与会学者也积极参与讨论,相互激发出更多话题与观点。俄日航且研究员仍然以自己的格萨尔研究为例,强调了范式转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文本研究应从本质主义转向建构主义,关注语境、情境,注重在整体视角下理解。陈波教授接着俄日航且的观点进行讨论,他表示,虽然俄日航且说要强调情境,但依然是站在文本的角度去考虑情境。他还指出,如果文明的历史太过漫长,人类学就很难把握,例如大小传统都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并不存在一个很好的研究范式。

该如何理解藏族社会的长时段历史?陈乃华副教授以三大藏区的中心转移和转换为例,认为可以通过深究中心转移和转换背后的动力、张力和机制,去把握藏文明的历史。她还讨论了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寺院教育和现代教育、“新藏人”等主题。

玉珠措姆教授接着“中心”和“边缘”的话题,讨论了康区的知识分子对于康区文化中心形成的作用。尤其是清末民国,藏族知识分子的中心转往康区和安多地区,并与汉文明密切结合,成为新的精英阶层,并对康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见,中心和边缘

是对话的位置,可以相互翻转,而双方怎么看彼此,就会带出相应的故事,去表达自己的观念。

刘志扬教授认为藏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是图书馆知识与田野知识的结合,而更重要的是实地调查和田野方面的知识。他还以宗教学和宗教人类学的区别来映射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此外,刘教授还强调,掌握被调查对象的语言,能够让研究者敏感度更高,思路更清晰,视野更开阔。至于陈波提出的漫长的历史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他认为,古典人类学的进化论也是在处理大历史问题,而现在的人类学越来越细,渐渐失去了历史视野,因而应该转向历史人类学。

才让太教授提出疑问:藏学到底能从人类学引进什么内容?二者都是学科群,如果结合在一起,会不会更加繁多、复杂?他也关注苯教与佛教的关系、道教对藏文明的影响,强调贸易、战争带来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并认为民族地区的自杀、抑郁现象少与唯心主义发达有关。当然,这些研究都需要人类学的视野和思路。紧接着,才让太教授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出发,指出汉文明、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将藏族宗教史放在中亚的大环境中,才能理解藏文明;同时他还认为,佛教在青藏高原的普及,意味着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覆盖。基于此,他也对汉文明越来越快速地影响藏文明这一现象表示了担忧。

王铭铭教授回应了才让太教授的担忧,认为藏文明不会消失。虽然这一文明遭到了消解它的各种力量,但它自身在接受这些外来的东西时会强化自身。另外,他指出,人类学的许多理论创新,都是来自对土著语言

的认识和采纳,例如“hau”、“kula”这些概念。

才贝老师也指出,藏学的很多概念和理论,本身是有普遍性,不一定非要用人类学的理论再加以解释。因此,藏学家也不要妄自尊薄,不要刻意用人类学来包装自己,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内把研究做好,就是好的学术研究。

扎洛研究员认为,传统藏学主要是文本研究,这些年出现的新的生长点,基本上都是人类学引进后的很多研究成果。但整体上来说,这些研究者多关注藏区社会的宗教,对生活领域较为忽略——而恰恰是日常生活才是不同文化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基础。放弃日常生活领域,就放弃了文化对话的可能。他还提到从政治人类学视角看藏区村庄里政治权威的产生与内地有何不同;此外,还通过藏族社会的汽车文化和女孩子成年礼等例子,来说明民间社会的创造力十分强大,这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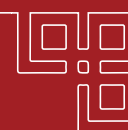
会议最后,才让太教授和王铭铭教授分别进行了简短的总结,对所有与会人员表示感谢,并对“藏学人类学阿坝研究合作项目”的下一步工作做了安排。

(撰稿:翟淑平、吉毛措)





静园学术



## 关于中国的艺术史研究——西方与中国的视角



包华石教授

2017年10月30日下午，由文研院主办的《关于中国的艺术史研究——西方与中国的视角》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美国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包华石（Martin J. Powers）担任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担任主持。参与座谈的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军、副教授邵彦与副教授黄小峰，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座谈围绕海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视角展开，各位与会人发表了自己对艺术史学科史学史、谱系分类以及当下存在问题看法与观点。

李松教授首先发言。他表示，座谈会的题目包括中国视角与西方视角，即面对同一讨论对象、同一学科，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立场对其进行建构、规划和发展。

随后，包华石教授分享了美英学者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成果。他提到，欧美各国现代的艺术史领域起源于温克尔曼（Winckelmann）。温氏宣称，每一种文化的艺术风格反映着其文化特色。这样的说法让学者认为自己的文化传统看上去都比其他文化优秀。黑格尔提出“民族精神”后，不少德国学者企图用艺术的历史证明欧洲或者德国的民族精神是全球最优秀的，因此，西方的艺术史学历来经常被用作“民

族主义”的一种武器。

19世纪中期，一批欧洲画家欲摆脱写实主义的约束。其中不少画家如惠斯勒（Whistler）借用了日本和中国画家的技法去实现。古典的欧洲画论认为，模仿真实是艺术的目标，但是物体除了面貌之外还有它的“本质”。问题在于认识本质还需具有可以认识的形状方可实现——这便是20世纪的艺术家对面的关键问题。因此，艺术家将眼光转向东方，并发现东方艺术中线条具有的形式美感。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在《东方绘画》中写道：“艺术中最重要的带有表现力的因素就是描绘形式所用的线条的气韵（rhythm）。”随后，弗莱的形式主义理论解决了艺术家如何通过抽象的形状表达内容，同时给现代艺术史的领域打下一个基础（或说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学者在未能掌握中文、日本或梵文的情况下，仍可以对该文化的艺术品进行研究，形式上的分析即可。形式分析的代表人物为雨果·明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和巴贺霍夫（Ludwig Bachhofer）。后者为沃尔夫林的学生，他意识到艺术风格不是必然，而是按照其时代观众的轻重取舍来设计的。

之后的50、60年代出现了第一批专业的中国艺术的汉学家，如苏利文、方闻、范德本、高居翰。他们通晓中文或日文，在东方学习了中国的传统鉴赏方法如辨识题跋、印章等，并将西方传统的形式主义与中国艺术史联系起来。第二代艺术史家，如班宗华、雷德侯、李雪曼、何惠鉴、李铸晋等，则开辟了新的课题。如何惠鉴在

较早的60年代中期就运用社会艺术史的方法，将社会历史、行政历史和艺术史联系起来。此时的社会艺术史是在欧洲和亚洲艺术的领域并行发展的。80年代，社会艺术史已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这在谢柏柯（Jerome Silbergeld）、文以诚、巫鸿、柯律格、乔迅、克里格的著作中都有体现。

接下来，包华石教授介绍了自己与蒋人和（Katherine Tsiang）主编的《中国艺术指南》（*Companion to Chinese Art*）一书。该书分为五篇：第一篇为生产与分布，第二篇为再现与写实的问题，第三篇为理论研究包括中国画论、书论的问题，第四篇讨论画家的身份与社会能动性，第五篇为图像与语词。该书对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进行了细致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分类。

李松教授评论道，包华石先生的讲座内容跨越了200年，介绍了一代又一代传承有序地建立起该学科的过程：从18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对中国艺术史开始关注，继而走向一个独立的学科，在认识中文并开始使用中文材料后，又从形式研究走向社会学研究。李松教授最后提到这本有代表性的合著，实际是把目前西方和香港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中国艺术史论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但在近代中国引入大学制度后才形成与西方对等的学科。李松教授还抛出了以下问题以期引发思考：西方人视野中的艺术史与中国的视野差别在哪里？除了借鉴以外，我们是应该在意该还是跨越这些差异？

尚刚教授以自身工艺美术史研究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工艺美术在艺术史领域的边缘化处境是由其本身的复杂性造成的。

工艺美术从文化形态上看是造型艺术，但生产形态却是手工业的，因此，该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独特性和差异性。工艺美术史学科发展晚，能人不多，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材料整理。学科下面面临的问题主要有：材料存在较多缺陷，同时对研究者要求较高，即需要具有特定的材料、化学、物理等相关知识。工艺美术史主要致力于解决与文化史相关的问题，因此工艺美术研究者更像历史学家。尚刚教授表示，包华石先生有很多新的观点和方法，从中获得很大启发。认真的学者应该多注重材料的使用，加深对材料的理解——这对艺术史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同时，在对材料的收集和理解上，中国人会比外国同行更有优势，毕竟语言有差异，文化有隔膜。尚刚教授还表示，文化应该有交流，同时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李军教授谈及自己对“民族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德国的艺术史传统中关于民族精神的问题在中国艺术史界有较大的负面名声。范景中教授团队在翻译贡布里希著作的过程中对民族精神进行了反思，而他个人则对民族精神一直持另一种立场。贡布里希在《艺术史之父》中写到，现代艺术史学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五个“主义”中，三个来自于温克尔曼，两个来自于黑格尔本人。关于哥特艺术来源的争论中，其实隐含了一条线索，即各个民族争相认领其合法性的代表者时将艺术史的价值相对化了。民族主义是种“传染病”，民族主义对大国来说是沙文主义，而对小民族来说其实是反抗主义。

贡布里希讨论过黑格尔的“辩证相对

主义”，艺术史中相对主义的代表是李格尔，他在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下不断为艺术史翻案。比如，罗马晚期的艺术一般被认为是堕落的艺术，而李格尔认为其只不过是不同时代精神的体现。由此看来，时代精神学说在艺术史中反而是“建构性”的。李军教授继而谈到，从贡布里希学说引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对于时代精神学说有一些比较负面评价，但若从史学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确是在普泛化，并要求各民族建构一套自我的价值。罗杰·弗莱(Roger Fry)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这恰好是时代精神的学说。同时，该学说会存在一个不断“碎片化”的问题。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合法性。这种碎片化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本身存在的问题，不断的碎片化的结果是自我摧毁，因为不断会有人提出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女性主义、少数民族、工人阶级的，任何团体都在提出自己的合法性。时代精神本身具有建构性和破坏性两方面，因为其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自我与别人不同。李军教授表示，今天我们或许不应该过多关注你们和我们、西方和中国以及民族彼此，更应关注我们这个大的团体以及团体的认同性。跨文化的研究不应该和多元文化一样，而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因此，李军教授并不认可存在一种西方人的观点和东方人的观点。即便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也几乎没有两个学者对同一个问题持一样的看法。

邵彦副教授则对座谈会的交流对象提出异议。她认为，“海外的中国学其实是外国学”，因此，本次座谈对等的交流对

象应该是在中国研究或者教授西方美术史的学者。《中国艺术史指南》带给她的启发是，若想了解西方艺术史，有没有中国人编的“西方艺术史指南”供参阅？西方学者将外国美术史引入到文化母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带动了国内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转型。在这点上，我们不必掩饰对西方先辈艺术史研究者的感激之情。西方的同行中文越来越好，但相比较下，中国大部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恐怕知之甚少。以“大婚”这个词为例，现在，名人举办一场婚礼便被称作“大婚”，但其实只有在位的皇帝举办婚礼才能用“大婚”一词。中国文化在现代进程中丢失了很多东西，这警示我们在研究艺术史的过程中需抱有严肃和认真的态度。

黄小峰副教授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包华石教授提到“代系”关系，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很强的传统，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便提出“论师资传授”，那么，这种代系的分类方法在美国和欧洲被接受的程度如何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一个非常清楚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学术分类和脉系？二者是否能区分得很清楚？该从时间来区分还是以方法来区分？第三个问题是来自于不久之前雅希·埃尔斯纳所作的题为《从欧洲中心主义到比较主义》的讲座。欧洲中心主义或是中国中心主义不是短时期内能消解的。欧洲中心主义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中国美术史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是否和中心主义有关系？第四个问题是90后如何看待派系的分类。

包华石教授回应了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他表示，欧洲中心主义指西方人认为历史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和发现都先发生于西方，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存在中国中心论。关于分类的问题，包华石教授认为这种分类是必要的，从时间或方法上分类都是可行的。西方的艺术史研究有一个趋势，即从民族主义发展到比较性研究，而这个阶段与欧洲美术史的演变分不开，因为此时的西方汉学家也正好开始研究社会、经济与历史。

随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宁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也参与到讨论当中。学者们对于西方学术体制问题、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来源问题、艺术史研究的对象和材料问题、中国艺术史的日本研究、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考古发掘和史料研读问题进行多方面讨论。这些讨论对当下中国的艺术史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性意义，在场学子收获颇丰。

(撰稿：张薇)





## 上海犹太人的内在精神——解读历史创伤时期难民的生存韧性

2017年10月23日下午，美国卫斯理大学教授舒衡哲教授（Vera Schwarcz）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办讲座，主题为“上海犹太人的内在精神——解读历史创伤时期难民的生存韧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担任主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印红标出席本次讲座。

舒衡哲教授在二十五年前研究中国与犹太人的文化记忆时已经注意到上海犹太人受难史。如今，她希望从新的角度去考察这段历史。事实上，抗战不仅仅有所谓“抵抗”，还有“幸存”（survive）。她希望从“内心的力量”（inner resources）这一角度去理解犹太人是如何在战争中幸存的。

舒衡哲教授从《张申府访谈录》中得到启发，以口述史这一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口述史将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扩大所谓“档案历史”的范围和层次。

在介绍研究兴趣的缘起之后，舒衡哲教授抛出一个有意思的比较：中国人与犹太人对于“忍”的不同理解。她认为，中国人关注的是个人层面如何忍受、如何幸存的；但在犹太文化中，“忍”则往往是指集体的“忍”和集体的“幸存”。两个民族对于“忍”字的不同理解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双方战时存在的幸存策略的差异。舒衡哲希望借此提醒中国听众时时留意犹太人不一样的生死观。

接下来，舒衡哲教授展示了一幅油画，名为《没有什么挡得住真情实意》（*True Emotion Breaks the Blockade*）。这幅画描绘的是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中国人给被日军虐待的犹太人送食物的故事。它比较契合中国与以色列开展友好合作关系，故而受到两国的追捧。舒衡哲教授认为，这是把历史简单化了。当时，上海的犹太人并未被关起来，上海也不是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且那时的中国人自己都食不果腹，又哪来的余粮送给犹太人呢？由此，舒衡哲教授委婉地指出，中国人帮助犹太人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行，其实是现实政治在起作用。她认为，更加符合事实的是犹太人拉比（Rabbi Simcha Elberg）在诗中所讲述的那样：“三个国家将我驱逐”——波兰、立陶宛和日本都不接纳犹太人，最后由日本将其送往上海。

最近，上海档案馆发现有一批档案。1939年，孙科曾提议国民党在云南建立帮助犹太人的难民营。有趣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日本也要在伪满洲国建立犹太人难民营。国民党认为，借助犹太人的国际影响力，收容他们将使美国政策向中国倾斜。而日方也是类似的逻辑。然而，双方都没有实施这一计划——不久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既然中日均未直接给予犹太人帮助，那么到底是谁呢？

舒衡哲教授列出了三位她认为重要的人物，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犹太人。第一位是俄国犹太人阿什坎那辛（R. Ashekenazi），他早在1927年就来到了上海。起初，他主要是帮助那些逃离苏维埃革命的俄国犹太人。待上海沦陷后，大量德国犹太人涌入，他试图帮助所有的数万名上海犹太人。第二位是美国的犹太人组织。在得知上海有大量无依无靠的犹太人时，组织派遣劳拉（Laura Margolis）进行援助。珍珠港事件之后，劳拉由于国籍的缘故被日军关进了监狱。第三位是维也纳人考曼诺维茨（R. Kalmanowitz），他曾去美国募集资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禁止物资流入日本占领区，但他仍设法将筹到的款项送给上海犹太人。

除此之外，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是如何在沦陷的上海幸存下来的呢？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舒衡哲教授认为，有三种力量支撑着他们：尊严、团结与书籍。犹太人成为难民之后，虽然失去了过去的地位，但仍保有尊严与信念，团结在一起，生儿育女培养下一代。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还要自费出版自己的书，因为书籍是困境中的救赎，可以拯救他们的灵魂。

这是不是意味着犹太人毫无抵抗，只知“幸存”呢？也不尽然。1943年，德国在得知日占区上海有两万名犹太人时，曾要求日本将他们全部处决。日本人不以为然，并没有执行，而是将他们驱逐到上海虹口集中起来。一部分犹太学生表示条件太差，拒绝前往，并与那些被迫听命的犹太人领袖发生了冲突。但是，大部分犹太人并没有选择抵抗。舒衡哲教授认为，这



舒衡哲教授

是情理之中的选择，因为不可能一直抵抗而不妥协。

舒衡哲教授还表示，历史不是单线发展的，人们应该以更为复杂的眼光去看待它。历史仿佛是那丹麦犹太博物馆中被割裂的光线，人们需要把光线的碎片拼在一起方能看清它的全貌。她强调，我们必须倾听历史中个人的声音，只有这样做，历史才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列举难民的数字，而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书写。例如，她个人很感兴趣的一个具体问题是：当一个犹太人只能携带很少的行李去逃难时，他会带些什么？犹太难民都有什么东西承载着他们的内在力量？最后，舒衡哲教授以一个开放的问题做结启发听众去思考：“当你沦为难民要逃亡时，你会带走什么书？”

交流环节，欧阳哲生教授就中国知识

分子与犹太人的差异与舒衡哲教授交换了看法。针对在场学者提出的伪满洲国时期的犹太政策问题，舒衡哲教授表示，伪满洲国之所以接纳犹太人，主要是出于投资地方经济的考虑——并非是因为喜欢他们。

最后，欧阳哲生教授总结发言。他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舒衡哲教授以血泪

般的文字讲述了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经验，控诉了德日法西斯政权迫害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她的讲座既有生动的历史叙事，又有深刻的思想含量，同时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令人深受教益。

（撰稿：张蒙）

## 光影之间——启蒙运动的局限性与历史意义

2017年10月26日下午，“光影之间——启蒙运动的局限性与历史意义”主题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美国康州卫斯理安大学舒衡哲（Vera Schwarcz）教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参与对谈。

讲座开始前，贺桂梅教授进行简要介绍。舒衡哲教授是中美建交后第一批来到北大访学的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五四运动史、知识分子问题、中国启蒙运动等，其《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在中美学界影响广泛。舒衡哲教授非常关注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延伸，特别是当时作为学生的那一代人在后五四时代对启蒙思想的实践。为此，舒衡哲教授也搜

集、整理了很多口述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书面档案未能涵盖的珍贵内容。

讲座伊始，舒衡哲教授首先谈到，在讨论中国的启蒙运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到欧洲的语境去重新认识“启蒙”。“启蒙”是一个中文词汇，但不可否认的是，“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概念却来自欧洲。虽然在21世纪我们对这个概念（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中国的）进行过热烈讨论，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却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诚然，“启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反观欧洲历史，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却有很多悲剧性的后果。这些后果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领域，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实践行为。

舒衡哲教授还指出，中、欧的启蒙运动在活动主体上是类似的。在17世纪的欧洲，

启蒙运动以贵族为主体；而当我们谈论中国的启蒙时，总会联想到《青春之歌》中年轻人的运动。但其实，作为启蒙主体的中国年轻人并不如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样，他们作为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属于较为富裕的新知识分子阶层。所以，我们不能单纯从无产阶级运动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启蒙运动和五四，还要考虑到贵族知识分子的视角。

无论是启蒙时代的欧洲还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一种自带光芒的角色。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自诩为“太阳王”（Le Roi Soleil），而推动启蒙的知识分子们则认为其理性之光比“太阳王”的皇权之光更加耀眼——因为他们对理性的爱远远超出对旧时皇权的爱。但是，理性的光在闪耀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阴影：知识分子坚信理性的光芒可以照耀到世界各个角落，却忽视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因此造成了很多悲剧性的后果。这种态度是十分傲慢的，这些“阴影”也是我们当下研究启蒙时应考虑在内的。

舒衡哲教授还谈到，自第一次访问北大至今的这四十年里，她一直在思考光与影的问题。在北大访学时，她采访了一些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人，并了解到他们在后半生度过的黑暗岁月。与五四时期热烈的启蒙精神相比，后来发生在这些“当事人”身上的痛苦可能就像未名湖上倒影的博雅塔影子——光芒越灿烂，阴影越幽深。

在五四前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把西方的各种“主义”引入中国：如易卜生主



舒衡哲教授为热心读者签名留念

义、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知识分子们引入不同的西方思想是想找出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但这样的行为却给他们个人的命运蒙上了阴影。舒衡哲教授展示了一幅描绘五四运动的油画，我们可以看到充满激情的工人与大学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革命氛围——这是我们熟悉的五四文化。但舒衡哲教授要谈论的不是我们熟悉的革命性的一面，而是要去看革命激情背后的阴影。尼采曾说，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对公共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在阴暗之中慢慢发生的辐射至人们内心深处的变化可能才是历史事件更为深远的后果。舒衡哲教授希望探讨的便是自五四以来，我们的精神、观念发生了什么转变？这些转变或许才是当今我们反思五四时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接下来，舒衡哲教授以“独立之精神”为例阐述了她认为的最重要的改变。1919年6月，全世界五十二名知识分子联合署名发表《精神独立宣言》。这份文件由罗曼·罗兰起草，署名者包括爱因斯坦、泰戈尔、罗素等赫赫有名的大家。那时，一战刚刚结束，罗曼·罗兰看到了民族主义造成的战争



舒衡哲教授

恶果，便呼唤知识分子结成一个超越所有的界限的独立联盟，自由地享有自己的思想。他们宣告：“我们只崇敬真理，自由的、无限的、不分国界的真理，毫无种族歧视或阶层偏见的真理。”

之后的1919年12月，这篇文章由张申府翻译为中文，发表在《新青年》上。此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但张申府认为，这篇文章所展示的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需要的“独立之精神”——知识分子只应站在真理这一边，去成为这个国际性真理联盟的一员，而不是站在民族主义这一边，为各种界限所困。1921年，《新青年》的阵地已经从北大转移到上海，成为共产党的刊物。张申府为《新青年》投递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便是“独立之精神：是梦想还是希望？”这个问题在舒衡哲教授看来，需要由当代的中国年轻人用一百年的时间才能给出回答。

《精神独立宣言》被传译到中国时便

强调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之精神”，但后来又为什么在后面加上了“自由之思想”这五个字呢？舒衡哲教授表示，这要追溯到陈寅恪为纪念王国维写的碑文。与提出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等人相比，陈寅恪更偏向一种慢节奏的思考方式。他专门到挪威的易卜生墓前沉思：中国所需要的，究竟是一场文学革命？还是一次文化复兴？陈寅恪与王国维关系密切，王国维的自杀也因此对陈寅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自杀后，顾颉刚发表文章说，是社会杀死了王国维——若不是一个为社会所不容的贵族或精英的话，也就不会自杀。在撰写纪念碑文时，陈寅恪也将王国维描绘成一个悲哀落寞的一个人。这个纪念碑现在还在清华，碑文上浮现着我们所熟知的那行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1919年罗曼·罗兰发表《精神独立宣言》到1969年陈寅恪去世，这几十年的变迁或许可以让我们在反思五四时多

去思考启蒙下的阴影。

那么“思想之自由”与“独立之精神”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在舒衡哲教授看来，“思想之自由”是他人赋予的条件，而“独立之精神”则是较为个人的事情。陈寅恪在创作最后一部作品《柳如是别传》时，双目失明，双腿残疾。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却偏偏要选择这个“禁域”来写，也是值得我们现在去深入思考的。曾有学者谈及陈寅恪时表示，他作为中国启蒙运动中一位独特的知识分子，用诗歌在无声之处找到中国思想的声音。舒衡哲教授认为，或许自己和陈寅恪之间的关联也在于此——在光中寻找影，在无声处寻找声音。最后，舒衡哲教授总结道，在我们追溯启蒙、反思五四时，要时刻意识到“光在影中，影在光中”。

之后，贺桂梅教授进行总结，欧阳哲生教授与主讲人进行讨论。

欧阳教授谈到，陈寅恪三写王国维：第一次写挽词，这篇文章也是其成名作；第二次写碑文，并借文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表达对国民党党化教育的不满；第三次写小序，以表彰王国维的学术方法。此外，学术界当下对五四的讨论确实和二三十年前有了很大区别。从前，在革命话语主导下的五四一直是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也是革命的象征。而在近几年，五四则变成了启蒙运动的象征，代表了现代化的方向。当今的学界对五四的解释更加多元化，甚至对于其作为时代界碑（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之分）的看法也开始有了转变。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不再将五四看作所谓“新文学”的源头，“新文学”只是近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总之，有关五四

的革命性论调已经日趋削弱。

贺桂梅教授对此补充道，五四运动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了一个神话般的源头位置，但我们还需注意，它与启蒙运动并不是完全同一的。现在我们所讨论的“五四运动”一般来说有两个含义：狭义上是五月四号当日的运动，广义来看则囊括了五四前后的整个新文化运动。所以，对五四的解读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样貌：第一种是左翼的革命运动阐释，无产阶级由此登上历史舞台；第二种是国民党做出的阐释，即把五四单纯地理解为一个爱国运动，并弱化其革命意义；第三种是学界对五四的解释，学者们则更多地从当代价值观转变的角度去看待五四。当然，八十年代的学者们谈论五四的方式与舒衡哲教授出入较大。前者认为五四是“未完成的启蒙”，后者则认为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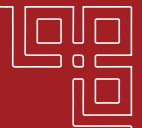
讲座最后，舒衡哲教授提出几个问题：其一，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时，我们要纪念的是什么呢？其二，陈寅恪并不是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但为什么直到现在依然还在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撰稿：孔博林）





## 文研回望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第三期邀访学者欢迎会



第三期邀访学者与文研院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2017年9月4日下午，文研院第三期邀访学者欢迎会在静园二院111室召开。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第三期邀访学者张邦炜教授、邓淑苹研究员、肖瑛教授、孙圣民教授、李楠教授、陈波副教授、刘未副教授、华喆副教授、林晓光副教授、胡鸿副教授、陈志远助理研究员，往期邀访学者代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张瀚墨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出席了此次欢迎会。

欢迎会由副院长杨弘博主持，她代表文研院向各位学者表示敬意与欢迎，并简单介绍了参会人员 and 会议安排。随后，与会学者们共同观看文研院揭牌视频，进一步加深了对北大和文研院的了解。

院长邓小南教授首先发言，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她表示，邀访学者项目作为文研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已经进行到第三期。学者们在年龄段、兴趣点、学科背景等诸多方面不尽相同，多元而丰富。她希望三期学者们能在文研院搭建的平台上多多交流、互相帮助，在静心

学问与参加活动的同时，也给文研院带来活力与帮助，与文研院共同进步，实现“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随后发言，他指出，现今既是学术繁荣发展的时刻，也是面临危机的时刻。各学科在充分发展的同时，束缚着学者们的手脚，使其不能自由思考——而最伟大的学者无一不是拥有着宽广的视角，并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北大之所以成立文研院，就是要为学者们搭建自由宽松的平台，使不同学科的优秀学者建立共生共长的关系，交流、激活理论方法与想象空间，回到学科的本来之处与学术的最深处。

院长助理韩笑介绍了文研院组织的各类学术活动。文研院活动丰富、不拘一格，他邀请学者们积极参加，多多交流讨论。

然后，第三期邀访学者先后发言，分别就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进行介绍。大家纷纷表示，感谢文研院提供此次访问机会。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邦炜回忆了自己一个甲子前报考北大而落榜的遗憾，如今成为文研院邀访学者，特别荣幸。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研究员邓淑苹女士从事的是考古学界“冷门”的玉器研究，她希望自己能多与资深考古学、历史学教授交流，从而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度认识。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计划在驻访期间，充分利用北京大学优越的学术资源和学术环境，重新启动“反身性”研

究。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孙圣民的研究方向为经济史中的制度与变迁，他希望驻访期间广泛阅读积累、梳理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楠的研究兴趣广泛，涉及中国的民族形成和边疆治理、近代疾病传播与经济发展以及艺术品拍卖，等等。他表示文研院为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可以从中以多重的视角启迪思想。四川大学副教授陈波致力于藏学人类学研究，他计划在本学期就西藏文明中的家屋概念、亲属关系等进行回顾性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未计划在驻访期间研究考古学视野下的晋东南宋元村落，并结合不同材料对其进行整体关照。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华喆计划结合文本、思想、图像三个方面进行礼图发展史研究，并为之注入新的内容。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林晓光的研究领域为汉魏六朝贵族社会与文学关系，他表示学者应具备文史相通、多学科相融的能力，并期待在驻访期间与诸位学者多多交流、互相帮助。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鸿的研究课题为中古南方山区的族群互动与社会变迁研究，他希望借此机会，将之前被干扰、打断的学术进程做进一步的发展与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从事南朝佛教的研究工作，他期待在与学者们交流的同时汇报北朝佛教拓片新况。

同时，欢迎会还邀请了前两期的邀请学者代表参加，与大家分享访学心得与经验，他们对文研院提供的良好学术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新一期邀请学者表达祝愿，好好把握四个月的驻访时间，希望

能够大有收获。最后，三期邀请学者共同参观了文研院内部展览，欢迎会在温馨而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撰稿：周诗雨)



院长邓小南为葛兆光教授（左）颁发聘书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文研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具体内容参见“文研周年”周年报道。

## 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访问北大文研院

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的邀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于2017年10月7日至22日访问北京大学，开展讲学交流。作为文研院的特邀访问教授，葛兆光教授在访问期间主讲两场文研

讲座，并参与了主题为“今天我们为什么讨论‘何为中国’”的文研论坛，与来自北大校内外的学者、学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葛兆光，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同时担任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葛兆光教授主

要研究领域是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0）、《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1995，2006）。近年来的主要著作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燕行文献札记》（2014）、《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2014）、《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2017）。曾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1988）、第一届“长江读书奖”（2000）、第一届Princeton Global Scholar（2009）、第三届Paju Book Award（韩国，2014）、第26届“アジア・太平洋”大奖（日本，2014）、第8届“香港书奖”（香港，

2015）、第三届“思勉原创奖”（2015）等。

10月1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五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蒙古时代之后的东亚——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例”。葛兆光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文研院学术委员袁明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讲座。

讲座中，葛兆光教授首先介绍了历史上两个著名的过渡时期——中古与近世之间的过渡期（唐宋之间）和帝制时代到共和时代的过渡期（晚清民初时期），继而提出蒙古时代之后的1368-1420年，对于东亚而言也是一个历史上的过渡时期，以此明确了朝鲜通信使文献的背景。随后，他详细介绍了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的史料

价值，指出朝鲜作为 14-19 世纪唯一与日本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在中、日之间既起到了沟通作用，也产生了阻隔。另外，作为历史资料，通信使文献可被视作政治、文化与经济“情报”。作为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资料，它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东亚各国文化之间的认同与竞赛。继而，葛教授将目光拉远，回溯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现代转型，并概括为：时间变短、空间放大、史料增多、问题复杂。最后，葛教授总结出四种在历史研究中易被遗忘的历史类型，即被删除和遗忘的历史、被想象的历史、没有发生过的历史、不在场的历史。他指出，不在场的历史亦可以研究，不在场也可能是隐含的在场。在 14、15 世纪以后，东亚三国开始出现了自尊独立、文化较量的现象——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结束了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笼罩一切的局面。

10 月 12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五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朝贡与认同——从 1790 年安南使团赴热河为乾隆祝寿说起”。葛兆光教授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聪教授、欧阳哲生教授、中文系张鸣教授、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董强教授，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李开元教授等出席讲座。

讲座中，葛兆光教授从 1790 年安南使团赴热河为乾隆祝寿说起，通过“朝鲜燕行使者的观察与诧异”、“安南国王来朝”、

“黎阮嬗代”、“万寿节庆典上的安南使团”、“冕旒衣冠：政治承认与文化认同”五部分内容，深入分析了乾隆祝寿庆典上安南君臣“易服色”事件的细节及其政治意义。他由该个案指出，目前学界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发生新的变化：一是注意到朝贡制度与朝贡行为存在差异，即不再把历史文献中的朝贡制度，当作区域内各国的交往现实。二是研究朝贡体系，不能只依靠汉文文献，还应当包括越南、朝鲜等外国文献，并以对方视角作为补充。三是充分意识到朝贡体系的复杂性，改变原有的捆绑式研究方法，并将政治、经济、文化区分开来单独研究。

10 月 18 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三期在北京大学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主题为“今天我们为什么讨论‘何为中国’”。葛兆光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主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研究员陆建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文研院访问学者陈波出席并参与讨论。

“何为中国”的题目来自于葛兆光教授所做的研究。作为论坛引言人，葛教授首先发言。学界开始讨论中国，这就使得中国本来不被视作问题，现在变成了问题。过去我们习以为常地使用“中国”，在书写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通史时，我们讨论更多的是什么是文学史、哲学史和历史，并不讨论为什么它是中国的。当

中国成为问题以后，有三方面问题的凸显使我们不得不讨论中国的概念，分别是中国内部的差异性、中国和周边的关系以及中国和国际秩序的关系。回顾历史，发现历史上有三个时代热衷于讨论“何为中国”，分别是北宋、晚清民初以及现在。而这三个时代的共同点在于，在这些时代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剧烈变动，迫使中国不得不自我重新界定。葛教授认为讨论中国需要涉及五个关键词，即疆域和领土、民族和族群、宗教信仰、国家、认同。讨论何为中国，不仅涉及对中国的重新定位，也是讨论在什么基础上认同，涉及历史学研究的具体的问题。

访问期间，葛兆光教授通过讲座、论坛等不同形式的活动与校内外学者、学生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学术交流，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 文研纪事





## 文研纪事

02

2017-08

“北大文研论坛”第四十八期“《子弹库帛书》出版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子弹库帛书》作者李零以“楚帛书的故事”为题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文物出版社社长张自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陈叙良、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23

2017-08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与行政助理团队召开新学期工作动员会，就即将展开的第三期邀请学者报到、召开学术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会议、筹备文研周年系列活动等工作进行布置。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与居延考察摄像团队在二院一楼中厅探讨合作事宜。

24

2017-08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在静园二院 109 会议室与著名画家徐龙森就双方感兴趣的学术话题和即将召开的文研论坛“天心：徐龙森的山水世界”展开讨论。

29

2017-08

为从多学科角度阐发居延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文研院于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联合高端学者开展居延实地考察。参与此次考察的有：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张帆、何晋，北京大学城市与环

04

2017-09

境学院教授韩茂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睿，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等。

文研院工作委员会月度会议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就第四期邀请学者遴选、文研周年日程安排等事宜进行商讨。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工作委员高枫峰、李猛、刘云杉、陆扬、孙庆伟、邢滔滔、叶炜、周飞舟、张辉、张亚光出席。

文研院第三期驻访学者欢迎会在静园二院 111 室举行。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第三期邀请学者张邦炜、邓淑苹、陈波、陈志远、胡鸿、华喆、李楠、林晓光、刘未、孙圣民、肖瑛以及往期邀请学者代表张瀚墨、袁一丹、罗祎楠参加。

08

2017-09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一行到文研院进行走访座谈，并参观文研院“老校长与北大”展览。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王仰麟、王博，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法学院教授吴志攀，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吴虹、教授李沉简，教务部部长傅媛燕，科学研究部部长周辉，人事部部长刘波，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党办校办副主任李航，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及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本次活动。

09

2017-09

文研院学术委员会 2017 年年度会议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由文研院学术委员会轮值主席朱苏力主持，学术委员葛兆光、李零、林毅夫、俞可平、袁明、赵辉、朱青生出席并提出宝贵建议。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分别从学术工作、行政工作、学者选拔等方面对文研院建成以来这一年的基本情况进行汇报，并叙述了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经由全体学术委员推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成为下一任轮值主席。

11

2017-09

“北大文研讲座”第四十九期在二院 B101 报告厅举办，主题为“健康中国——发展中的科技创新与医学人文”。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

12

2017-09

“北大文研论坛”第四十九期“天心：徐龙森的山水世界”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办，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教授高士明担任主持并作引言。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李

猛教授、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郑力副教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俞建拖、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文研院学术委员李零教授、朱青生教授参加本次会议。

13

2017-09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一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楠教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为何中国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国家：基于地理因素与政治整合的考察”。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张邦炜、邓淑苹、肖瑛、孙圣民，访问学者陈波、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陈志远参与讨论。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学术委员朱青生在视觉艺术研究中心与来访的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雅希·埃尔斯纳就未来合作事宜进行会谈。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杜杰庸（Dutournier Guillaume）与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中国代表处马勃思（Max J. Fölster）访问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就联合举办学术会议、互通学术信息、推荐邀请学者等议题进行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期“宝黛钗关系新解”在二体 B102 报告厅举办。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欧丽娟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担任评议主持。

15

2017-09

“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期“反思美国区域研究”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办。芝加哥大学前历史学系主任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担任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担任主持。

20

2017-09

为庆祝文研院成立一周年，“文研周年”系列活动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院士，文研院首位特邀教授、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赵鼎新，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张国有，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文研院学术委员、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等二百余位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活动贯穿全天，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文研周年、主题学术报告及学术论坛。

文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与北大立校 120 年：反思与前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

文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二期在北京大学二体 B101 报

告厅举行，主题为“寻找正统——乡村里的儒与道”。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科大卫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

文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一期在北京大学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主题为“文明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方法及反思”。论坛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参与讨论的学者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波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常怀颖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博士。韩启德院士、樊锦诗教授等嘉宾到场聆听。

宝鸡文理学院周秦基地副主任景鸿雁教授、基地研究员刘晓艳教授到访文研院，并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就未来的学术合作事宜进行洽谈，内容包括：参访考古遗址、举办学术讲座、联合学术考察等。

27

2017-09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陈志远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从佛诞年代推算看中古佛教经院主义学术”。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李楠、肖瑛、孙圣民，访问学者陈波、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中古史中心副主任史睿参与讨论。

28

2017-09

“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四期“当前国际秩序与世界政治趋势”在二体 B102 报告厅举办。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担任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本次讲座。

07

2017-10

北京大学第五届现代史青年论坛“组织起来——现代中国的重构与转型”于 10 月 7 日至 9 日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

09

2017-10

“北大文研读书”第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西古代统治：制度与观念——马克垚教授著作研讨会”，此次会议主要围绕马克垚教授的新作《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展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垚作引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

10

2017-10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一行到文研院进行调研。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学科办主任张平文、党办校办主任龚文东、政研室主任任羽中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调研

活动。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学术委员会主席李零、工作委员会委员陆扬及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调研座谈。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邦炜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钱穆论著中的一些疑问——从宋代‘平民社会’论说起”。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肖瑛、孙圣民，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唐雯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五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蒙古时代之后的东亚——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葛兆光担任主讲，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文研院学术委员袁明担任主持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吴虹到访文研院，并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就资料捐赠事宜展开讨论。

“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二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两汉魏晋时代丝路南道的多元文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持论坛并作引言。

北京大学青年公众号运营团队到访文研院，并与相关工作人员就宣传事宜进行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五期第二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朝贡与认同——从 1790 年安南使团赴热河为乾隆祝寿说起”。文研院特邀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教授葛兆光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六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古文学史的再脉络化——以五篇文献为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担任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担任主持。

“菊生学术论坛”第七期暨“科际合作——藏学与人类学领域间关系”首次学术工作坊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该会议由“藏学人类学阿坝研究合作项目”组织，文研院与商务印书馆联办，历时一天半。

10 月 14 日—16 日，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赴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参加其成立二周年系列学术活动。期间，渠敬东参加了分论坛“质性社科：定性研究的争论”并担任引言人。韩笑代表文研院与浙大高研院行政团队座谈，

12

2017-10

13

2017-10

14

2017-10

17

2017-10

交流相关工作经验。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研究员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何以‘万国玉帛’——探龙山、二里头时期玉文化的形成与意义”。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张邦炜、李楠、肖瑛、孙圣民，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唐雯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的、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一期在二体 B101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车浩作题为“理解当代中国刑法知识转型”的演讲。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担任评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担任主持。

“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三期在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主题为“今天我们为什么讨论‘何为中国’”。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担任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七期在二体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三江源与游牧民的未来”。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担任主讲，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吴虹担任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六期第二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洛神赋再研究——在文学、图像与历史之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担任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杜晓勤担任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八期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主题为“非洲与中国的文明”。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担任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担任主持。

应国家图书馆邀请，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赴国家图书馆鉴赏珍贵的古籍善本。参加此次活动的有：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第三期邀请学者张邦炜教授、邓淑苹研究员、肖瑛教授、孙圣民教授、陈波副教授、刘未副教授、胡鸿副教授、唐雯副研究员、陈志远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马楠，国家图书馆研究员赵前、副研究员王维若等。

“静园雅集”十三期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主题为“茶道和日本的美意识”。著名旅日作家李长声担任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晓明担任主持。

18

2017-10

19

2017-10

20

2017-10

23

2017-10

“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九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担任主讲，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担任主持。

“上海犹太人的内在精神——解读历史创伤时期难民的生存韧性”主题讲座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办，美国卫斯理大学教授舒衡哲（Vera Schwarcz）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担任主持。

24

2017-10

文研院二期访问教授，香港教育大学讲座教授陈国球回访文研院，与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就双方感兴趣的学术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与巴黎城市索邦大学联盟（USPC）国际事务主管塞巴斯蒂安·弗吕（Sebastien VELUT）先生，USPC 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加布里埃尔·科斯塔（Gabrielle COSTA）女士会面，就双方合作意向进行了沟通。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以“家国关系论述的中希之别”为主题展开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张邦炜、邓淑苹、孙圣民、李楠，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唐雯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主题为“欧洲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形塑与文化计划”。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教授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担任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担任主持，

由文研院主办的、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二期在二体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侃理作题为“时间的历史——《史记》与太初改历”的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叶炜担任评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担任主持并作引言。

25

2017-10

“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四期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主题为“时间性与文明”。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担任引言，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担任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一期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主题为“浅谈宋史研究中的片面性问题——从钱大昕考论宋史说起”。文研院访问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

26

2017-10

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张邦炜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

教育部人事司赵丹聆副司长访问文研院，并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贺灿飞、王立新、彭锋、仰海峰、贺桂梅举行座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EHESS）社会学家伊莎贝教授到访文研院，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周飞舟全程陪同。

光影之间——启蒙运动的局限性与历史意义”主题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美国康州卫斯理安大学舒衡哲（Vera Schwarcz）教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担任主持，

文研院秋季学期第一次邀请学者茶叙在静园二院咖啡厅举办。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第三期邀请学者邓淑苹、张邦炜、肖瑛、孙圣民、陈波、陈志远、刘未、华喆、唐雯出席。与会学者就各自的研究心得与逸闻轶事分享交流。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室主任刘方一行到访文研院，并就合作出版事宜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进行商讨。

“关于中国的艺术史研究——西方与中国的视角”座谈会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美国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包华石（Martin J. Powers）担任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担任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出席。

“北大文研读书”第三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绘画与视觉机制——《知觉的悬置》研读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沈语冰作引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担任主持。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唐雯研究员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从新出元载墓志看德宗的太子地位”。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孙圣民、肖瑛，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三期在二体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作了题为“‘金铁主义’与现代国家——马克思·韦伯支配学说的再考察”的演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担任评议。

27

2017-10

30

2017-10

31

2017-10

